



亞太研究論壇

(原亞太研究通訊)

20期

中央研究院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2003年6月

台灣・台北

目 錄



亞太研究論壇第二十期

2003 年 6 月



研究論文

- 麻六甲伊斯蘭王國的瓦解與西方殖民城市的誕生 / 黃蘭翔 1
- 支那人 / 華馬關係：馬來小說中的華裔鏡象與敘事策略 / 莊華興 28
- 越南與台灣經濟文化關係之展望 / 杜進森 36
-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Difference of a Decade* / Catharin Dalpino and Juo-Yu Lin 40



新生代研究

- 馬華文學中的歷史想像初探：以張貴興的《猴杯》為例 / 陳琮淵 49



東南亞政經大事記 (1900-2000)

- 馬來西亞 64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辦公室報導 93



會議報導

- 台灣與南韓的社會運動與民主鞏固國際研討會 95
- 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第十八屆大會徵求論文 97
- 2003 年 7~9 月亞太研究相關會議時間表 110

Contents



Asia-Pacific Forum No.20

June 2003



Research Papers

- The Collapse of the Kingdom of Malacca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Colonial City*
By Lan-Shiang Huang 1
- “Orang Cina” and the Sino-Malay Relations: An Account of
the Perception of the Chinese as Portrayed in Malay Fiction in Malaysia*
By Fah-Hing Chong 28
- Prospects for Vietnam – Taiw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By Ti•n-Sâm •• 36
-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Difference of a Decade*
By Catharin Dalpino and Juo-Yu Lin 40



Research of the New Generation Researchers

-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Gui-Shing Zhang’s “HOU BEI”*
By Tsung-Yuan Chen 49



Chronology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1900-2000)

- Malaysia* 64



News from CAPAS Office 93



Conference Calendar

-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Compared* 95
- 18th IAHA Taiwan Conference First Announcement* 97
- July ~ Sept. 2003 Calendar of Conferences and Meetings on Asia-Pacific Studies*
..... 110

麻六甲伊斯蘭王國的瓦解與西方殖民城市的誕生*

黃蘭翔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

一、前言

本文是系列研究論文之一¹；第一篇文章將麻六甲城市²通史作一簡單的瀏覽，第二篇文章開始以斷代史的方式，逐次地檢討每一個朝代的都市史發展之過程。前文曾經討論麻六甲王國的創立與明朝帝國建立的朝貢關係，使它得以在強敵逼境的情況下，尚能安全渡過王朝創立的初始階段。後來因為明朝的海洋政策之轉變，不再提供麻六甲王國政治的支援，麻六甲王國也在這期間掌握了活躍於印度洋的伊斯蘭教商人貿易圈利益的先機，先於東南亞其他王國，改宗伊斯蘭教，以達因作為東西物產集散中心而繁榮的目的，讓麻六甲王國得以強大，可以與周邊國家取得政治均衡的對峙。

本文將追蹤歐洲新興航海國家葡萄牙東來，檢視它取得麻六甲統治權的過程。我們知道，歐洲新興航海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等國，紛紛為追求黃金與香料，以及熱衷於宗教傳教事業的開展，派出了航海艦隊到世界各地去探險。本文將以個案研究的方式，詳細地檢視葡萄牙東來的原因與過程，企圖尋找興建麻六甲殖民據點城堡、城市機能配置之背後因素。我們知道葡萄牙雖然創造了過去在東南亞、東亞地區沒有的殖民城市風格，其實也繼承了不少前朝麻六甲王國的城市經營方法。諸如依靠穿過城市中心的麻六甲河，將統治階級與城市居民的分佈區域一分為二。城堡興建應是歐洲城堡興建之概念，它又如何從非洲到東南亞的殖民商館設立的時間與地理分佈過程中生根，並具體表現於麻六甲的城市興築過程？葡人東來是為打破伊斯蘭商人獨佔東西貿易網絡，更進一步想要取而代之，但是葡人為什麼還要承繼王國時期以來，為了取得自由港口利益而鼓勵的多元民族商人共處的城市經營方式？

* 本文發表於「2003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主辦，2003 年 4 月 25-26 日。

¹ 本文是接受本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民國 90 年度（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補助分支計畫的研究成果之一部分。過去初步研究陸續以「麻六甲都市的文化多重性與其歷史的發展過程」為題作系列的發表，已發表的文章有：黃蘭翔，〈麻六甲都市的文化多重性與其歷史的形成過程（一）：本土王國的建立與殖民宗主國之統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主辦，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協辦，「2001 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台灣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民國 90 年。黃蘭翔，〈滿刺加國的創立與東南亞都市雛形之出現〉，東南亞研究論文系列 No. 63，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出版中）。

² 《明史》列傳，外國六，滿刺加。原名為「滿刺加」，但遭佛朗機（葡萄牙）所滅之後，改稱「麻六甲」。因為本文討論葡屬時期的麻六甲，若無特別說明，全用「麻六甲」稱之。

二、東南亞的伊斯蘭教化與麻六甲王國

在重新檢討葡萄牙東來的過程之前，有必要將東南亞的伊斯蘭教化的過程做一簡單的背景鋪陳，³看一下東南亞的伊斯蘭教化的情形，以及檢討伊斯蘭教的國家體制與國家城市的風格，以便進行分析葡屬麻六甲的城市風格轉化之理解。

（一）東南亞的伊斯蘭教化

伊斯蘭教傳來東南亞最早可以上追 11 世紀，但是真正的伊斯蘭教化潮流發生在 15 世紀初到 17 世紀的前半，亦即所謂的「貿易的時代」。這是以東南亞所產的香料、胡椒等物產為主要貿易貨品，因而聯繫了東南亞與地中海海域、阿拉伯半島的東西貿易網絡，促使其快速地傳播與普及。這種隨著季節風而來的貿易船隊，帶來了阿拉伯、波斯、印度、中國等地出身的伊斯蘭商人，水手船員、烏里馬（ulama；伊斯蘭教的學者）、傳教士等人，大多數居住在海、河沿岸的港口城市，因為他們的定居，逐漸地促使東南亞伊斯蘭教徒人口數的增加。（圖 1）



圖 1 當今世界伊斯蘭教徒分佈圖。資料來源：日本□□□□協會，《□□□□事典》（1982），東京：平凡社。

最早的伊斯蘭教登陸點在蘇門達臘北端的三摩陀羅·波帥（Samudra Pasai；Pasay），後來約花了 3 個世紀的時間，駛到蘇門達臘島的東西兩岸、馬來半島的兩岸、爪哇的北岸、香料

³ 中村光男，〈□□□□ - □□□□受容〉，收錄於京都大學東南□□□□研究□□□□ - 編，《事典東南□□□□ - 風土、生態、環境》（1997），東京：弘文堂，頁 264-265。中村光男是現今日本對東南亞伊斯蘭教研究的重要學者之一，下面就是藉用他的整理來認識簡單的伊斯蘭教在東南亞傳遞的歷史與文化。

群島、加里曼丹島（Kalimantan）、西里伯島（Sulawesi）、菲律賓各地，亦即以東南亞海洋群島各地的港口都市為主，出現了伊斯蘭教的勢力。特別是從 15 世紀前半開始，因那領土逐漸擴張的鄂圖曼帝國，展現其財富、武力與文明的魅力，促使東南亞各地統治者們改宗信仰伊斯蘭教。簡言之，東南亞改信伊斯蘭教的型態有下列三種，亦即既有的政治統治階級的改宗，或是舊有的勢力遭伊斯蘭教新興勢力的摧毀，或是新興伊斯蘭教王國的出現。（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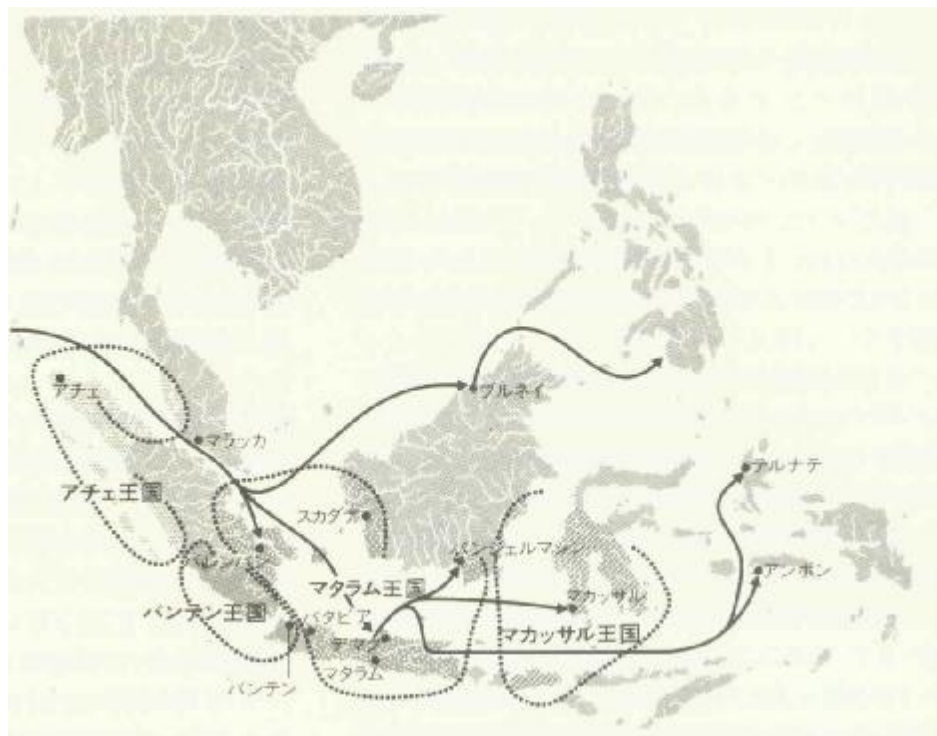


圖 2 17 世紀的東南亞與伊斯蘭教的普及趨勢圖。伊斯蘭教隨著箭頭所事的貿易路線普及開來。13 世紀末，於蘇門達臘北邊出現了伊斯蘭教王國；在印尼史上屈指可數的印度爪哇文化 Majapahit 王國，也在 16 世紀前半被一些伊斯蘭教的小國家群消滅了。隨後爪哇島上正式的伊斯蘭教王國 Mataram 於 16 世紀末開始興盛，伊斯蘭教的勢力就佔據了印尼。資料來源：石井米雄，《東南□□□□知□事典》（1999），東京：平凡社。

東南亞的伊斯蘭教化的過程，存在一明顯的特徵，亦即它並非因大量的伊斯蘭教徒進駐而引發的，也不是因外來的軍事力量之侵略與征服所造成的。而是大多先由有權力階級的改宗，由上而下滲透至整個社會，並沒有因伊斯蘭教化，帶來破壞、流血、強制性的暴力，而是和平的、自發性、融合的轉化之過程。

（二）「馬來伊斯蘭文明圈」的港市國家與政治文化

在「貿易的時代」裡，東南亞享受了空前的經濟繁榮，港口都市國家群的交易往來也非常熱絡，創造了所謂的「馬來伊斯蘭教文明圈」（Malay-Muslim World, Tamadun Melayu）。亦即以馬來語為共通語言，以伊斯蘭教為共同宗教信仰，有權力階級間的相互通婚，從事貿易外交活動聯繫其相互的關係，或有因宗教指導者間的師徒關係，或因水手海員、士兵、海洋

人民的移動而連結成「馬來伊斯蘭教文明圈」。就伊斯蘭教派言，除了極少數的什葉派（Ayutthahya；大府城）外，東南亞全屬遜尼派（Sunni），並且遵從所謂的「Shaykh 法學派」。至於這個馬來伊斯蘭教文明的港口城市國家之型態與政治文化，有如下的現像。

1. 伊斯蘭教港市國家

在 15 世紀初期，麻六甲王國經由蘇丹王的改宗，繼亞齊之後成為伊斯蘭教國家。因其位在東西海上交通的要衝位置，促進了來自世界各地商人的自由往來與發展成為世界性格城市風格。因具有世界性的交通與貿易網絡的集散轉運地性格而繁榮，使麻六甲成為典型的伊斯蘭教港市國家。但於 1511 年，遭到葡萄牙的侵占，麻六甲的蘇丹王、貴族、烏里馬、傳教士、商人、工匠、士兵、海員水手們，逃亡分散到北大年（Patani）、彭亨（Pahang）、柔佛（Johore）、亞齊（Ache）、Banten、Demak、蘇拉巴亞（Surabaya）、汶萊（Brunei）等地，因為這些原本就是伊斯蘭教徒麻六甲臣民，刺激了各地的港市國家的興建，也促成了彼此間相互的聯絡網路。這些港市國家各別擁有 5 萬到 10 萬人不等的人口，其規模與同時代的歐洲、中國、日本各地的港口城市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照片 1）



照片 1 當今麻六甲河口。照片右手邊的小山丘為聖保羅山。資料來源：2001 年 1 月筆者攝影。

2. 伊斯蘭教國家的政治文化

以麻六甲王國為範本的伊斯蘭教港市國家之政治組織，在政治階級頂點的是蘇丹王（sultan；統治者），以及其下的宰相／財政部長（bendahar）、內政部長／稅關首長（temenggung）、港灣首長（syahbandar）、海軍司令官（laksamana）的四大部長。另外，將王族、貴族／有權力者（orang kaya）配置到如大臣（mentri）等要職，並也時常起用有能力的外國人。蘇丹王要獲得或是維持權力（daulat），必需要有王或聖者血統、或有上天的啓示（wahya），關於王位繼承等重要的政治決定時，必須由統治階層們共同討論並全數通過（musyawarah-mufakat）作為規範。家臣們宣誓（bayat）效忠蘇丹王，若是離叛（derhaka）就必須處以死罪，以伊斯蘭（遜尼派）教義之名維持其秩序。

與本文有密切相關的東南亞的伊斯蘭教港市，卻發展出共通的配置。總體而言，其配置通常圍以柵欄，柵欄內部配置有如王宮、清真寺（mosque）、廣場、倉庫、王族貴族居住區、工藝匠師及商人居住區等，城外則有防波堤、港灣首長及稅關的行政機關、市場、倉庫、外國人居住區、佛教寺院等，東西南北的方向有道路與運河配置其中。（圖 3、圖 4）（照片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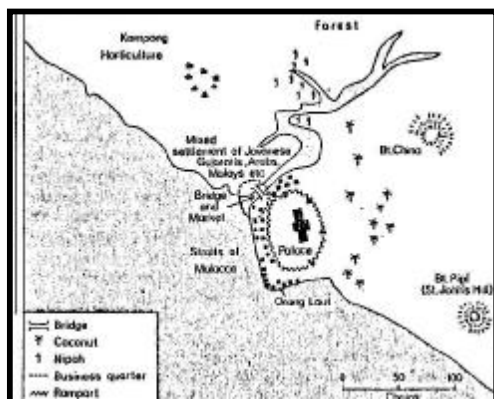


圖 3 1500 年左右的麻六甲圖

資料來源：T. G. MacGee, 1967. *The Southeast Asian City*. London: Be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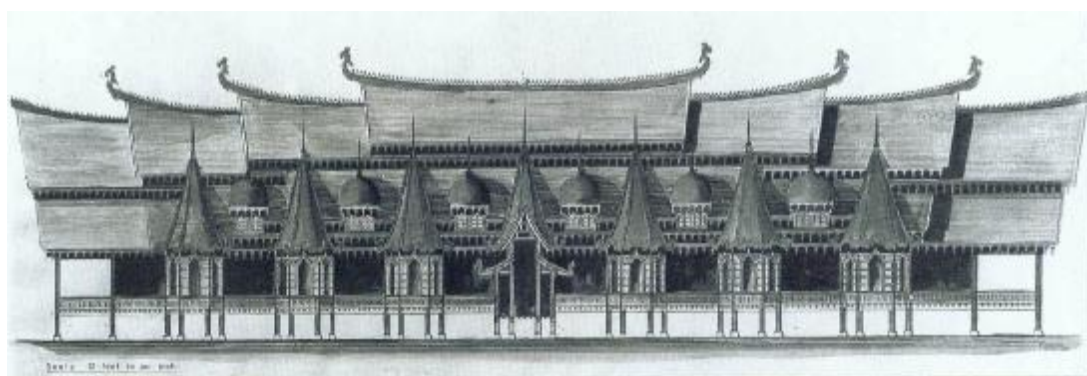


圖 4 一位藝術家復原的蘇丹王芒速沙(Sultan Mansur Shah; 1456-1477)時期的伊斯蘭宮殿(藏於吉隆坡的國家博物館)。資料來源：Sarnia Hayes Hoyt, 1993. *Old Malacca*. Kuala Lumpur;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照片 2 第六世王芒速沙 (Sultan Mansur Syah) (1456-1477) 在位時的宮殿，根據《馬來紀年》的記載所作的復原。曾經遭雷劈，燒成灰燼，後來重建。資料來源：筆者攝影。

（三）伊斯蘭教的麻六甲王國

在前文〈滿刺加國的創立與東南亞都市雛形之出現〉中，曾經論述過麻六甲王國成立之初，因要不時地對抗原本就已存在於馬來半島上強大支配者暹羅的壓力，向外尋求當時世界性的強國明朝之協助，得以創立新的國家。因為有了這一層與明朝的政治經濟朝貢的關係，明朝也確實在減緩暹羅侵擾的壓力上，扮演了實質的角色。麻六甲國也逐漸茁壯，終也建立各種典章制度。另一方面，在麻六甲國力進入穩定狀態的同時，伊斯蘭教商人對東南亞的影響也越來越強。一旦明朝政府改變南洋的經營政策，終止派遣使節團南來時，麻六甲國力也已成長到可對他國產生威脅的程度。明朝終止使節團的派遣後，雖然沒有對麻六甲造成太大的震撼，但也致使麻六甲轉向伊斯蘭教貿易網絡的世界。麻六甲所在的地理位置不但使其成為東西貿易的中繼站，也使它成為伊斯蘭教傳播至東南亞及中國的玄關。（圖 5）



圖 5 麻六甲王國之版圖。引自 N. J. Ryan, 1976. *A History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資料來源：Old Malacca。

麻六甲王國物產的情形，當時跟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與費信的著書《瀛涯勝覽》（1451）與《星槎勝覽》（1436）中有所如此的描述。「其國東南是大海，西北是老岸連山，皆沙瀆之地。氣候朝熱暮寒，田瘦穀薄，人少耕種」⁴。可以見得麻六甲是一土地貧瘠無法自給自足的國家。但是因位於東西貿易的要衝，所以自古以來就是各地物產集散轉運地。從東南亞、中國、整個印度半島，甚至從西方運來各種貿易交換的物產品。麻六甲市場充滿了如錫、金銀、銅、珊瑚、鼈殼甲、珍珠貝、胡椒、丁香、白檀、象牙、羽毛、草蓆類、青白磁、色絹、生絲、絹織物、藥品、綿織物、寶石、手工藝品等物品；從遙遠的西方集結於此的物品有武器、鴉片、毛織物、水銀、辰砂、釘、數珠玉、水晶玉、金或是鍍金的玻璃、薔薇水、染料等等世界各地商品。⁵

麻六甲王國的港口對於各地的貿易商人還存在另一項魅力，就是馬來人的蘇丹、貴族、

⁴ 馬歡，《瀛涯勝覽》（1451），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商務印書館發行，頁 22-23。費信，《星槎勝覽》（1436），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商務印書館發行。

⁵ 中原道子，〈□□□海峽〉，收錄於京都大學東南□□□研究□□□ - 編，《事典東南□□□—風土・生態・環境》（1997），東京：弘文堂，頁 344-345。

軍人等的統治階層，並不直接涉入貿易事務。他們從旁將作為貿易轉運站的環境整理好，亦即規劃好投資、抽取稅金、貿易之環境；為了吸引更多的外國商人前來，方便於從事商品交易，提供舒適的外國人居住地。已如前節所述，麻六甲王國的官僚組織有蘇丹王、宰相、財務部長、內政部長等的文武官員。在外國人居住區有港灣首長（syahbandar），這個港灣有首長 4 人。根據湯彌畢雷斯（Tome Pires）所言，這四個外國人社區：一是印度西北的 Guzerate 人，二是孟加拉（Bengal）人、比古人（Pegu）、Pasay 人，三是舊港（Palembang）人、爪哇人、婆羅洲人、呂宋人，以及第四的中國、琉球、泉州和占婆人。⁶這些出身自不同地區、不同種族的人們，按其出身地聚居在各別的小聚落裡。而這種由不同種族的小聚落組成的港口都市也是馬來西亞聚落都市的原型。⁷

這種依存於外國人經濟活動的麻六甲王國，在 16 世紀時歐洲各國的船堅砲利的攻擊下，顯得非常脆弱。於 1511 年，葡萄牙將獨佔於東西海上貿易的伊斯蘭教勢力驅逐，並在亞洲建立新勢力。下面從葡萄牙東來的角度，檢討葡萄牙攻陷麻六甲與殖民城市的興建。

三、葡萄牙東來的歷史背景

在此，暫時將麻六甲王國背後的伊斯蘭教化之歷史背景放在一邊，從另一角度，亦即從葡萄牙東來的角度，看看征服者的一方（葡萄牙）是經由怎樣的過程來到麻六甲？而他們興建的殖民城市又具有何種城市形式？

（一）東方海路的開發

簡言之，葡萄牙之所以在 14 世紀末起能發展成海洋貿易探險的國家，主要是因為商業利益與宗教熱情的誘因所致。但是在他們啓航之前，其實也有一些在歷史上所累積下來的一些經驗，讓他們在客觀環境與時代背景成熟時，得以一舉起飛成為海洋國家。

首先，在 14 世紀末時，在伊比利亞半島上的政治局勢，使葡萄牙必須與半島上另一大國卡斯提爾（Castile）⁸對抗，葡萄牙的面積約僅是卡斯提爾的四分之一，人口約是五分之一，飽受卡斯提爾有形無形的壓力，因此原本就有往西邊大西洋與南邊非洲尋求發展的壓力。另外，葡萄牙人自古以來就以海洋漁業為生，他們也從事海盜活動。14 世紀時，為取得黃金與非洲黑奴，葡人的貿易、殖民與海盜等的活動更為活絡，⁹因此蓄積了許多海上活動的能力。另外，就地理環境言，首都里斯本是良好的河港，原先就與歐洲大陸各地有廣泛的聯繫。在這些背景下，使葡萄牙累積了造船技術、先進的航海知識。一旦得到皇家的支助，葡萄牙很快就發展成縱橫未知海洋裡的強國，取得航海探險事業的領導地位。

除了歷史地理背景所發展成熟的航海技術與知識外，另外一宗教政治的背景，即因葡萄牙是在伊斯蘭教支配的伊比利亞半島（Iberian Peninsula）上，最早脫離其支配而獨立的基督教王國。可以想見它有強烈的宗教熱情，表現在尋找當時盛傳於西歐中世時期，在非洲東岸，或是印度或是在更遠的中國，存在所謂的祭司王約翰（Prester John）的基督教王國。但當時

⁶ 鶴見良行，《□□□□》（2000），東京：□□□□書房，頁 112-118。

⁷ 中原道子，〈□□□海峽〉，頁 344-345。鶴見良行，《□□□□》，頁 91-118。

村田明久，〈□□□□—海峽交易都市〉，收錄於加藤祐三所編《□□□□都市□□建築》（1986），東京：鹿島出版社，頁 59-73。

⁸ 生田滋，《大航海時代□□□□諸島—□□□□、□□□□、□□□□王國□丁字貿易》（1998），東京：中公新書，頁 3-6。當時在伊比利亞半島上有信仰天主教的葡萄牙（Portugal）、卡斯提爾（Castile）、Navara、阿拉貢（Aragon），以及南部信仰伊斯蘭的格拉納達（Granada）。於 1479 年，卡斯提爾王女伊莎貝拉與阿拉貢王子斐迪南結婚後，稱為「兩王」時期，這亦是西班牙王國的開始。

⁹ 生田滋，《大航海時代□□□□諸島—□□□□、□□□□、□□□□王國□丁字貿易》，頁 4。

跨過直布羅陀海峽（Straits of Gibraltar），位於北非以及地中海東部的伊斯蘭教國家限制（圖 6），¹⁰所以葡萄牙也亟需一條非陸路的航路，以尋找非伊斯蘭教國家的路線。



圖 6 鄂圖曼帝國第 10 代蘇丹王 Suleyman I（1494- 1566；在位 1520-1566）時的版圖。屬帝國最盛時期，版圖橫跨西亞、北非及歐洲東南部。資料來源：《□□□□事典》。

伴隨著這些宗教熱情、政治因素外，經濟也是促成海洋路線發現的主要因素之一。當時生產於印度與東印度的產品要到達歐洲，其東西貿易路線均為伊斯蘭教徒所據，要繞遠路才能通達。伊斯蘭教商人有如聯繫麻六甲與 Cambay 的印度古吉拉特人（Indian Gujeratis），以及聯繫 Cambay 與開羅、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阿勒波（Aleppo）的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埃及商人。並且，義大利威尼斯的商人盤據運輸網的中繼點，他們雖然必須用高價向伊斯蘭商人購買商品，但因地理的位置，據有歐洲物資分散的獨佔事業，位於歐洲其它地方的國家就必須支付雙重的高價。¹¹

所以對葡萄牙而言，找尋一條直通東方的航路，具有相當多重的意義。若能與東方的貿易市場聯繫上，不但可以瓦解伊斯蘭商人的貿易網絡，也打破威尼斯的獨佔。可突破伊斯蘭王國的阻擾，找尋到基督教王國。國威又得以宣揚，里斯本確保成為威尼斯第二的世界地位。因此在 16 世紀前後幾年，葡萄牙繞過非洲的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來到印度馬拉巴爾海岸（the Malabar Coast）的卡利卡特（Calicut）、科欽（Cochin）、臥亞（Goa；有人譯成「果亞」）。¹²（圖 7）

另外，從原本存在於「亞洲海域的世界」的貿易活動觀之，亦即爪哇海域、南中國海，加上葡人繞過好望角所進入的印度洋、阿拉伯海、孟加拉灣，自古以來有所謂的「亞洲海域世界」，與經由中亞聯繫東亞、南亞、西亞的「絲綢之路」相提並論，形成一個國際貿易的舞

¹⁰ Sarnia Hayes Hoyt, *Old Malacca*, p.30. 伊伯利亞遭到摩爾人幾個世紀的支配統治後，葡萄牙終於在 13 世紀時打敗了摩爾人，西班牙也在 1492 年將摩爾人趕出伊伯利亞半島。這種起源於長期遭受壓迫後產生的基督教宗教瘋狂熱情，發展成抗拒伊斯蘭的十字軍戰爭。

¹¹ J. Kennedy, 1962. *A History of Malaya A.D.1400-195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22.

¹² J. Kennedy, *A History of Malaya A.D.1400-1959*, p.22.

台。生田滋稱其為「印度洋貿易圈」。這個印度洋貿易圈以印度的古吉拉特地方（葡人所稱的 Cambay 地區）為中心，該地生產各種的綿織布，流通至貿易圈的各個角落。次中心的東印度的 Coromandel 海岸與孟加拉地方，也是綿織物重要產地；印度以外的其它地方如爪哇等地就成為地方性的貿易中心。¹³（圖 8、圖 9、圖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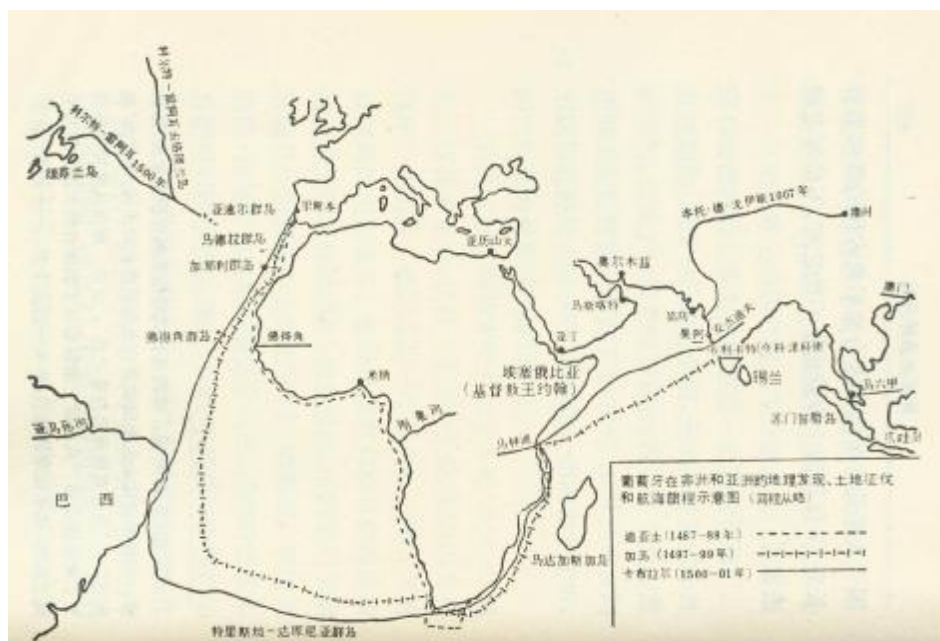


圖7 葡萄牙在非、亞洲的航海路線示意圖。資料來源：查·愛·若埃爾著，《葡萄牙史》。



圖 8 Sebastain Münster 於 1552 年所繪的亞洲地圖 (India Extrema XXIII Nova Tabula)。藏於 Antiques of the Orient。資料來源：*Old Malacca*。

¹³ 生田滋，《大航海時代□□□□諸島一□□□□、□□□□、□□□□王國□丁字貿易》，頁13-16。



圖 9 古來的印度洋貿易圈範圍圖。資料來源：生田滋，《大航海時代□□□□諸島—□□□□、□□□□、□□□□王國□丁字貿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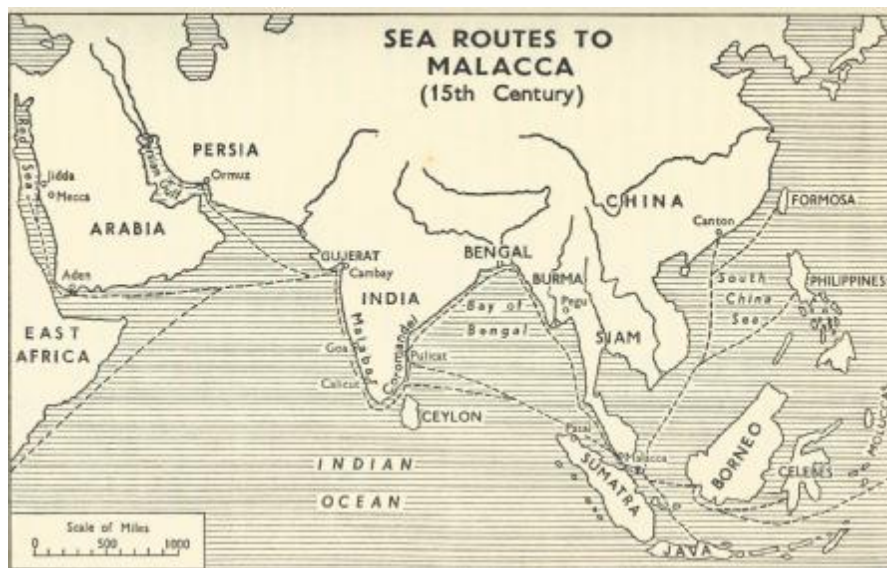


圖 10 15 世紀麻六甲海洋網路示意圖。資料來源：J. Kennedy, *A History of Malaya, A.D.1400-1959*。

各地方的居民為取得這些綿織品，從各地運來各式各樣的特產品作為交換貨物，如馬拉巴爾海岸、蘇門達臘北部、爪哇西部各地運來胡椒、斯里蘭卡的肉桂、摩鹿加各島的丁香、Banda 各島肉荳蔻、荳蔻花等等皆是。另一方面，「地中海貿易圈」運來可交換的商品是銀、銅、鉛等金屬類及包括武器的工藝品與奴隸，尤其是毛織品是地中海貿易圈最想販賣的商品，但是不合印度洋貿易圈內商品的需要，所以換來數量並不充分的香料，運往地中海、歐洲後，其香料可以賣得昂貴的價格。如此一來，更讓尋找海洋路線的需要更形有魅力與迫切性。¹⁴

葡萄牙就是在歷史地理環境發展的背景之下，以及因應當時宗教、政治的客觀環境發展，再加上當時非洲東西海岸、印度洋、孟加拉灣、麻六甲海峽東南亞各海域的海洋貿易路線的發達下，來到東南亞、及東亞地區，掌控其國際貿易的利益。

（二）麻六甲城的淪陷

如同前述，麻六甲港口扼住南洋及中國通往印度洋的通道，葡萄牙人自然清楚它的重要性，想要前來占領只是時間問題。受西班牙要從地球另一頭前去麻六甲傳聞的刺激，¹⁵在 1506 年，葡王曼努埃爾一世（Manoel I）命令當時設在科欽的葡屬印度（Portuguese India）總督佛郎西斯科·德·阿爾梅達（Francisco de Almeida），前往麻六甲並設置要塞。亦即企圖緊急設置葡萄牙的在外商館（Factory）或是貿易中心（Entrepôt）於麻六甲。¹⁶但因為阿爾梅達要對抗在埃及的馬木留克（Mamluks），當時馬木留克是西亞地區的印度伊斯蘭教諸國的盟主，對阿爾梅達有很大的威脅，他沒有剩餘的心力去麻六甲建立殖民的灘頭堡。這項任務一直要等到阿爾梅達卸任總督前兩個月，才由賽克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去實行。¹⁷

在 1508 年，曼努埃爾王派遣賽克拉前去麻六甲徵求蘇丹王應允土地蓋商館，以進行貿易活動。於 1509 年，賽克拉攜帶著國王的證書及禮物，領著四、五艘船艦來到麻六甲港口外。儘管賽克拉受到禮貌性的接待，也把手下送上岸，收購物品，進行交易，但是終究無法達成設置商館的協議，甚至事情發展到要逮捕葡萄牙人的事態。¹⁸

事情的背景是在麻六甲的伊斯蘭商人無法坐視葡萄牙將海上霸權從印度洋擴張至麻六甲海峽的事實。印度的古吉拉特人首先起來反對，得到宰相（Bendahara）的支持。原來，印度與麻六甲間的貿易都是由古吉拉特人掌控，對他們來說葡人之進出更倍感威脅。¹⁹當時的導火線是：賽克拉的使者帶著禮物與葡王信函前來宮裡，將一條項鍊掛上宰相（Bendahara）脖子

¹⁴ 生田滋，《大航海時代□□□□諸島—□□□□、□□□□、□□□□王國□丁字貿易》，頁 13-16。

¹⁵ 生田滋，《大航海時代□□□□諸島—□□□□、□□□□、□□□□王國□丁字貿易》，頁 17-19。因為西班牙的伊莎貝拉與斐迪南企圖將伊斯蘭教的格拉納達王國趕出伊比利亞半島，需要尋求新財源。當時出身於熱那亞（Genova）的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提出往地球的西去探險的計畫，可到達當時認為藏有豐富黃金在日本（Zipangu）與具有貴重物資的中國，因此受到西班牙國王的支持。後來雖然哥倫布到達一未知之地，但哥倫布接近中國、日本的消息卻被流傳開來。這對葡王若奧二世而言，具相當大的衝擊，因而加速了往東航海的探險。西班牙與葡萄牙於 1494 年簽訂「拖爾德西拉斯條約」（the Treaty of Tordesillas），以非洲最西端的維德角（Verde）以西約 2194 公里處的子午線（西經 46 度 37 分）為界，西邊為西班牙的屬地，東邊則為葡萄牙的屬地。延長其分界線，則是東經 133 度 23 分子午線為界。

¹⁶ J. Kennedy, *A History of Malaya A.D.1400-1959*, p.23.

¹⁷ 生田滋，《大航海時代□□□□諸島—□□□□、□□□□、□□□□王國□丁字貿易》，頁 20。

¹⁸ J. Kennedy, *A History of Malaya, A.D.1400-1959*, p.23.

¹⁹ 在 Haji Buyong bin Adil 所著的 *The History of Malacc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alay Sultanate*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Pustaka,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1974, p58.) 中，有記述這種因為古吉拉特人及來自東方的商人群起反對葡萄牙人的事情。他們慫恿宰相 Seri Maharaja 驅逐屬異教徒的葡萄牙人，所以 Seri Maharaja 就聚集一些追隨者進行葡人之逮捕行動。

上，這項行為被視為無禮的冒犯。蘇丹王則以回禮為由，邀約賽克拉參加宴會，但是被一位士兵的爪哇女友勸止，認為這是蘇丹王的圈套，因而佯稱生病無法前往。結果葡人與馬來人間發生了戰鬥，除了各自的傷亡之外，還捕獲了 15 至 20 人的葡人作為俘虜；賽克拉乘機逃回臥亞。²⁰（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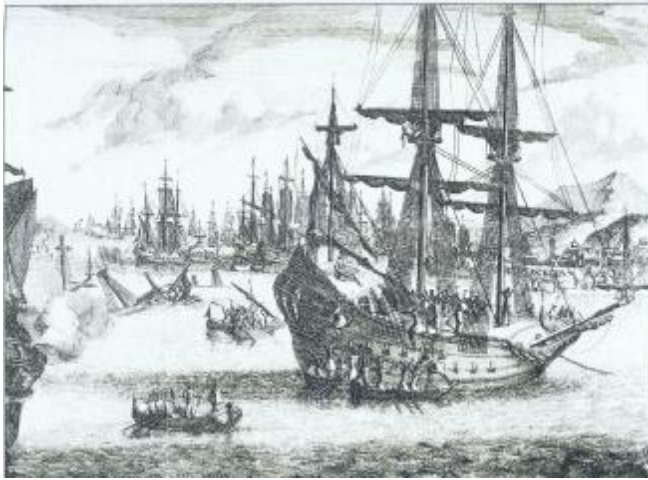


圖 11 馬來人與葡萄牙人於 1509 年所爆發的戰爭，葡屬大型橫帆船（Galleon）停泊於港內銅版圖。（Pierer van der Aa, 1707；藏於 *Antiques of the Orient*）（注意葡船與馬來船的不同）。資料來源：J. Kennedy, *Old Malacca*.

但是遠在南歐的葡王，似乎對於佔領麻六甲感到有緊急的需要，再度送書簡予接任的葡屬印度總督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亦有翻譯為「阿伯奎」），要他再度遣兵前往麻六甲。結果，他於 1511 年 7 月，抵達麻六甲，要求釋放俘虜，支付賠償金，並要求允諾給葡人興建要塞的用地。兩方未能達成協議，結果又發生軍事衝突。結果麻六甲戰敗，蘇丹王僅帶著少數的侍臣，逃去馬來半島南邊的柔佛，重建王國。

麻六甲城陷之後，阿爾布克爾克給部下三天的時間，盡情掠奪。但是他的本意並非要摧毀麻六甲，反而在王宮所在地，一方面建設暫時性城塞，另一方面則從事永久性的石造城堡之計畫；同時內又建聖母受胎告知教堂於聖保羅山下。依葡人之行政組織而言，麻六甲城的甲必丹²¹具有指揮在東南亞各地活動的葡萄牙人之權力。至於配置於城堡的守備隊，編制有以麻六甲為駐港的艦隊。

在阿爾布克爾克的構想裡，麻六甲仍應維持其國際貿易都市的機能，進一步要藉因控制了運輸的網絡，以達到支配東南亞各個群島的貿易活動。但是因為葡人與伊斯蘭教徒有長期以來的心結，基於宗教理由，曾使當時居住於此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的伊斯蘭商人離開麻六甲，他們大都遷往蘇門達臘北端的亞齊（Ache）、暹羅的大城府（Ayutthaya）、馬來半島上的柔佛等地。取而代之的是印度 Coromandel 海岸之印度教商人。葡萄牙人也必須不斷地與週邊的伊斯蘭教國家發生攻防戰爭，所以非重建城堡不可。無怪乎麻六甲的城牆在很短的時間內重建，也必須從木柵改為石造，加寬加大。²²

²⁰ 根據 *Old Malacca* 引用 Wintedt 的說法。

²¹ 葡語為 *capitão*，荷語為 *kapitein*。葡語是「長」的意思，指稱船長、指揮官、長官等等的意思。

²² 生田滋，《大航海時代□□□□諸島—□□□□□，□□□□□，□□□□□王國□丁字貿易》，頁 19-24。

四、葡人殖民城市的營塑法

(一) 在海外興建要塞商館的作法

在此，先看看葡萄牙東來的路上，其殖民城市的構築情形。1449 年，葡王杜雅爾特（Duarte; 1433-1438）的弟弟恩里克（Henrique o Havegador），在今天的茅利坦尼亞（Mauritania）的 Arugin 灣 Arugin 島上，設立商館，作為葡萄牙商人活動的基地。所謂的商館，是指兼有倉庫、宿舍、辦公的設施，周圍施以簡單的防禦設備，配置有若干的守備兵。²³

在 1480 年，葡王若奧二世（João II; 1481-1495）於非洲的西海岸，增強了葡萄牙之航海與貿易的活動，作為找尋黃金與從事貿易的據點。在幾內亞（Guinea）海岸建有 El Mimina 城（現在 Ghana 共和國的 El Mian），並將過去在 Lagos 的幾內亞館遷至首都的里斯本，改稱為 Guinea・Mina 館。他還在葡人出入的非洲西海岸的土地上，立下稱為「Patoran」石柱。那是刻有王家紋徽的石柱，意為向西班牙及其它歐洲國家宣稱，葡人已早先一步到達此地，主張其握有優先權。²⁴

葡王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 1495-1521）即位之後，立即派遣瓦斯科・達・加馬（Vasco da Gama）航使印度（圖 12），於 1498 年 5 月 22 日到達印度馬拉巴爾海岸（the Malabar Coast）的貿易中心地卡利卡特（Calicut）。加馬在卡利卡特進行貿易活動，收集有關印度的貿易資訊，但是卻無法與卡利卡特國王豎立友好的關係，於 1499 年 9 月回到里斯本。儘管如此，曼努埃爾一世對於加馬船隊航海的成功甚感高興，立刻準備籌組下一次的航海船隊，將里斯本的 Guinea・Mina 館改稱為印度（India）館，掌管從非洲東部到印度間航海、貿易活動之事務。第二次的船隊由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Pedro Alvares Cabral）帶領，於 1500 年，以印度為目標出航，卻意外漂流至巴西，使巴西成為葡屬殖民地。後來他成功地設置了印度的科欽（Cochin）商館，但是仍然無法與卡利卡特王保持友好關係，踏上回國之路。自此以後，葡王每年均派出航往印度的船隊。²⁵

於 1502 年，加馬再度被任命為艦隊司令官。從那時起葡萄牙派艦隊常駐印度洋，保護設置於科欽（Cochin）、Cannanore 等地的商館，採取使用武力控制印度洋上的海上交通。在貿易活動方面，則與設有商館之科欽、Cannanore 等地的國王簽訂契約，用一定的價格購買胡椒以保障其供應量。進一步將非洲東海岸與印度的商館與要塞組成所謂的「葡屬印度」之組織，以三年任期，任命佛郎西斯科・德・阿爾梅達（Francisco de Almeida）為艦隊司令官兼任副王，以統治「葡屬印度」，並指揮、統治在印度各地之葡人。當時在印度的葡人基地是科欽，到 1530 年以後，臥亞成為葡屬印度之首都。²⁶

從上面的描述，葡人從 15 世紀中葉起開始積極從事海洋探險與貿易，在後來約半世紀期間，都以非洲西海岸為活動的重點範圍。在 15 世紀末 16 世紀初左右，突然之間活動空間急速擴大，不但往東航行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活動範圍延伸至非洲東海岸，更擴張到印度半島的東、西海岸，更遠也到了東南亞的麻六甲海峽。而且往西意外發現南美洲的巴西，這也開拓了葡萄牙、西班牙往西探險的先機。

葡萄牙在外設立商館的作法，確立了航海、貿易的據點。如 1449 年的 Arugin 商館。於 1480 年在幾內亞海岸建 El Mimina 城，並將過去在 Lagos 已有的幾內亞館遷至首都的里斯本，改稱為幾內亞明納（Guinea・Mina）館。於 1499 年因應活動範圍擴及印度半島，所以更改幾

²³ 生田滋，《大航海時代□□□□諸島—□□□□、□□□□、□□□□王國□丁字貿易》，頁 5。

²⁴ 生田滋，《大航海時代□□□□諸島—□□□□、□□□□、□□□□王國□丁字貿易》，頁 6。

²⁵ 生田滋，《大航海時代□□□□諸島—□□□□、□□□□、□□□□王國□丁字貿易》，頁 8-10。

²⁶ 生田滋，《大航海時代□□□□諸島—□□□□、□□□□、□□□□王國□丁字貿易》，頁 12。

內亞明納館為印度館。在 1500 年，在印度西海岸設置科欽（Cochin）商館。於 1502 年，使科欽、Cannanore 等地的商館更為完備，在貿易政策上也開始有重大的改變，將非洲東部與印度洋一帶的商館與要塞城堡，以科欽為中心組織了所謂的「葡屬印度」統籌管理；並且也開始使用武力控制印度洋上的貿易利益。於 1530 年以後葡屬印度的中心由科欽移轉至臥亞。



圖 12 瓦斯科·達·加馬（Vasco da Gama）畫像，被認為是加馬的真實像。資料來源：《葡萄牙史》。

從這樣的追溯過程，我們可以瞭解葡人在尚未從事麻六甲建城之前，葡屬殖民城市之大概情形。例如商館的設置與配置機能，其兼有倉庫、宿舍、辦公的設施，周圍設置簡單的防禦設備，普通配置若干的守備兵。以這種殖民城市的營壘作法，可以知道葡人的麻六甲城市的雛形，約在其人來到麻六甲的 60 年前就已經成形。另外，以葡人的角度來看，因應商館當地政治勢力的武力衝突之需要，每一個商館都設有防禦設施與守備兵，麻六甲城堡的興建與派駐軍隊艦隊，只是其一貫基本構想的實踐而已。下面就來看看詳細的麻六甲個案。

（二）東南亞木竹柵欄變歐洲中世城堡

1. 葡人與蘇丹王間的麻六甲爭奪

葡萄牙在非洲、印度海岸各地所構築的殖民據點都是城塞化的城堡。可以確認城堡是當時西歐航海國家殖民城市的型態。我們仔細看一下當時的麻六甲，在實際軍事攻防上的情形。（表 1）

當阿爾布各爾克與蘇丹王蘇端媽末（Sultan Mahmud）對峙時，麻六甲行政權握在其子蘇端亞媽（Sultan Ahmad）手上。亞媽整編艦隊，補強麻六甲的柵欄（Stockades）²⁷，準備應戰。這時的柵欄防衛設施，應是木竹設施。雖然東南亞的磚石結構物存在很早，例如爪哇、柬埔寨、占婆的印佛教文化之都市城牆，或是印佛的宗教遺跡。在馬來半島吉打以北，雖有磚石材的佛教遺跡，但是馬來半島南邊一帶，包括麻六甲王國的宮殿應都是木造建築。而且在阿爾布克爾克攻城時，麻六甲的建築房舍與王國宮殿也都被破壞殆盡。²⁸

²⁷ J. Kennedy, *The History of Malacc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alay Sultanate*, p.62.

²⁸ J. Kennedy, *The History of Malacc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alay Sultanate*, p.64.

表 1 麻六甲史簡表

200-600A.D	巨石文化的出現
1300 年代	麻六甲王國 (Melaka Kingdom) 的建國
1403	最初的中國使節尹慶 (Yin Ching) 到訪麻六甲王國
1407	鄭和 (Cheng Ho) 到訪麻六甲王國
1411	拜里米蘇刺(Parameswara)訪問中國
1414	拜里米蘇刺信奉伊斯蘭教 (Islam), 改名為 Iskandar Shah
1424	拜里米蘇刺的兒子 Seri Maharaja 即位為麻六甲王
1447	第一次暹羅 (Siamese) 攻擊麻六甲王國
1456	暹羅攻擊麻六甲王國, Batu Pahat 被擊垮
1509	Diego Lopez de Sequiera 率領葡萄牙五艘軍艦來到麻六甲王國。歐洲人第一次到達這個群島。
1511	葡萄牙人阿伯奎 (Albuquerque) 攻擊麻六甲王國。8 月發生激烈的戰爭, 後來佔領了麻六甲。
1512	阿伯奎興建五層樓的城堡, 稱為 “Formosa” 後, 於 1 月又回到印度
1512	Sultan Mahmud Shah 攻擊葡萄牙所佔的麻六甲
1513	後來的蘇丹王 (Sultan Demak), 亦即 Patih Unus 攻擊麻六甲
1516	Admiral Hang Nadim 攻擊麻六甲
1518/19	Sultan Mahmud Shah 包圍麻六甲三個月
1523	Sultan Mahmud Shah 攻擊麻六甲
1525	Admiral Hang Nadim 包圍麻六甲, 切斷食物的供給。
1537	亞齊 (Achinese) 第一次攻擊葡萄牙所佔領的麻六甲
1545	Fr. Frances Xavir 第一次來到麻六甲, 前後共五次造訪麻六甲。
1551	Johor 王國、Japara 王國、Perak 王國連合軍, 連續攻擊麻六甲達三個月之久。
1553	死於 Sancier Island 的 Fr. Frances Xavir 被移到印度的 Goa 之前的九個月, 暫時埋於聖保羅教堂 (St. Paul's Church)。
1567/68	亞齊攻擊麻六甲, 得到 Johor 王國的助力攻潰麻六甲王國。
1571	亞齊攻擊麻六甲, 但是遭遇暴風雨而失敗。
1575	Japara 王國攻擊麻六甲
1585/86	Johor 王國攻擊麻六甲
1588	第一位英國人的訪問者 Ralph Fitch 來到麻六甲
1597	荷蘭(Dutch)第一次攻打麻六甲
1606	Johor 王國與荷蘭的連合軍攻打麻六甲
1615/16	亞齊從事麻六甲的防備工事, 以防他人的攻擊。
1628/29	直到亞齊撤退為止, 共統治了麻六甲 8 個月。
1636	荷蘭艦隊於麻六甲港口內, 擊垮葡萄牙艦隊。
1640/41	荷蘭對葡屬的麻六甲發動佔領前的最後一次攻擊
1645-70	荷蘭發生 Naning 內戰
1756	Daing Kamboja 的 Bugis 人進攻麻六甲
1784	Raja Haji 為攻佔麻六甲而登陸麻六甲, 但遭殺害。
1795	英國自荷蘭買下麻六甲
1806/07	英國破壞要塞城牆
1818	英國歸還麻六甲給荷蘭
1824	因「英蘭條約」的簽定, 麻六甲被置於英國的殖民統治下。
1831/32	英國發生 Naning 戰爭
1867	麻六甲成為英國領土
1942	日本佔領麻六甲
1945	英國奪回麻六甲
1948	麻六甲加入馬來聯邦
1957	馬來聯邦宣布獨立, 麻六甲同時也組織獨立的州政府
1963	麻六甲成為馬來西亞的一州

宇高雄志參考 “Municipality of Melaka Structure Plan Tourism Component” HSS Consult 製表 (未刊本)。

在阿爾布克爾克攻下麻六甲後，手下曾經建議摧毀這個城市，但是這與阿爾布克爾克要讓麻六甲繁榮成重要的商業貿易中心，以符合葡人在東方的利益之構想不同。²⁹麻六甲淪入葡人之手後，蘇端媽末敗走內陸，亞媽王子則停駐在稱為般淡（Bertam）的地方，並將其聚落城塞化，媽末則往更上流的 Batu Hampar 去。蘇丹王在敗走後的 15 年期間（1511-1528），卻未曾放棄奪回麻六甲的念頭，也不斷地派出軍隊進攻麻六甲，葡人也持續給予還擊。

於 1511 年 9 月，葡人進擊般淡，麻六甲王們再次撤退，經由更上游的 Hulu Muar，後沿著麻坡河（Muar River）到達柔佛的麻坡，其聚落名為 Padoh，並在麻坡河口建了一個要塞型的聚落 Bentayan。不久蘇丹王反過來發動對麻六甲的襲擊；於 1511 年末，阿爾布克爾克進行對 Padoh 的掃蕩，蘇丹王再度逃至麻坡。1512 年 1 月，阿爾布克爾克完成麻六甲城堡的興建，他本人離開麻六甲回印度臥亞（果亞）。於 1512 年 6 月，蘇丹王又回 Padoh，重設城堡於 Bentayan。於 1512 年 7 月，蘇丹王再度派遣 Hang Nadim 率領艦隊進擊麻六甲，與由 Fernao Peres de Andrade 所領的葡人艦隊交戰於麻坡河口的海上，蘇丹王又再度退至麻坡。於 1513 年 1 月，蘇丹王重建 Bentan 的 Kopak，統治至 1519 年。

在 1516 年至 1518 年間，蘇丹王派遣船隊至 Kuala Muar，去阻斷麻六甲的食物補給線。蘇丹王也在麻六甲缺乏糧食期間，攻擊麻六甲，這一次兩軍對峙於麻六甲附近的海上。結果仍是蘇丹王一方戰敗，撤回到 Bentan。於 1519 年，蘇丹王又從 Padoh 和 Kuala Muar 處出擊葡人，葡人派出艦隊回擊 Padoh，至 1520 年期間，雙方來來回回有幾次的戰爭，蘇丹王都無法取勝，終究還是撤回 Bentan 島上。其中，在 1521 年時，蘇丹王的軍隊兵分海、路兩線進擊麻六甲城，大象隊伍也被整編為進擊麻六甲城之用，但是因為內部作戰計畫意見的爭執，終又無功而返。

因為蘇丹王所領的馬來人，一直都是葡人在麻六甲的威脅，於 1521 年、1523 年、1524 年，葡人主動出擊 Bentan，但是都被馬來人打了回來，無法掃平 Bentan。終於在 1526 年 10 月，有了從印度來的艦隊，不但攻陷了孟加拉國（Bengkalis），接著進攻蘇端媽末的 Bentam Island 與 Kota Kara 及 Kopak 後，蘇丹王也終於不再派兵侵擾葡人的麻六甲。蘇端媽末也於 1528 年歿於 Kampar。³⁰

2. 麻六甲城堡

（1）城堡城牆的興建與型態

已如上述，葡人支配麻六甲後，蘇丹王仍然不斷地出兵襲擊麻六甲，想要取回其支配權。其實在葡人統治麻六甲的 129 年 5 個月期間，非但有前朝的舊勢力不斷挑戰麻六甲的防衛能力，從爪哇、亞齊等地來的挑戰也不小（圖 13）；³¹葡人受到的威脅還不止於此，到了 17 世紀後，荷蘭的威脅又逐漸增大（圖 14）。³²因此若要維持其在東方的商業貿易利益，興建堅固的城堡是絕對必要的條件。即使在擊敗蘇端媽末到石城牆興建完成期間也不敢掉以輕心，加設臨時性的防柵，以策安全。花了五個月的時間，終於在 1512 年 1 月竣工，其城稱為「A Famosa」。當時興建石城堡的工程並非易事，在赤道炎熱的天氣裡，僅有少許的米食，有不少人因病倒下，甚至丟掉生命。³³阿爾布克爾克決定興建石造城堡的同時，也命令在採石山岡（即後來的聖保羅山）的山麓下，城堡外側，用石材與石灰興建一座稱為聖母受胎告知教會與醫

²⁹ J. Kennedy, *The History of Malacc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alay Sultanate*, p.66-67.

³⁰ J. Kennedy, *The History of Malacc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alay Sultanate*, p.69-75.

³¹ 張禮千，《馬六甲史》（民國 34 年 4 月），鄭成快先生紀念委員彙編，商務印書館發行，頁 136-174。

³² 《馬六甲史》，頁 195-212。

³³ Samia Hayes Hoyt, *Old Malacca*, p.35。

院。³⁴（圖 15）

因為麻六甲是一個缺乏石材的地方，要從哪裡找來石材必須解決。後來因為有印度人的帶領，得知麻六甲國王墓山上可採石材（亦即聖保羅山），同時葡人也從海底採集可以做為石灰的一種石材（mader pores；真珠貝）。他們就以此作為石材之代用品。³⁵

城堡圍繞聖保羅山（St. Paul's Hill）成四方形，有塔或稜堡四處，牆有 2.4 米厚。四個塔有基督教名，亦即如「The Virgins」、「St. Peter's」之類的稱呼。³⁶在伊里德（Eredia）的圖中繪有 25 門的大砲（圖 16、圖 19），只是後來的荷蘭文獻稱有 70 門以上的大砲，實際情形已不可知。在城牆址的選擇上，還考慮緊急時可以讓援軍容易登陸的優點位置，西邊緊鄰海岸，北邊緊鄰河邊。³⁷

就守備的設施而言，除了西邊與南邊有我們所熟知的海、河作為屏障外，在葡領時期，於南邊與東邊，同樣有河川作為天然的屏障。這條河在 Baretto do Resende 於約 1635 年左右所繪的地圖中有標示（圖 17）；在 Eredia 的圖中繪有 Ribeyro de Aier lele 的河川。雖然這條河流在荷屬時期，已遭填埋，但仍可窺知在葡領期的城堡型態屬四面為河海所圍的要塞城堡。³⁸其中面向內陸的一面，或因較不受攻擊的威脅，所以使用防禦土牆（rampart）。城堡有四個門，其中最常使用的有兩個，其一被稱為海關門（the Customs Gate），面麻六甲河，可直通河上的橋；另一是在教堂聖安東尼歐（St. Anthony's Church）旁的門，可通往內地。³⁹但是這座城堡，如今卻僅留下稱為聖地牙哥門（Porta de Santiago）在 Jalan Kota 路上，門的上端還有荷蘭人在 1669 年時加上去的遁形紋章（照片 3）。⁴⁰

（2）城堡內部配置設施

在城堡內蓋有一些歐洲中世紀城鎮樣式的石造房子。其中包括數處的教堂與關於信仰的房舍，以及總督官邸、市政廳和兩間醫院。教堂中，一間蓋於 1557 年的大教堂（Cathedral）及一間蓋在 Our Lady's Hill（後來稱為聖保羅山；St. Paul's Hill）的山頂。⁴¹於 1548 年，又在聖保羅山上蓋有一間耶穌會修道院（the Jesuit College）。其它的城堡內的建築，主要是一些葡萄牙士兵、行政人員、商人的住宅與花園設施。⁴²

³⁴ 別技篤彥，〈□□□□領時代□□□□（□□□□研究 □二）—□□□□□□ □□□□植民地□原型〉，收錄於《史苑》（1966），日本：立教大學史學會，頁 140-141。

³⁵ 別技篤彥，〈□□□□領時代□□□□（□□□□研究 □二）〉，頁 142。關於石材的來源，亦有稱是利用原麻六甲王國墳墓與建築之石材，至於較硬的石材則是取自或是採自稱為石頭島（Island of Stone; Ilha des Pedras）的說法（*The History of Malaya, A.D. 1400-1959*, p.27）。

³⁶ 別技篤彥，〈□□□□領時代□□□□（□□□□研究 □二）〉，頁 141。四個塔的名稱，分別為面海的 St. Pedro, Santiago 與面河的 St. Domingo 及面向東稱為聖母（Madre de Deus），另外從 Eredia 的圖中有南側的千處女（Las Virgenes）。

³⁷ 實際上，在 1606 年 5 月，遭荷蘭軍隊攻擊時，有葡兵 50~60 名與馬來人 300 名乘坐兩隻小船靠岸增援。

³⁸ 別技篤彥，〈□□□□領時代□□□□（□□□□研究 □二）〉，頁 141。

³⁹ J. Kennedy, *A History of Malaya, A.D. 1400-1959*, p.27.

⁴⁰ Samia Hayes Hoyt, *Old Malacca*, p.37.

⁴¹ 張禮千，《馬六甲史》，頁 135。1545 年，葡僧聖芳濟 St. Francis Xavier 到麻六甲，即寓於此堂。1548 年，在堂旁設一學院，以教育葡人子弟，伊里德幼時即受教於此。1549 年，聖芳濟至日本傳教。1552 年底歿於廣東上川島。翌年移葬於聖保羅教堂中，至 1553 年 8 月再次移葬至果亞（臥亞）。今此堂遺址仍存於山巔，而聖芳濟之空墓亦在，足資憑弔。

⁴² Samia Hayes Hoyt, *Old Malacca*, p.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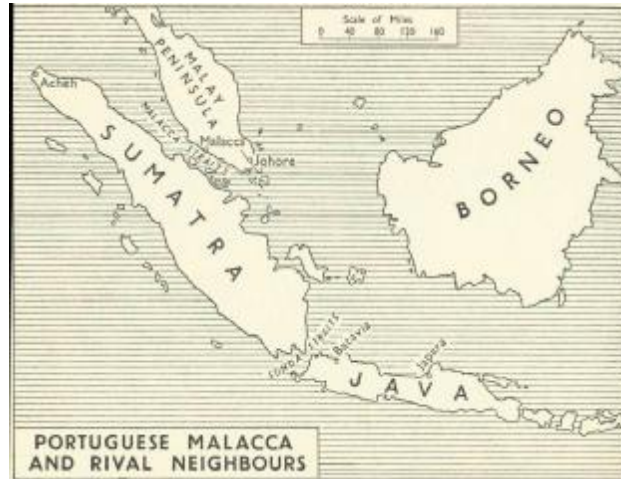


圖 13 葡屬麻六甲與其附近的宿敵。資料來源：J. Kennedy, *A History of Malaya*; A.D. 1400-1959。

其他文獻也作類似的記述，到了 1583 年，麻六甲已有一隊擁有七座大砲與 50 支短槍的砲兵隊防衛的城市。在靠海的一邊蓋有行政首長的官邸 (a governor's palace)，主教的官邸 (a bishop's palace)，五棟教堂 (包括一棟天主教堂)，行政機關的建築，一處監獄，兩處井，兩所醫院，一處學校，宗教修道院。⁴³根據伊里德的描述，在 1613 年時，有 300 名的葡萄牙男人與他們的家人及一隊守備士兵在城堡內。⁴⁴

遠觀麻六甲，最為凸出的是高 36 公尺高的高塔。⁴⁵ (圖 18、圖 19) 這座高塔是位於靠近河口的一角，四層石造塔，其週圍圍有與城牆厚度相同的圍牆。總督官邸位於高塔內部的二樓處，房間為四角形，其它的房間是總督的客人住宿空間，也有可貯存彈藥的空間。一樓貯存約 200 萬磅的米。總督官邸位於俯瞰全城的高塔中，自成一城堡中的城堡。⁴⁶

根據別枝篤彥引用伊里德的敘述說：「市政廳 (Camera da Cidade) 緊鄰面海城牆的內側，是召開關於麻六甲殖民地政務會議的場所。其行政組織之組成有總督、主教、其它神職人員、市政府職員、慈善院的職員、財務官、以及原有住民的非基督教徒居民管理代表 (Syahbandar) ⁴⁷ 等人。因為麻六甲有為數不少的居民，他們都住在城外河北的區域，這也是行政會議裡為什麼要有城外居民代表之原因」⁴⁸。

西方殖民城市還有一件隨西方人東來的特色，亦即在異地的殖民者為使自己的健康醫療得到有效管理，因而有醫院的興建；另一方面，雖然因為基督教的信仰，為了居民所蓋的「貧民醫院」，然而必須將他們與殖民者間作一些區隔；因此蓋了兩所各屬的醫院。據別枝篤彥的說法，就連屬於歐洲人醫院都難找尋住院醫生，更何況是一般平民專屬的「貧民醫院」，當然人員與設備都不足。⁴⁹

⁴³ Samia Hayes Hoyt, *Old Malacca*, p.37.

⁴⁴ J. Kennedy, *A History of Malaya*, A.D.1400-1959, p.27-28.

⁴⁵ Samia Hayes Hoyt, *Old Malacca*, p.37. 這裡的塔高 36 公尺，令人懷疑，必須作進一步的求證。

⁴⁶ 別枝篤彥，〈□□□□領時代□□□□ (□□□□研究 □二)〉，頁 141。

⁴⁷ 雖然原文稱原有住民的非基督教徒居民管理代表為 Bendahara，但是以字義而言應為 Syahbandar。

⁴⁸ 別枝篤彥，〈□□□□領時代□□□□ (□□□□研究 □二)〉，頁 142。

⁴⁹ 別枝篤彥，〈□□□□領時代□□□□ (□□□□研究 □二)〉，頁 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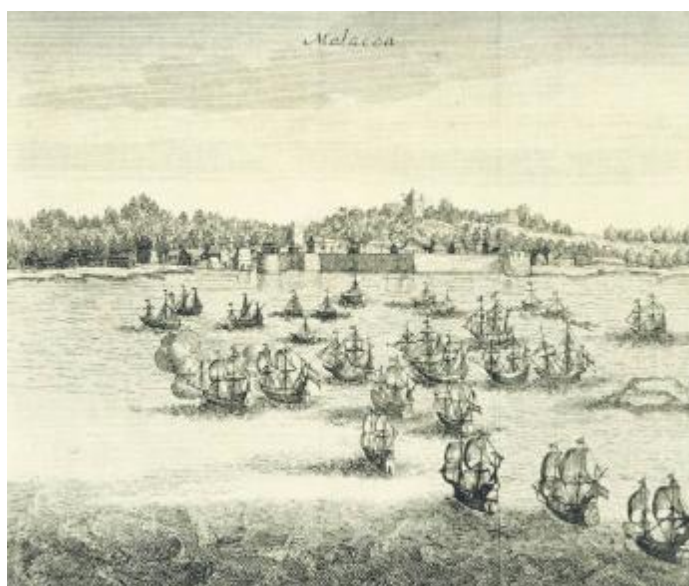


圖 14 麻六甲港口外的葡荷海上戰役（1606 年）（From ‘Recueil Voyages qui ont servi à l’établissement et au progrès de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 formée dans les Provinces des Pais-bas,’ translated by R.A. Constantin de Renneville, 7 vols. Amsterdam 1702-7）。資料來源：J. Kennedy, *A History of Malaya, A.D.1400-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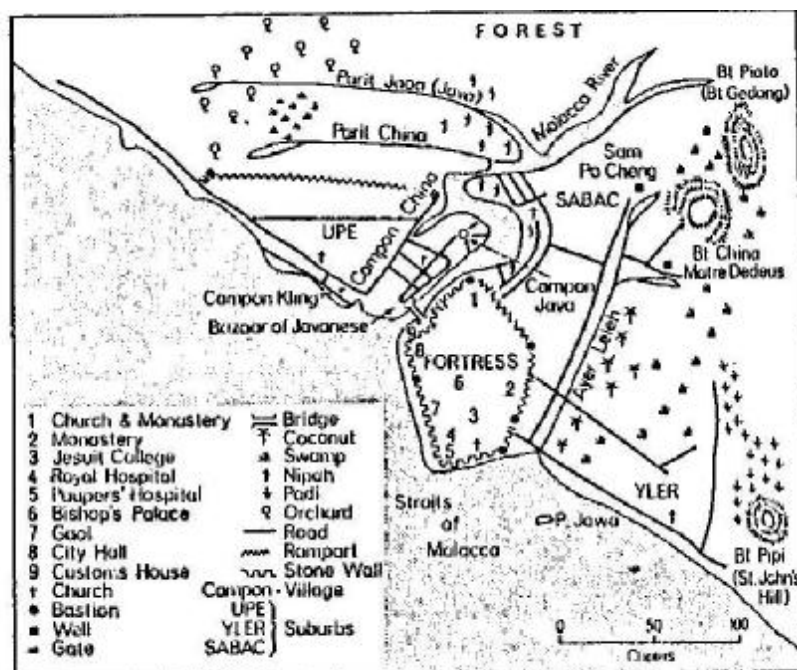


圖 15 葡萄牙統治時期（1600 年左右）麻六甲圖。資料來源：T. G. MacGee, *The Southeast Asian C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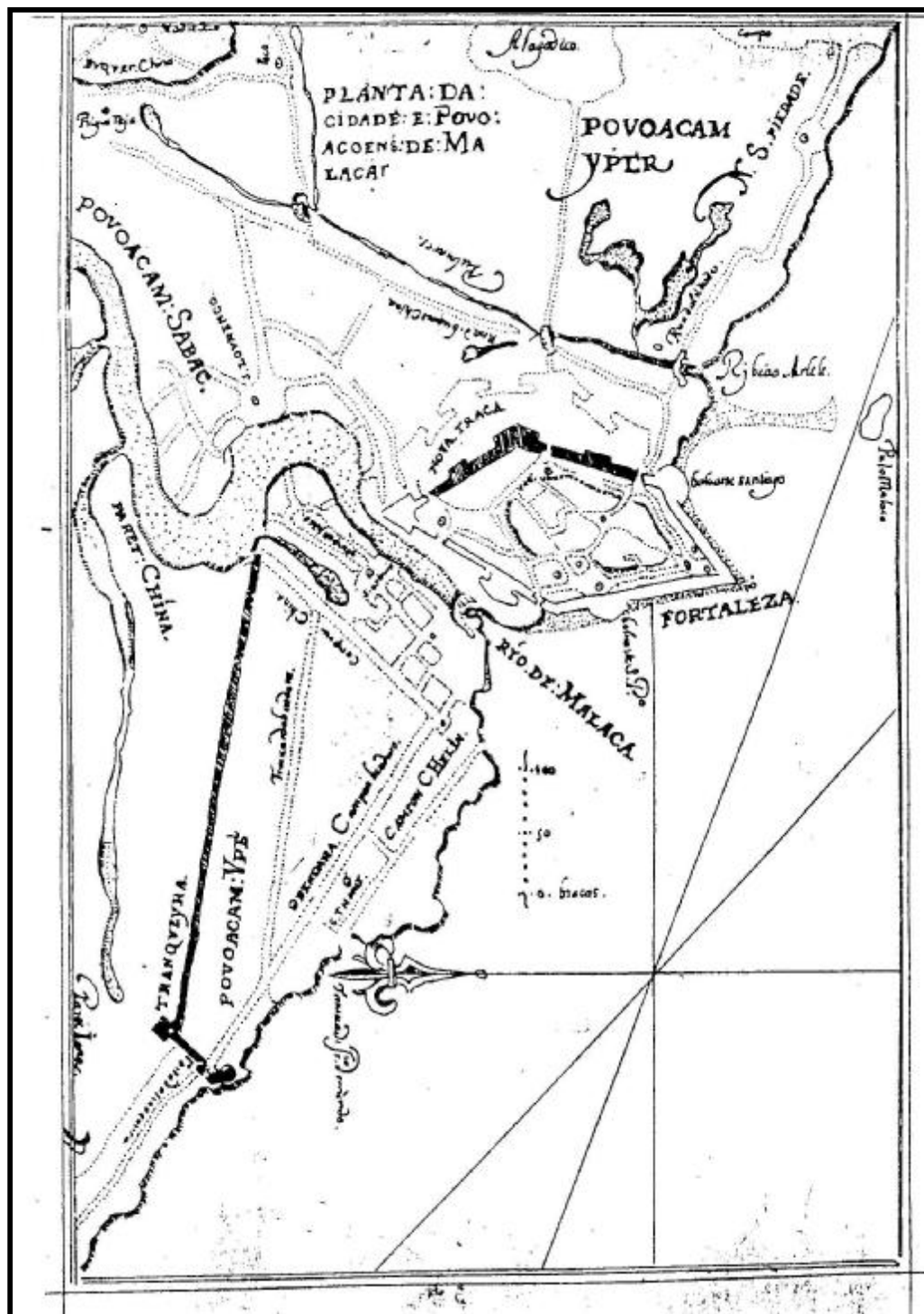


圖 16 伊里德（Manuel Codinho de Eredia）所繪「Planta da cidade e provoacoens de Malaca」。Declaracam de Malaca, 1613, Bibliotheque Royale, Bruxelles.



圖 17 麻六甲受困亞齊圖 (1629) (引自 Antonio Bocarro, *Livro das Plantas de Tôdas As Fortalezas, Cidades, e Povoações do Estado da India Oriental*) (Sloane ms. 197, ff.381-2, British Library, London)。資料來源：Sarnia Hayes Hoyt, *Old Malacca*, 圖版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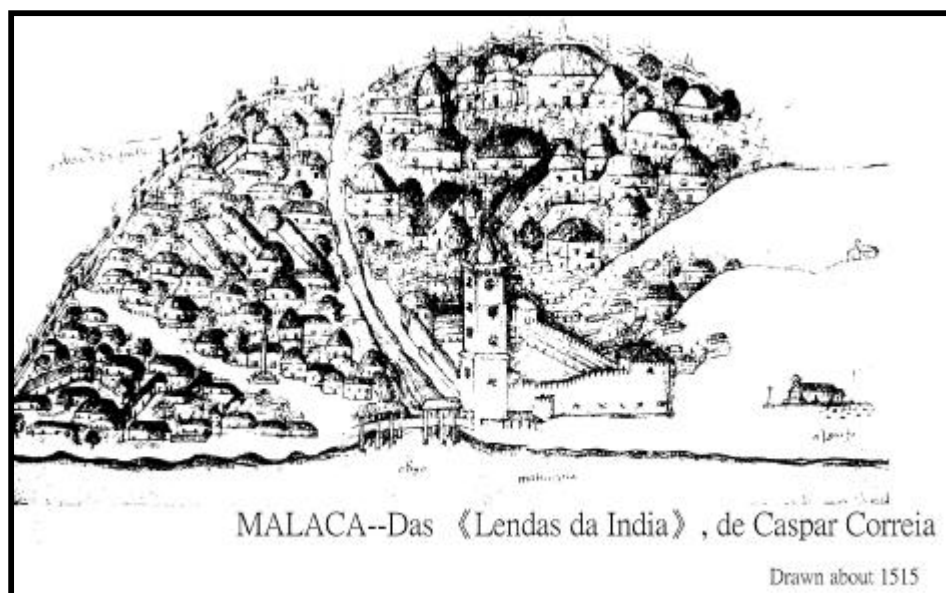


圖 18 1550 年 Gaspar Correia 所繪的麻六甲圖 (市街地被分為兩部分，左岸有小山岡，河口處有塔狀的城堡。河口的架橋上附有屋頂，畫面的右下角為教堂，市街地為木柵所圍，右岸的主要街道有門。左岸的小山岡，荷蘭時期叫做「聖保羅山岡」，葡萄牙時期為「聖母山岡」)。資料來源：*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Malaysian Branch* (JMBRAS), 28 (2) (1955)。



圖 19 葡屬麻六甲城堡 (Fortaleza Malacca)。資料來源：J. Kennedy, *A History of Malaya, A.D.1400-1959*。



照片 3 聖地牙哥城門（Porta de Santiago）。葡萄牙於 1512 年興建麻六甲城堡，於 1641 年與荷蘭發生戰爭時遭到破壞，於 1670 年修復完成。後來被英國人所毀，只剩下這座城門。資料來源：筆者攝影。

3. 麻六甲河北岸多民族區域並存的城市

(1) 繼承麻六甲王國多民族區域配置

葡人佔領麻六甲後，在河南岸的舊有麻六甲王國的王族宮殿之基地，重新建設屬於葡人的統治城堡區域。在河的北岸，早期雖然驅逐了中央市場區的爪哇人，後來他們也逐漸回流，亦即維持了前朝的城鎮區劃，有原有的馬來人、淡密爾人（Tamils）、爪哇人、中國人社區。

在城市北部的邊界處，麻六甲河與海之間，築有一條東西方向的防禦土牆；在土牆的兩端，設有門道，靠海的這一端設有砲台與槍台防衛（亦即石頭的堡壘；Baluarte de Pedra）。自從葡人的軍事與行政中心置於城牆內聖保羅山邊，相關文獻就用郊區（suburb；Povoacam）這個術語，來描述位於河岸北邊的老城鎮區，當時用防衛土牆將整個北邊的庶民生活區圍繞起來。稱它為烏八區（Upè），或是 Tranqueira（葡文意為堡壘）。一旦面臨外敵襲擊時，居民們可以渡過麻六甲河，進入城堡內去避難。⁵⁰烏八區在前朝時就已經形成重要的市街，也是麻六甲三處郊區中，居住人口密度最高、最熱鬧的地方。此處是亞洲人在麻六甲居住的中心，也就是麻六甲城市最本質的部分。因為此處居民由多種民族所組成，不得不採各民族集體分區居住的配置型態。⁵¹

烏八區離河口最近的地方為「爪哇人的市場」（Bazar de Iaos），此處就是所謂的麻六甲中央市場。「爪哇人在此處販賣各種的米糧穀物，小船每天早上從爪哇運來米糧到市場上去賣」。麻六甲不適穀物生長，要仰賴早有「東南亞穀倉」之稱的爪哇之處甚多。在爪哇人遭驅離的期間，中央市場處曾經一度凋零，後來爪哇人才再度回來聚集於此，提供各種食物糧食。據 Macgregor 所言，於葡萄牙時期，在中央市場處活動的爪哇人，並非是爪哇本土人，而是 1625 年被葡人強迫從新加坡海峽南部 Bintan 島附近遷來的爪哇系人。還有，據□□ - □□所言，每日也有小船從蘇門達臘，運來米及其他食物，在「爪哇人市場」上作買賣的也有蘇門達臘人。這些在市場上活躍的爪哇人，集中在其北邊的 Kampong Java 處，過著他們聚居的集體生活。現在麻六甲有稱為 Kampong Java 的地方，位於河川的南岸，這與葡萄牙時期不同，當時的 Kampong Java 位於現在的 Kampong □□□□附近。⁵²

在爪哇人區的北邊是 Kampong China，意即華僑聚集的居住區。這區域在今日的 Second Cross Street 附近。「構成烏八區的一部份，從爪哇人市場與河口處向東北延長約 400 □□□□之間，到達土牆端與中國人門（Chincheos）處，並超過土牆到 Nyperias 的濕地附近」。當時中國人的人數並不多，在荷蘭佔領時期（1641）約有 300~400 人，已營集體生活。大部分是福建出身的華人，同時已有少許非中國人的居民混雜其中。⁵³

Kampong China 的西北邊，沿海岸處是 Kampong Chelin；這是出身印度 Coromandel 海岸的印度貿易商之團體聚居處。但是「因為這些地區位於海岸邊，當麻六甲遭外敵攻擊時，常成為最先的犧牲者」。如今在舊市區內仍留有 Kampong Kuli 的街名。在它的背後是 Kampong Bendara（這個 Bendara 應該是前朝政府高官的指稱，稱其為 Bendahara，而 Bendara 是其轉音後的稱呼⁵⁴），它是王國時期馬來人的居住區域，其中栽種果樹園的也不少。⁵⁵

麻六甲還有兩處「郊區」，亦即位在內陸，稍微上游處的 Sabac（Bunga Raya），以及 Yler

⁵⁰ J. Kennedy, *A History of Malaya A.D.1400-1959*, p.28.

⁵¹ 別技篤彥，〈□□□□領時代□□□□（□□□□研究 □二）〉，頁 144。

⁵² 別技篤彥，〈□□□□領時代□□□□（□□□□研究 □二）〉，頁 144。

⁵³ 別技篤彥，〈□□□□領時代□□□□（□□□□研究 □二）〉，頁 144。

⁵⁴ 在非基督教居民區，理應與宰相的 Bendahara 關係較遠才是，不知為什麼有 Kampong Bendara 的稱呼。

⁵⁵ 別技篤彥，〈□□□□領時代□□□□（□□□□研究 □二）〉，頁 145。

(Banda Hilir)。Sabac 人住在麻六甲河上的木造房舍，在河及其附近的沼澤區捕魚，並在內地採集木材及燒木炭為生。Yler 位於城堡的南邊，此地居民以東爪哇及其周邊的爪哇人為主，與住在烏八區的爪哇中部北岸及西爪哇人出身不同。Yler 的居民住木造茅草頂的房舍，以捕魚、農耕為生，Yler 的南端有葡萄牙兵的守衛小屋，這是作為監視 Yler 地區的軍事設施。⁵⁶

(2) 繼承多民族區域配置的原因試探

前面一再提及在葡人佔領麻六甲之初，因為宗教理由，曾經驅逐信仰伊斯蘭教的爪哇人，終因食物供給無人，只好喚回爪哇人，並令其仍定居於爪哇人的村落。在此也約略可以窺知葡人不得不維持原有麻六甲都市人口組成之現實。不僅如此，甚至對外國居民的管理制度都原原本本地承繼前朝制度。亦即，在外國人社區所設置的港都首長 (Syahbandar) 制度，僅改其名為「甲必丹」，制度本身則繼續沿用。考慮麻六甲自古以來就是國際貿易中心，其定居人種之複雜或許這是必然的現像。

但是麻六甲王國本身不直接參與貿易活動，經由吸引外人前來麻六甲進行物產交換，以獲取港口的稅收，間接投資以獲取利潤，這是蘇丹王想出來的自主營運制度。葡人一方面徵收港口稅外，也直接從事貿易工作，其政策不只排斥伊斯蘭教商人，還常常排斥、逮捕、沒收航行於麻六甲海峽及其附近的西班牙、荷蘭的貿易船隻，亦即如何取得獨佔的貿易網絡是其獲利的保證。在這種情形下，為什麼不驅逐麻六甲的外國人，以確保獨佔的利益？其實，東西方的香料貿易，並非單獨由葡船從里斯本出發直抵摩鹿加群島可直接進行的貿易工作。

關於東西方間的貿易必須依靠各航段住民的通力合作才能竟其功的情況，目前無法找到直接資料證明，然而因為手邊有生田滋引用湯彌畢雷斯的《東方志》(Suma Oriental)，說明這個貿易由下列幾段地域性網絡所組成，僅以麻六甲至摩鹿加群島間的貿易為例說明。亦即，由住在麻六甲的馬來人將印度所產的紡織品載上船去，運往中部爪哇的□□□□，並在當地將大部分的印度紡織品販賣完了後，換成爪哇生產的粗糙紡織品與中國輸來的粗質私人鑄造之錢幣 (kasu)。接著商船從□□□□出發，開往松巴哇 (Sumbawa) 島，把在爪哇所購得的紡織品與錢幣與在松巴哇購得要運往摩鹿加的紡織品、米和其它的食物交換，再將第二次換得的貨品帶到班達群島 (Banda)。在班達島將松巴哇島所產的紡織品、米和其它食物與班達群島 (Banda) 所產的肉荳蔻交換，或是與從摩鹿加群島運來的丁香交換。⁵⁷

對葡人而言，擁有麻六甲雖然意味掌控了香料貿易的主導權，但是這並不意味所有的商品的調配與交換過程都需要自己收集販賣才符最大利潤。在前朝的麻六甲王國時期，麻六甲已成為東方班達群島與摩鹿加群島香料的集散中心，也是從西方的古吉拉特 (Gujeratis)、Coromandel 海岸、馬拉巴爾海岸 (Malabar Coast)、孟加拉 (Bengal) 等地的紡織品運來東南亞的分配中心地。張禮千引巴布先 (Duarte Barbosa) 的話做如下的陳述。因為巴布先是阿爾布克爾克的妻舅，也是麥哲倫 (Ferdinand Magalhães) 的從兄弟，於 1500 至 1517 年間，曾服務於東方葡萄牙政府，對於當時麻六甲商販的情形，有相當詳細的記述。

「於此有各色之躉售商人甚多，有摩爾人⁵⁸，有異教徒，其中來自注輦⁵⁹者為數不少。人

⁵⁶ J. Kennedy, *A History of Malaya A.D.1400-1959*, p.28. 別技篤彥,〈□□□□領時代□□□□(□□□□研究 □二)〉,頁 145。

⁵⁷ 生田滋,《大航海時代□□□□諸島—□□□□、□□□□、□□□□王國□丁字貿易》,頁 32。

⁵⁸ 摩爾人,歐洲人指稱非西北部的 Maghrib 伊斯蘭教徒為摩爾人 (Moor)。原來指稱 Maghrib 的原住民,於 8 世紀時稱征服伊比利亞半島的伊斯蘭教徒,11 世紀以後用來稱非洲西北部的伊斯蘭教徒,15 世紀以後泛稱一般的伊斯蘭教徒。

⁵⁹ 《大漢和辭典》,注輦是國名,中國宋代時期,位於印度的 Coromandel 海岸,宋代來朝貢。梵名為

極富有且備大舶，厥名曰 Junco。彼等積集種種貨物，任往各地貿易。又有不少船舶來此裝運砂糖，船具極佳之四帆。其載來者為大量之絲，乃精良之絲也，又無數瓷器，緞子，織有浮花之錦緞，各色之綾羅、麝香、大黃，各色之絲線，甚多之鐵、硝石，大量精美之銀，豐富之珠，各種小粒真珠，鍍金之箱櫃，扇子，及種種美觀之玩具。凡此貨品，售與馬六甲之商人常得善價。彼等乃買滿載胡椒，香料，染成透色之甘瑟逸（今印度北部西岸之 Cambay）布，紅藍（染料），可琢種種飾品之珊瑚，來自榜葛刺（Bengal）之印花白棉布、銀朱、水銀、雅片及其它貨品而去」。⁶⁰

從這段描述，可以充分理解當時的麻六甲駐留有多民族多地域的商人，在東西貿易的大航海路線上，各別扮演了各區域間的分工角色。葡萄牙雖然征服了伊斯蘭教的麻六甲，但是為了維持麻六甲為東西貿易貨物集散中心地的角色，仍然歡迎各地多民族的貿易商人定居麻六甲，這樣才能符合維持麻六甲繁榮的期待。只不過因為葡人與伊斯蘭教徒是幾世紀以來的宿敵，所以葡人可否平心靜氣接受信仰異教的異民族前來麻六甲定居，或是共同從事商業貿易工作？下面檢討當時葡人在麻六甲傳教與教堂興建情形，希望能對此疑問提出可能的解答方向。

4. 基督教堂的興建與傳教

前面曾經提及葡萄牙的東來，除了追求商業貿易利潤之外，也懷有高度的宗教熱情，一心一意想找尋東方基督教國家，這也是葡人進行建構海洋國家之所以能夠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想像葡人對當地居民的改宗信仰基督教有高度的熱忱，也必然積極去從事教會教堂的興建工作。阿爾布克爾克在攻陷麻六甲城後，即刻指示興建城堡與聖母受孕告知教堂（Nossa Senhora da Anunciada），這座教堂位於聖保羅山麓下。⁶¹其它還有聖母升天教堂、聖母訪問教堂、以及聖多明哥教堂、聖安東尼歐教堂五個教堂。⁶²

關於麻六甲教堂興建的情形，張禮千在《馬六甲史》中作了一些整理。亦即在烏八區（Upeh）內有兩座教堂，在中國村內者為聖史梯芬（S. Estevao），在吉寧村者為聖湯馬斯（S. Thome）。信徒共有 2,500 名。在 Yler，及今之怡里（Banda Hilir），區內有一主要的教堂，稱為慈悲聖母堂（N. S. de Piedade），教徒有 1,300 名。另外在 Sabba 區，及今日的無牙拿也（Bunga Rayar；街名，亦即大紅花），區內亦有一主要教堂聖勞陵斯（S. Lovrenço），教徒有 1,400 名。離城郊較遠處，還有三處教堂，計有信徒 2,200 名。亦即，在三處郊區的範圍內，有 4 處主要的教堂，信徒約有 7,400 名。

據伊里德所言，當時麻六甲共有 8 個教區，4 個修道院，14 處教堂，2 處小教堂。根據張禮千引用 1641 年荷蘭人奪佔麻六甲後，派遣旭筭（Justus Schouten）所作的調查報告，說麻六甲有 19 處教堂。亦即（1）Cathedral of St. Martyrs，是主要教堂，建築宏偉，位於聖保羅山麓，內有祈禱所 8 處，僧員 36 名。（2）Misericordia，是精緻的小教堂，亦位於山麓，內有祈禱所 3 處，僧員 13 名。（3）Monastery of St. Domingo，是最大但最貧的教堂，位於麻六甲城東北隅。其地之城門亦稱為聖多明哥，於此處有一堡壘。堂內有祈禱所 6 處。（4）聖保羅教堂，建於山頂，適位城之中央。塔高百呎，並有一精美之花園，內有祈禱所 3 處，僧員 14 名。是麻六甲最富之教堂。（5）St-Augustyn，位於城牆之東。（6）Madre de Dios，位於三寶山巔，

Cola，阿拉伯語為 Culian，注聲即期音譯。明史作瑣里，是土名 Soli 的音譯。

⁶⁰ 張禮千，《馬六甲史》，頁 131-132。

⁶¹ 在 1518 年時，在俯瞰城堡位置的聖保羅山頂處蓋有一小型的教會，這就是現存於山岡上已成為廢墟的聖保羅教堂。

⁶² 別技篤彥，〈□□□□領時代□□□□（□□□□研究 □二）〉，頁 142。

外圍土牆，內有庭園，風景秀麗，氣候宜人，內有祈禱所 3 處，修道士 7 名。⁶³ (7) Nossa Senhora da Piadado，位於城南郊之怡里。(8) 聖湯馬斯。(9) 聖史梯芬。(10) 聖勞陵斯。(11) Nossa Signo dos Buonos Novos，此堂離城半英里，在麻六甲河之左，約在今之 Bona Vista 路末端。(12) Nossa Signo da Guada Ioupe，位於離城四哩之今 Tampoi 地方。(13) Nossa Signo da Empara，位於城北 2 哩之 Batang Tiga。(14) St. Guilhelmo。(15) St. Jermino。(16) Nossa Signo da Victoria。以上是城外的小教堂。(17) St. Juan Baptista，位於城南之聖約翰山 (St. John's Hill)。此外尚有兩小教堂附於醫院內，一稱為 Hospital del Rey，亦即王家醫院。一稱 Hospital des Povers，亦即貧民醫院。⁶⁴

荷人旭簽的報告與葡人的資料應有重疊之處，但可察知葡人極力推動在地外國人的改宗信仰基督教，積極興建教堂是不爭的事實。別枝篤彥計算葡領時期麻六甲城的人口，結果推估在 1560 年代，約是 10,000 人左右。在麻六甲王國時期，大部分的住民是馬來人，但是初期因為採取宗教不寬容政策，有不少馬來人因而被驅逐出境。前文曾經提及，伊里德說當時在麻六甲的葡萄牙人只有城堡內的 300 名男性及其眷屬，在如此看來，上述的城堡外郊區的 7,400 名基督教徒是居住在麻六甲的外國商人或是回流後的馬來人。教徒在總人口之比例有七成四，可知葡萄牙人在麻六甲對亞洲人傳教的熱心與成果，甚至有來自印度 Coromandel 海岸的 Chelin 人改信基督教的「奇蹟」發生。

從這現象可以瞭解宗主國的少數民族為了統治上的安全，也將居民改宗視為統治的重要政策。也就是說，雖然為了維持葡人的商業貿易的利益，必須鼓勵依據各地物產與種族，使他們能夠扮演負擔當地運輸流通當地物產的責任。這樣才能符合葡人的最大利益。但是因為葡人對伊斯蘭教異教徒的偏見，仍然積極勸導當地居民信仰基督。

然而這種半強制性的改宗政策卻引起了一些反效果。換言之葡萄牙雖然無法掌控，但確實在貿易上傾向採取獨佔的政策。凡是入港來的船隻，一樣都要抽取 10% 的稅金。因為這些傾向，造成王國時期的自由港性格盡失，都市人口也逐漸下降。在 1678 年時，麻六甲的人口僅有 4,884 人，比起前朝全盛時期的 40,000 人，要少了許多。⁶⁵

五、結語

從本文的討論與分析，可知葡萄牙的東來亞洲甚至到達東南亞，其實因為地中海東部與北非的伊斯蘭國家阻礙了西歐國家與東方國家間的商業貿易網絡，以及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國家間的權力鬥爭為主要的原因。位於直布羅陀海峽邊的葡萄牙，利用過去歷史及地理上所累積的優勢條件，得到邁向海洋進行海洋貿易與探險工作的優勢。一方面尋求香料貿易的經濟

⁶³ 黃蘭翔，〈滿刺加國的創立與東南亞都市雛形之出現〉。曾經推論三寶山附近是中國明代鄭和下洋時，軍隊駐留之所。當時所能推論的根據其實是消極的，因為僅就作者所知，於 17 世紀初期，該地已稱為 Bukit China，再也找不到其它更早的證據可以證明中國人的蹤跡之下，只好承認三寶山有烙下鄭和的足跡。

別枝篤彥，〈□□□□領時代□□□□ (□□□□研究 □二)〉，頁 145。其實，在葡萄牙統治後期的 1581 年，義大利人的□□□□□□。□□□在山丘頂端蓋有教堂及□□□□□□派的聖母修道院 (Madre de Deus)。□□□□□曾經有如下的描述：「在城堡砲台的砲擊範圍內的 Bukit China 的山頂，蓋有高貴的建築物，其背後與側面的一邊有優美的庭園，並用防禦的土牆圍繞。這裡是麻六甲最健康、最美的場所。在此居住的人是□□□□□□派的僧侶，設有三處祭壇，裝飾得美輪美奐」。這個教堂似乎在荷蘭攻佔麻六甲的 1641 年時還存在，後來就成為廢墟，不久後就變為如今所見的中國人巨大墳場了。

⁶⁴ 張禮千，〈馬六甲史〉，頁 134-135。

⁶⁵ 別枝篤彥，〈□□□□領時代□□□□ (□□□□研究 □二)〉，頁 147。

利潤，另一方面尋找非伊斯蘭教的基督教國家。

麻六甲王國從 15 世紀前半葉起，即利用活躍於印度洋與東南亞海域間的伊斯蘭商人，作為繁榮本國的重要資源。順勢接納吸引各地的船運商人前來麻六甲從事貨物交換之貿易，王國也從其商業貿易中獲得利潤。那些來自各地的商人，如孟加拉或是印度的伊斯蘭商人，沒有想要征服麻六甲王國的殖民企圖；在中國這一方面，雖有華人前來移民作商船貿易，但是作為國家的朝廷，也不介入商業利益，不特別講究對僑民的保護政策。

西歐新興航海殖民國家與上述那些亞洲各地前來麻六甲進行貿易的商人不同，葡人前來東方是有皇家在背後支持，隨著商船亦有軍事力量作後盾。為保衛商館據點，新建磚石造的守衛城堡，配以軍隊士兵的守衛。麻六甲也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在葡人佔領麻六甲後，立即興建石造的城堡，這個城堡也實際在與前朝王國舊有勢力軍事鬥爭中，或是與其它如亞齊、爪哇的軍事衝突時，發揮應有的功能。葡萄牙一本祖國與伊斯蘭教發生激烈對抗的態勢來到麻六甲，因而也對伊斯蘭教徒採取強制驅逐的手段，興建天主教堂，為防範從各處前來攻擊，興築了城堡，帶來了過去不見於東南亞的宗教與城市經營方式。

但是從另一層面，又因現實上必須依賴各地不同人種的商人，將各地貨品集中於麻六甲，因而也繼承了麻六甲王國因應不同出身背景人群共同居住於同一城市的多元文化，多樣性的城市。不過其強調要進行宗教信仰的改宗，能夠回來定居的大部分商人，似乎也是改宗後的居民。

統治階級的蘇丹王貴族們在麻六甲河的南邊，興建有宮殿及清真寺；一般的城市居民則住在河的北岸，按種族指定不同區域作同族聚集而居的配置。這種將統治階級與一般庶民分開，以及一般庶民按種族分區配置的城市空間指派，被葡萄牙人承襲下來。於河的南岸則為葡萄牙總督官邸、市政廳、醫院、教堂、行政官員及神職人員、軍隊士兵的住宅設施的城堡；庶民分配在河的北岸。這種「麻六甲模式」的個案並不止於麻六甲，西方殖民宗主國進出亞洲後，逐漸發展成形的殖民地模式，乃至後來的東南亞甚至東亞的殖民都市，基本上是在沿用這個基礎模式發展出來的。

支那人／華馬關係：馬來小說中的華裔鏡象與敘事策略^{*}

莊華興

馬來西亞 Putra 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講師

一、前言

華族和南洋的淵源可以追溯至公元三世紀，有標誌顯示中國在此時曾派出使團去考察並記述南洋各國（王賡武，1988：208）。華人出現在馬來群島的歷史則始於唐朝末年。按西元九四三年阿剌伯人 Mas'mudi 的記載，黃巢之亂時，唐人為避難流寓蘇島巨港（Palembang）者頗眾。此後據高僧義淨和元代汪大淵的記載，當時吉打和龍牙門（即新加坡）皆有漢人蹤跡。至明朝鄭和七巡馬六甲，華人居於馬來亞者也不在少數，當中以來自中國南部沿海一帶的商人居多。他們和其他族裔商販一樣，通過馬來王朝委任的港口代表進行貿易，並隨著季節與風向的變換安排行程，鮮少滯留當地。

十九世紀中期之後，隨著西方勢力進駐馬來群島，大量中國勞工以賣豬仔與契約勞工形式進入馬來亞，主要安頓於種植業與採礦業領域。基本上，華人從十九世紀中晚期至二十世紀前半葉的移民風潮是西方資本主義擴張和近代中國國是蝸蟬的歷史產物。¹易言之，如果近代中國政治清明，秩序安定，便不會有往外避難、求存求溫飽的移民浪潮，而西方列強缺乏中國廉價苦力，亦無法有效在南洋諸邦擴展其資本主義經濟掠奪，則華族在馬來人的觀念與意識中自然有另一番面貌，倒是可以想像的。

二、他者鏡象：不在場的社會史

歷史大敘述告訴我們，華族和馬來人的關係一開始是以商業聯繫為基礎的。中國使節或旅行家對南洋的記載頗多，惟主要集中在自然風物，對當地人文與社會活動的紀錄並不多見。因此，欲考察十八世紀以前華人和馬來人的交往情況頗不容易。十八世紀下半葉英人勢力逐步進駐馬來半島以後，華人社會甲必丹／僑領和馬來貴族或統治階層的交往開始明晰。Barbara Watson Andaya 和 Leonard Y. Andaya 在《馬來西亞史》（1983）談到華馬關係時，提到十九世紀中期馬六甲土生華人徐炎泉（Chee Yam Chuan）和當時盧骨馬來貴族 Raja Jumaat 家族過從甚密，後者律師出身的兒子 Raja Bot 更曾經居住在馬六甲徐炎泉家裡，扮演前者的生意仲介人（頁 161）。在柔佛，Temenggung Ibrahim 和兒子 Abu Bakar 也通過提倡甘密和胡椒種植業，和華人甲必丹建立了密切的關係。至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當殖民政府中仍找不到一位通曉華人方言的白人官員時，柔佛宮廷里已經有至少一位通曉潮州方言，並掌握閱讀和書寫漢字能力的馬來行政官（頁 162）。這可看出柔佛馬來統治者和華人商賈的交情之深篤。惟這些關係都建立在商業利益之上，民間的接觸和交往情況並不顯著。尤有進者，在東方主義學者的正

^{*} 本文發表於「2003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主辦，2003 年 4 月 25-26 日。

¹ 近代中國移民浪潮大約可以太平天國革命（及搜捕餘黨）為肇端，爾後有甲午中日戰爭、孫中山先生革命、七七抗戰、國共內戰等，無不殃及民生，南渡浪潮一波緊接一波，尤以華南沿海一帶為甚。

統史觀主導之下，以帝王將相史為馬來亞近代史的正宗不可謂不無作用，基本上它以政治利益為考量—塑造封建馬來貴族與統治階層的高大形象，有助於威嚇老百姓，²也間接提醒移民社會及其後裔無可剔除的外來標籤。這就說明為什麼本邦社會史的編寫至今仍毫無眉目。鑒於此，文學文本作為社會史文獻在此時便顯得非常重要了。

三、馬來小說家與華族人物

華裔角色在馬來新文學中出現大約始於上世紀二十年代。1929年，具伊斯蘭背景的作家 Ahmad bin Haji Muhammad Rashid Talu 出版第三部長篇小說《受磨難十二次》(12 Kali Sengsara)，其中出現一個稱作 Swee Hoo 的已婚華裔女子，她鍾情於一名叫雅赫雅的有婦之夫，毅然和丈夫解除婚姻關係，下嫁那位馬來青年，並改信伊斯蘭教，取名法蒂瑪。這部作品的可貴之處在於：它不像往後書寫華族的小說，把華族妻子描繪成家庭和諧的破壞者，或誘使丈夫墮落的女人。這種敘事方式並沒什麼問題，可說是個良好的開端。³

針對馬來文學中的華裔角色，已故文藝批評家 A. M. Thani 認為這說明馬來社會在觀念上已經能接受外來移民作為他們的社會生活伙伴之一。(見氏著，1990：23)此後十多年間，馬來作者對華裔角色的描繪未曾間斷，惟思想觀念與處理手法已經改變，之前的寬厚熱情在殖民主義者巧取豪奪的經濟政策下在馬來族群中引發強烈的排外仇華情緒。清廷於 1893 年撤銷海禁，為移民開方便之門，隨後殖民政府施行開放門戶政策，因而種下前因，繼之華裔移民未能及時融入當地社會，或建立全面性的互動關係所至。⁴因而引起普遍上處於貧窮邊緣的馬來社會的不滿和懷疑，把華裔和白人大資本家等而齊觀 (A. Wahab Ali, 1988：319)。赤手空拳出賣廉價勞力的新客移民也在此偏見之下被視為資本家的爪牙和幫凶。韓國學者 Chung Young-Rhim 發現在馬來新文學作品中，華族往往被馬來人視為只重視追求利潤和財富的群體，甚至有意通過灌輸馬來人諸如懶惰、喜賄帳典當、賭博、酗酒和抽鴉片等惡習，為篡奪馬來亞的統治權鋪路 (1995：30)。從此，外來移民消極的被新崛起的馬來知識階層視為必須壓制，而非超越的競爭對手，這時候馬來民族歷史已經來到蘇丹依德利斯師範學院時代。⁵

² 偏偏民間起義和匪邦叛亂 (banditry) 是白人政權的“教導有方”，矛頭除了指向馬來封建統治者，更直搗殖民統治政權。這些民間英雄包括馬六甲的羅賽益 (Dol Said)、吉蘭丹的督江谷 (Tok Janggut)、彭亨的末基勞 (Mat Kilau)、拿督巴哈曼 (Datuk Bahaman)、丁加奴的阿都拉曼林蒙 (Abdul Rahman Limbong)、霹靂的馬哈拉惹烈拉 (Maharajalela)、拿督沙葛 (Dato' Sagor)、班達蘭 (Pandak Lam) 等等。

³ 在現代馬來小說濫觴之初，作家大多與中東—伊斯蘭有深厚的淵源，取材與人物以中東為中心，對本土題材和人物塑造並不多見。譬如第一部馬來長篇小說《法麗妲蕙儂傳》(Hikayat Faridah Hanom，兩冊分別於 1925 和 1926 年出版)，作者為知名馬來—伊斯蘭改革家、出版家 Syed Sheikh Al-Hadi。此書以埃及為背景，以埃及的阿剌伯貴族為主角，而且仍不脫古典文學的痕跡。譬如書名即冠以 Hikayat 一詞—馬來古典文學中特有的文體，大體說明二十年代伊斯蘭復興主義作家仍然恪守傳統文化脈絡，不易接受異質文化和異族。Ahmad bin Haji Muhammad Rashid Talu 的例子在那個年代是罕見的。

⁴ 英屬馬來亞的華人私會黨組織與秘密會社不但限制不同籍貫之間華民的交往，亦劃定華民與當地其他民族的社交邊界。即使在 1890 年某些私會黨被撤銷註冊之後，仍有不少華工參與這些組織。如 1896 年，在一萬四千名礦工之中，約七成是義興和海山公司的成員 (Barbara Watson Andaya, Leonard Y. Andaya, 1983：205)。當然，英殖民政府的施政亦導至族群圈子的分割，首先白人政權依賴華人甲必丹和秘密組織維持地方上治安，在霹靂州，前述兩個黑社會組織的首領即被委為州議會成員 (同前)。1877 年，專司華民事務的華民護衛署成立於新加坡，負則官員必須至少通曉一種華人方言，較之只懂得馬來語的馬來縣長，顯然華民更願意找前者處理庶務，這直接加劇了華民和馬來族群之間的隔閡。

⁵ 原名 Sultan Idris Training College for Malay Teachers，簡稱 SITC。倘若江沙馬來學院 (Malay College of Kuala Kangsar, MCKK) 招收的是公子王孫和具有英文教育背景的學子 (為栽培統治階層和公務文員鋪路)，SITC 則招收傳統馬來學校的學生，目的是發展馬來語文教育與文化。它於 1917 年首次由 R. O.

此學院不僅是二戰前馬來民族主義的搖籃，亦出現一批重要的作家／翻譯家，如 Ahmad Bakhtiar, Harun Aminurrashid, Abdullah Sidek, Muhd. Yassin Makmur 和 Ahmad Murad Nasaruddin，為戰後馬來文壇奠定穩固的基礎。無論在課堂上或作品中，他們都極力鼓吹民族主義精神。⁶和前期伊斯蘭主義復興作家不同的是，這票教師－作家把人數日益增加的外來移民視為威脅，把馬來人在經濟與生活領域的貧困、落後歸咎於新移民（尤指華民）的“入侵”。此現象說明華民在馬來人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並開始在馬來文化界／知識階層當中形成既複雜又曖昧的個體一方面馬來人無法否定他們對馬來亞經濟的巨大貢獻，一方面又無法排除華民在斯土的出現給他們形成的壓力；易言之，華民即為學習楷模，亦為資本主義經濟爪牙，這種心態反映在小說之中即訴諸直接，卻又不失忠實的情緒宣洩。⁷然而，此時期小說文本中的華裔人物仍不多見。

到了新聞從業員出身的作家（Penulis Wartawan-Sasterawan）手中，華裔人物在馬來小說中開始呈現出更具體、典型的面貌。他們本著抨擊社會現實和封建專制的熱誠，以及在不受公務員服務條例的限制下，筆鋒更見犀利，這種風格後來亦逐漸推廣至文學創作領域。在這方面，Abdul Rahim Kajai 和 Ishak Haji Muhammad 是兩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前者在擔任《議會報》（Majlis）總編輯時即經常在社論中針對馬來人的政治與經濟現狀抒發己見，充分顯示他深執的憂族懷抱。他對外來移民成見很深，寫了一篇非常有名的短篇小說《阿旺布達的故事》（Cerita Awang Putat）。小說敘述一名華裔商人成功在馬來村子立足，卻招惹村中馬來青年阿旺布達的敵視和嫉恨的故事。阿旺布達認為華裔操控村子的經濟命脈，並擾亂村人寧靜的生活，故必須加以遏止。作者不但敵視華人，更執著於血緣主義，對擁有阿剌伯血統和印裔血統的馬來人表示敵意，給他們帶有貶義的稱謂，如把前者稱作 DKA（Darah Keturunan Arab，且譯為“阿剌伯種”），對後者則稱之為 DKK（Darah Keturunan Keling，吉林種）。批評家 Abu Bakar Hamid 直認 A. Rahim Kajai 對“馬來人”的陳義過於狹隘（1971：35）。究其原因，A. M. Thani 僅僅提及它和馬來人的心理和經濟因素有關（1990：31），卻沒有進一步分析。

Ishak Haji Muhammad 原本是政府公務員，曾經擔任縣長和地方法庭推事。1935 年辭去法庭推事的優職，加入報界和政治界，積極參與反殖民運動，是戰前馬來民族主義先鋒。他以 Pak Sako 的筆名馳名文壇，長篇小說《大漢山之子》（Putera Gunung Tahan）（1938）和《瘋漢末麗拉之子》（Anak Mat Lela Gila）（1941）是他的代表作。前者描述懦弱的馬來封建統治者以及狡詐的英殖民政權的政治寓言小說。後者敘述行為怪異，但思想進步的漢子末麗拉，隱喻馬來人處境就像高人末麗拉一樣，不可低估其能力。作者寫兩書的用意無非是要追溯馬來人的本源，以及尋找在外來勢力統治之下日益淡化的馬來民族主體（Jati Diri）。此外，他對外來移民也一樣憎恨。他認為華民到馬來亞是為了搜刮馬來土邦的財富以及不擇手段削弱馬來

Winstedt 倡議建立，1922 年 11 月 29 日正式成立，開學禮由當時馬來聯邦秘書長 W. G. Maxwell 爵士主持。它在創校之初網羅了當時馬來知識界與文化界菁英，如著名思想家兼教育家 Za'ba（原名 Zainal Abidin Bin Ahmad）、教育家 Abdul Hadi Hassan、歷史學者 Buyong Adil、作者兼報人 Harun Aminurrashid、翻譯家 Abdullah Sidek 等等，亦栽培了不少後來叱吒政壇的領袖，包括主張成立大印度尼西亞國（Indonesia Raya）的左翼人物 Ibrahim Haji Yaakob，因而享有馬來民族主義搖籃之美譽。在首任院長 O. T. Dussek 的努力下，馬來翻譯部（Malay Translation Bureau）從吉隆坡教育局遷入此院，開始大量翻譯西方思想與文學名著，拓寬了馬來人的視野。近代馬來人的教育發展的確與 SITC 的貢獻不可分割。此學院於 1997 年 5 月 1 日升格為大學，取名蘇丹依德利斯師範大學（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簡稱 UPSI），招收各民族學生就讀。

⁶ Harun Aminurrashid 曾經因為激進的民族主義作風被英殖民政府限制居留汶萊約七年（1939-1946）。

⁷ 輕者如多疑慮、敏感、好指責等，重者如重複性埋怨和嘮叨（latah）、發狂（amuk）等，久之便形成憎惡外人／恐懼症（xenophobia）。有關馬來人的不正常心理，參 Mat Saat Zaki, 1993: 370-374。

人的經濟地位。(A. M. Thani, 1990: 33-34) 較之 A. Rahim Kajai 的正統血緣觀, Ishak 對外來僑民的厭惡, 可說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在人物角色的取名立姓上大作文章, 以滿足他阿 Q 式的精神勝利。譬如把短篇小說《兒子當囡》(Anak Dibuat Denak) 的華人老闆取名為 *Tauke Tong Sam Pah* (隱義是垃圾桶老闆); 在《柏倫本宮》(Istana Berembun), 把企圖收購馬來人土地以開採金礦的華人老闆稱為 *Tauke Poh Ki Mak* (Poh Ki 相等於香港粵語粗話中的“扒街”), 把他擁有的採礦公司稱為 *Poh Ki Gold Mining Company* (扒街金礦開採公司)。凡此修辭, 論者卻把侮辱當有趣, 認為體現作者的幽默作風 (見 Hashim Awang, A. Karim Haji Abdullah., 1995:x), 誠令人啼笑皆非。此外, 作者也通過人物肖像與行動描寫對華人大加譏誚戲謔一番 (同前)。這種書寫方式, 出現在戰前三十年代至戰後四十年代的馬來小說, 除了反映馬來人強烈的憤懣, 亦可以想見他們在歷經四百餘年殖民統治下的心理狀況。

戰後五十年代, 東南亞殖民地紛紛擺脫殖民統治, 以新興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的姿態出現。馬來亞華、巫、印三大族群也暫時拋開歧見, 共同為爭取獨立而奮鬥。譬如教總領導人已故林連玉先生於五十年代提出華文列為官方語文的要求時, 當時聯盟主席東姑要求不在那非常時期提出此課題, 以免影響巫統在議會選舉中的表現, 林連玉答應暫時不提 (有關馬六甲會談始末, 詳參林連玉, 1988: 108-118)。此即說明一個事實—林先生的決定只是權宜性方案, 它反映華教人士靈活的處事方法, 顧全大局, 以及對立邦建國的期待與尊重。在此關鍵上, 與其說馬來人已經能夠接受華人移民成為本國公民, 毋寧說馬來人已經無法否定華人移民在本邦出現的歷史事實, 以及其作為本邦重要民族之一。社會—政治圈內的觀念如此, 文學界的觀念亦如此。左翼文學重鎮 *Keris Mas* 就寫了幾篇著名的短篇小說, 敘述族群合作對抗殖民統治的故事, 包括《我們村內的一列鋪子》(*Kedai Sederetdi Kampung Kami*, 始見於 1956 年 1 月《寶石月刊》)、《他們不明白》(*Mereka Tidak Mengerti*, 1959 年 10 月《語文月刊》)、《園坵事件》(*Kejadiandalam Estet*, 1950 年 4 月《寶石月刊》) 和《獨立前夕》(*Menjelang Merdeka*, 1957 年 10 月《語文月刊》)。

獨立後, 馬來作家對華裔角色的經營的企圖心更大, 不僅進一步透過華—馬關係描述馬來西亞華人, 藝術表現手法也從前期粗糙的手法發展得更精巧。為了貫徹馬來宗主 (*Ketuanan Melayu*) 和馬來霸權 (*Malay Power*) 意識, 小說家終走上政治小說的寫作道路。他們不僅抨擊馬來政客的虛偽和醜陋面貌, 對華人的描述也更全面、細膩。如果前期 A. Rahim Kajai 和 Ishak Haji Muhammad 把華裔視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爪牙, 本時期作家則更進一層把華人描述為馬來政權的篡奪者, 因而特別強調馬來人在本邦不可質疑／憾搖的宗主地位。Hassan Ibrahim 的長篇政治寓言體小說《福鼠》(*Tikus Rahmat*, 1963), 以諷諭手法敘述國家獨立後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狀況。作者把非我族類比喻為旱地鼠、園坵鼠和家鼠, 並敘述它們如何剝削和欺凌弱小谷中鼠的故事。有馬來長篇小說之王稱號的 *Shahnon Ahmad* 也寫了一部小說《部長》(*Menteri*, 1967), 通過一名馬來部長對奉行龍族文化者把棕暗膚色的馬來人驅逐至內陸山林表示憂慮。這些塌鼻子龍族勾結馬來官僚和封建貴族階層, 大肆搜刮國家財富, 並杯葛當局扶持土著的經濟政策。

除此以外, 對於華族人物, 我們也看到馬來作家另一種形式的描述。他們嘗試通過意識形態途徑, 意圖以宗教統御為手段, 達到族群同化的目的, 這種現象在七十年代以後更為顯著, 著名的作者有 *Azizi Haji Andullah*、*S. Othman Kelantan* 和 *Fatimah Busu*。⁸其中, 當以 *Azizi*

⁸ 1970 年代以後, 馬來文學亦開始出現以異國他鄉為背景的長篇, 重要的有國家桂冠作家 *SN Arena Wati* 於 1987 年出版的三部曲《來自墓園的花》(*Bunga Dari Kuburan*, 美國背景)、《藍色鬱金香》(*Kuntum Tulip Biru*, 歐洲背景) 和《櫻花綻放》(*Sakura Mengorak Kelopak*, 東洋背景) 等, 短篇則有 *Shahnon Ahmad* 的《A1》(澳洲背景)、*Anwar Ridhwan* 的《年老》(*Menjadi Tua*, 美國背景) 等等。論者的看法是馬來

的《湄公僧侶》(Sami Mekong)為代表。在處理族群關係的題材時，凡此手法幾乎形成一種固定模式。故事情節一般描寫一名馬來青年與一名華族女孩相戀，在女方家長的極力反對之下，男方攜女孩出走，女孩在與男方相處過程中，受男方的生活信仰感召，終於改信伊斯蘭教，而女方家長最終也接受了女兒改變宗教信仰的事實。兒女私情、異族之戀以宗教為聯繫跟柏拉圖式的愛情似乎沒甚麼分別。但更讓人感興趣的是：為什麼是以宗教為族群融和的關鍵？為什麼人物角色是以男性－馬來人－穆斯林 VS 女性－華族－非穆斯林作對比？當中有沒有性別和種族意識的對立？小說結尾以華籍女性向巫籍男性的價值觀和信仰屈服，與現實情況的意識形態收編不能說沒有關係。

四、《連環扣》：想像的國族史

1967年，馬來小說家對華族人物角色的描述與華馬關係的詮釋有了更大的超越。語文廳與藏書閣(DBP)在這一年主辦第三屆長篇小說創作比賽，參賽作品的主題思想必須以獨立建國、國家發展以及本邦人民生活的奮鬥過程為骨幹(見獨立十年長篇小說創作比賽規則)。雖然參賽章則寫得非常清楚，但在五十一部參賽作品中，仍有六部不符規則而喪失參賽資格，原因仍不得而知。Abdullah Hussein 在這項比賽中得優勝獎的作品《連環扣》(Interlok)⁹是一部描寫華、巫、印三大種族從相會、互相競爭到和諧共處的故事，其中第二章《錦發家族》專寫華人南遷、在斯土華路藍縷的奮鬥過程以及家業興衰的故事，空間橫跨中國大陸和馬來亞；時間約始於上世紀初至二戰前夕，占全書(503頁)之135頁，體制堪稱恢宏龐大。¹⁰小說從李金六(金老六)與十歲兒子錦發離鄉背井南渡那一刻開始，至上船登岸－在星島拉車還債－無端受騙－北上碰運氣－披星戴月－落戶創業－逛窯噴煙－子承父業－父子鬩牆的故事為主線，帶出華人移民堅忍勤奮、見利忘義、悲歡聚散等主題。故事情節雖略嫌老套，但出自馬來小說家手筆，這就不簡單了，況且作者對細節處理一絲不苟，縱有白人歷史敘述的影子，但作者主觀意圖也非常明顯，顯示作者充分把握詮釋他者的權利，是國家－國族史架構中的馬華移民史。

這部長篇分成四章，依序為《瑟曼家族》、《錦發家族》、《馬念家族》和《連環扣》，前三章描述的家族故事分別代表馬來亞巫人、華人、印度人三大族群。各章即可單獨成篇，又有內部聯繫。三個家族的故事在同一時間線上發展，歷史的轉折來到反帝反殖時期，三大族群投入為單一目標－爭取獨立而奮鬥，彼此終於在同一個歷史舞台上碰面。

如前所述，在描述錦發一家的故事時，作者確實涉獵了相當廣泛的歷史與人文資源，這可從他對華人遷移史的熟稔以及華民各生活細節細膩的描述看出，與作者的外語(英語)能力以及廣闊的社教圈子不無關係。¹¹書中有一段描寫錦發父親－金老六和梅花抽鴉片的情節，

作家開始把作品置於國際情境中，並向外部世界開放，卻也明確指出負面／消極的出發點居多，形成片面的西方形象－物質主義當道、心靈枯竭(尤指宗教生活)，或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借題抨擊以色列人以及美國猶太人。(Monique Zaini-Lajoubert, 1993)。這跟宗教文明的對立不無關係。有關馬來小說與異域的評述，另有 Abdul Rahman Al-Ahmadi (1987) 和 Hafiz Arif (1990)。

⁹ 初版於1971及1973年印刷，1996年再版，本文以1996年版本為準。

¹⁰ 馬華文學之中，只有方北方先生的馬來亞三部曲－《樹大根深》、《頭家門下》／《枝繁葉茂》、《花飄過墮》全力經營類似題材，惟並不涉及其他族群。

¹¹ Abdullah Hussein 曾經於牛津出版社馬來西亞分部任馬來文編輯，服務其間，翻譯了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及多部西方文學名著。他的英語能力讓他能閱讀更多以英文書寫的南洋華工遷移史和生活素描；此外，與華族文化界朋友共事取得的“在場經驗”也讓他對華人思想意識有更貼身的了解，譬如於上世紀六十年代他曾經和魯白野(即馬華詩人威北華)合編《馬來語月刊》(Majallah Bahasa Kebangsaan)(吉隆坡：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初版)。

寫得頗用心：

輪到梅花，金老六就把鴉片塞入煙杆孔中。然後自錫制筒子里倒出黑而黏稠的鴉片膏，以一根針貼著黑膏滾著，一小枚黑頭旋即糾結在針梢，隨後挪到煙燈燈上燻，緩緩轉動針管，至黑膏形成細長狀，方把它塞入煙管細孔中，遞給梅花。她乾等了一個時辰，老是卷臥著，頭墊方形木枕，等著金老六裝煙當兒，兩人有一搭沒一搭聊著窩心的事兒。梅花接過煙槍，逕自挪到火苗上，迫不及待的深深嘸一口，然後遞給金老六，良久，方緩緩把煙吐出。雙眼登時一陣晶亮。抽了一兩嘴之後，輪到他的份。他等著梅花裝煙。當煙嘴送入口中後，周遭世界都拋之腦後了。梅花呢，他看不見了。兀自閤眼，深深吸一口煙燈上燻著的寶貝。煙兒混著那寶貝緩緩滲入他肺腑。此刻，他沉浸在夢幻之中。當煙兒自鼻腔呼出後，他方掀起眼簾。眼珠子這才靈動起來，全身關節終於靈活起來，他這才盯著橫陳跟前的梅花，那瘦削的身軀。兩三嘴之後，他們方解帶尋歡。每一回相逢都如此。(201-202)

馬來作者處理此類華族人物典型，能有此成績，Abdullah Hussein 算是第一人了。比之台灣女作家林海音《城南舊事》中描繪煙花女（蘭姨娘）和爸爸抽大煙的一幕，可謂不遑多讓：

要吃晚飯的時候了，爸和蘭姨娘橫躺在床上，面對面，枕著荷葉邊的繡花枕頭，上面是媽繡的拉鎖牡丹花，中間那份煙具我很喜歡，像爸從日本給我帶回來的一盒玩具。白銅煙盤裡擺著小巧的煙燈，冒著青黃的火苗，蘭姨娘用一只銀簽子從一個洋錢形的銀盒裡挑出一撮煙膏，在煙燈上燒得茲茲的響，然後把煙泡在她那紅紅的掌心滾滾，就這麼來回燒著滾著，燒好了插在煙槍上，把銀簽抽出來，中間正是個小洞口。煙槍遞給爸，爸嘸著嘴，對著燈火蘇蘇的抽著。……忽然，在噴雲吐霧裡，蘭姨娘的手，被爸一把捉住了，爸說：“你這硃砂手，可有福氣呢！”（176）

在處理華馬族群關係時，小說布局尤見巧妙。在第三章，作者透過主人翁錦發和次子耀成的正面衝突帶出兩個族群長久以來的微妙關係（表面上和諧共處，實際上互有芥蒂，甚至仇恨），較之第四章以三大民族共處一個敘事空間來處理族群問題更具藝術震撼力。華馬兩個族群對彼此的認知在這場父子衝突中獲得真誠的剖白。故事情節以馬來青年瑟曼摸黑出現於錦發的雜貨鋪，與錦發理論拒絕遷離自己的祖屋和土地。事出於瑟曼父親（慕沙伯）無法償還欠下錦發的債而不得不拿土地和屋子作抵押。當晚瑟曼正是針對此事跟錦發理論，惟不得要領，憤而離去。耀成看在眼裡，對乃父的決定深表痛心、不滿。當一向不敢頂撞父親的耀成指責前者的作法不近人情時，終於引發父子倆劇烈的衝突。一直以來，錦發把馬來人視為懶惰、不求富貴的民族，並把他們稱為馬來鬼（Malaikuai）、番仔（Huanna）（此觀念散見於原著，請參第 179、227、231、233、236、244 等頁）。耀成嘗試為馬來人辯護：

“但是，瑟曼的父親對爸爸有恩，難道爸爸不可憐瑟曼和他母親的處境嗎？”

“我們不能同情別人，我們只能同情自己。別人幫助我們，我們用金錢償還，互不虧欠，你明白嗎？”

“但是，這不是欠人情虧恩義的事，這是人道問題。人和人要有同理心，何況是對曾經協助過我們，讓我們享有今天舒適生活的恩人。”

錦發遽然撻起那孩子的手，把他轉過身來，另一只手使勁刮了他一記耳光。耀成絲毫沒有吭聲，他強忍著，只默默流著眼淚。他母親從樓上扑下來，試著把父子倆分開，一邊撥開丈夫的手，一邊叨念不停。……

“給我滾出去，衰豬羅？”當錦發的手被妻子撥開之後，便向耀成吼叫。……“滾開，你這個番種，滾！”錦發從鐵箱筴附近向他咆哮。

“他們不是番仔，他們像我們一樣，有文化有教養。”耀成自他座位大聲回應。

錦發推開鐵門衝進裡面，卻被他妻子林大頭一把攔著。……

他要他們成為富有的人，然後衣錦還鄉。但是如今他突然面對挑戰，自己的親骨肉向他挑戰。他想起那令他痛心的話。那孩子竟然幫番仔說話。他憎恨那孩子。就讓他自身旁消逝好了。(241-244)

這場衝突，與其說是兩代之間的思想衝突，毋寧說是作者欲通過耀成向代表華族觀點的錦發作最強力的反擊，也藉此宣洩長久以來馬來人對華族錯綜複雜的感情。而這種交鋒，是以耀成為代理，既表達馬來民族的觀點，也反映了土生華裔的某些思想意識與精神面貌。

揣摩作品的情節，可見作者擅於運用殖民史中某些片段建構小說，體現了文本的歷史性。Ungku Maimunah Mohd. Tahir 評論三個族群在面對艱難環境及在詭譎政治風雲中尋求族群自身定位的當兒，族群存亡成為最關鍵的問題，即便對土著本身也不例外（1996：90）。這的確符合歷史事實，並在前三章有很忠實的反映。然而，當華族和馬來族同登一個敘事空間時，作者的中心不再是個別面對艱險環境與生活挑戰的那種沉著、毅力和人性美好的一面，反而落入戰前 A. Rahim Kajai 和 Ishak Haji Muhammad 的書寫窠臼，把錦發描述為以怨報德、貪婪、狡詐一族。毋庸置疑，這種處理手法容或有事實根據，但過於簡單化。顯然的，對於天性善良、勤奮踏實的錦發因何吞併馬來人慕沙伯的土地和家園，作者並未給予妥善的處理，與非黑即白的國家史觀殊無二致。這是作者的最大敗筆，我們看到作者企圖以國家史的想像來建構文學的真實性，這當然要違背文學的本質。

五、結論

馬來小說家帶著先入為主的觀念為華族人物造鏡以及詮釋華馬族群關係，符合 Ungku Maimunah Mohd. Tahir（1996）的文學程序論（*proses sastra / literary process*）—通過文學實踐國民大團結和灌輸官方意識形態。因此，難免主題先行，縱使犧牲美學考量也在所不惜。在美學操作方面，馬來小說家通過典型化（*typicalize*）策略，以及象徵、隱喻等手法，把華族人物角色定格成不擇手段、奸險狡詐的仲介（*middle-man*）和資本家，或者是見利忘義、好趁火打劫、有仇必報的民族。這顯然是片面的認知。考察小說敘述結構，作者從一開始就設置了情節基調與片面的人物面貌，敘事則幾乎全程主導／介入。

馬來民族在擺脫長久的殖民統治取得獨立後，不惜摹擬和挪用前宗主國的意識形態生產方式，復以新宗主（*Ketuanan Melayu* 和 *Malay Power*）的高姿態“君臨天下”。這些都體現在小說結構與敘事策略的營運上，顯然和多元文化現實、價值觀背道而馳，是典型的後殖民話語形式之一，凡此動作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愈形顯著。馬來文學即如此一面解構殖民帝國中心神話，一面建立新中心，馬來文學與文化界對後現代主義的忌諱（對解構中心論尤甚）也就不難理喻了。文學終不免喪失了獨立性，成為意識形態和權力的附庸，自然難有作為。

參考書目

- 比爾・阿希克洛夫特、嘉蕾斯・格里菲斯、凱倫・蒂芬著，劉自荃譯（1998）。《逆寫帝國：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板橋市：駱駝出版社。
- 林連玉（1988）。《風雨十八年》。吉隆坡：林連玉基金委員會。
- 林海音（民 80）。《城南舊事》。台北：爾雅。
- 余壽浩（1953）。《馬來亞古今談》。新加坡：南洋報社。
- 王賡武著、姚楠編譯（1988）。《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 A. M. Thani (1990). *Integrasi Sosial dalam Kesusasteraan Melayu*.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A. Rahim Abdullah (Penyelenggara)(1990). *Tema Hubungan Kaum dalam Karya Sastera di Malaysi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A. Wahab Ali (1988). “Imej Bukan Melayu dalam Novel-Novel Malaysia” in *Tradisi Pembentukan Sastera Melayu Modern*. Petaling Jaya: Penerbitan Sarjana (M) Sdn. Bhd.
- Abdullah Hussain (1996). *Interlok*.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Abu Bakar Hamid (1971). “Perpaduan Kaum dan Nasionalisme dalam Kesusasteraan Melayu Sesudah Perang Dunia Kedua” in *Dewan Sastera*, Mei.
- Ahmad Kamal Abdullah (et al.)(1992). *History of Modern Malay Literature (Vol. II)*.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Barbara Watson Andaya, Leonard Y. Andaya (1983). *Sejarah Malaysia*. Petaling Jaya: Macmillan Publishers (M) Sdn. Bhd.
- Chung Young-Rhim (1995). “Perbandingan Sastera: Imej Manusia Melayu-Korea dalam Novel Awal” in *Dewan Sastera*. November.
- Hashim Awang (1981). *Cerpen-Cerpen Melayu Sebelum Perang Dunia Kedua: Satu Analisa Tentang Temadan Struktur*.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Hashim Awang, A. Karim Haji Abdullah (ed.)(1995). *Cerpen-Cerpen Pak Sako*.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Ibrahim Bakar (1998). “Novel *Interlok*: Integrasi Kaum dalam Memacu Kemerdekaan dan Pengisian Wawasan” in *Dewan Sastera*. Mei.
- Mat Saat Zaki (1993). “Ting kah Laku Tak Normal” in Abdul Halim Othman (ed.) *Psikologi Melayu*.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Monique Zaini-Lajoubert (1993). “Dunia Bukan Melayu dalam Beberapa Novel Malaysia Mutakhir” in Ainon Abu Bakar ed. *Telaah Sastera Melayu: Himpunan Kertas Kerja Minggu Sastera Malaysiadi London 1992*.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Othman Puteh (1983). *Cerpen Melayu Selepas Perang Dunia Kedua: Satu Analisa Tentang Pemikiran dan Struktur*.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Ungku Maimunah Mohd. Tahir (1989). “Ethnicity and the National Literature in Malaysia”.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Mimeograph)
- (1996). “Proses Sastera dan Integrasi Kaum: Satu Kajian Kes Novel *Interlok* oleh Abdullah Hussain” in *Dewan Sastera*. Disember.

越南與台灣經濟文化關係之展望

杜進森

越南社會暨人文科學院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一、前言

逾十年來，越南與台灣經濟文化關係獲得快速成長。面對國際與區域情勢、及越南與台灣本身新的變動，兩國合作關係勢能向前邁進。

本報告係陳述與分析兩國合作之基礎及若干影響因素，並為越南—台灣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更進一步之發展作出若干建議。

二、越南—台灣經濟文化關係發展之主要基礎

（一）歷史及文化面：越南與台灣雖在地理上有距離，惟在歷史及文化上卻極為相近。

歷史方面，越南與台灣為捍衛領土完整，均遭逢抵抗外侮之長期鬥爭。嗣後，越南與台灣著手建設之出發點亦頗類似，兩者均為落後封閉之農業國家，國民所得極低，且受到來自外界之諸多壓力。

文化方面，越南與台灣雖有輕重程度之不同，但均屬於儒家文化、或受儒家文化影響。風俗習慣相似，均注重家庭倫理，並視家庭為社會之基礎，與人交往講求信義。在共同之歷史與文化背景下，越南與台灣人民在勞動與生產時均刻苦勤勞且具創意，並勇敢地對付各種天災與人禍。

上述格各節顯示，越南與台灣具有諸多共同點，簡單而言具有「三同」，及「同文」、「同種」與「同遭遇」，可視為過去及未來雙方發展關係之基石。

（二）十年來之合作成果為日後雙邊關係之發展奠下美好基礎

20 世紀 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初，特別自雙方互設代表處迄今，越南與台灣經濟文化關係獲得快速進展。

經貿方面，1989 年雙邊貿易僅有 4143.8 萬美元，2002 年達到 33.49 億，成長逾 80 倍，台灣成為越南第四大貿易伙伴（次於日、星、中國大陸）。¹投資方面，台灣對越南直接投資增長快速，1988 年至 2002 年，台灣在越南共有 1048 個投資案件，協議總金額達 57 億 7900 萬美元，次於新加坡，高居第二位，2002 年共有 189 個投資件數，總金額 2 億 7700 萬美元，居外國來越投資首位。²台灣連續幾年均高居越南外資首位，值得注意者，1997 年金融風暴發生後，各國來越投資劇減，唯獨台灣來越投資不斷未見減少，反而增加。台商投資領域甚廣，包括受天候及價格變動影響之農林水產業等；在投資省分方面，不僅集中在基礎設施較為健全之省市，更大膽前往基礎設施落後之深山及偏遠地帶投資。此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事，

¹ 「越南台灣貿易關係：國際分工模式」（1989 年起），楊文利，中國研究雜誌（2002 年），第二季，第 64 頁。台北駐越南代表處提供 2002 年數據。

² 依據越南計畫投資部外人投資司 2002 年 12 月 31 日統計。

台雙在越南投資之企業中，「主人」與「工匠」間，及「雇主」與「勞動者」之關係相對良好，較少發生類似其他外國企業產生之爭執。

勞動合作方面，隨著貿易與投資之快速成長，越南與台灣勞務合作進展亦極為良好。迄今，越南勞工赴台工作已達四萬六千人，係越南勞工前往外國工作之龐大市場之一。³越南與台灣在教育、體育及文化等各領域之合作亦有一定進展，值得繼續鼓勵。

總而言之，十年來越南與台灣在各個領域之合作，為未來雙邊關係之發展奠定更為重要的基礎。

三、影響越南與台灣合作關係之新要素

（一）越南與台灣之情況，及越南—台灣關係出現之新要素

1. 越南方面

（1）越南共產黨揭櫫與領導之改革開放事業，在過去十五年已取得重大成果。在上述成就之基礎上，2002 年 4 月「第九屆月共全國黨代表大會」揭示相關重要措施，以加速國加工業化與現代化進程。對外方面，「九大」提出「越南願在尊重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之基礎上，與世界各國成為朋友與信任伙伴」之方針；嗣後，越南並提出「主動融入國際經濟」之主張。

（2）依據該精神，近年來，越南一方面推行若干措施，改善包括硬體（如基礎措施）及軟體（如政策等）之投資環境；另一方面積極主動參與國際經濟組織，包括申請加入 WTO，盼能 2005 年前儘早成為 WTO 會員國。

（3）此外，落實越美貿易協定、準備於 2006 加入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協商於十至十五年內成立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區（ACFTA）、與中國合作進行海防—老街—昆明經濟走廊研究計畫等，皆為越南發展雙邊及多邊關係中出現之新要素，勢對越南之發展帶來積極與消極之影響。倘能爭取時機，將挑戰轉化危機會，越南一定能有新的發展境界；同時，也將對包括台灣在內的伙伴前來越南投資經商帶來機會。

2. 台灣方面

（1）受到各種主客觀因素之影響，包括提出並具體落實經濟社會戰略計畫，台灣以成功地從落後的農業社會轉型為現代文明之工業社會，成為亞洲四小龍中最為璀璨的小龍。

（2）1990 年代初迄今，為因應科學技術革命及知識經濟所帶來之需求，台灣提出產業升級之明智主張，將不符合之相關工業轉往國外發展。此為開發中國家發展之契機，東南亞國家如越南可以利用該機會發展經濟。

（3）此外，台灣已成為若干大型國基經貿組織如 APEC 及 WTO 之會員，尤以海峽兩岸之投資與直間接經貿關係發展相當強勁，值得注意者，係諸多台商企業赴大陸投資之同時，亦前來越南，以「台灣資金、大陸技術工、越南土地與勞工」之模式前來投資。

（4）除上述兩項要素外，越南與台灣出現新的發展要素，即雙方之婚姻關係。據估計，迄有超過六萬名越南女子嫁為台灣新娘，婚姻關係將促進雙方家庭之交流、接觸、認識與信任，同時並將對日後雙方經濟文化之交流帶來新的發展。

（二）國際及區域情勢之若干變化：

除上述越南與台灣本身之情勢變化、及越南與台灣雙邊關係出現之新要素外，邇來國際及區域情勢之變化，多少均會影響雙邊關係日後之發展。吾人謹對若干主要因素提出陳述與

³ 依據台北駐越南代表處提供之數據。

分析如下：

1. 經濟全球化：此為日漸強化之客觀趨勢，對以開發及開發中國家帶來機會與挑戰。為順應此潮流，各國均提出應變措施，以爭取機會、減低挑戰。吾人認為其中最為重要的辦法之一，就是越南與台灣雙方均應將加速開放，進一步融入國際經濟秩序。

2. 九一一事件後，尤其是美伊戰爭顯示，全球經濟高度依附於美、日、歐盟等經濟中心之穩定與發展。美伊戰爭早日結束，有助美國經濟良性發展，亦有利全球、區域及開放程度較高之國家如越南及台灣之經濟復甦。

3. 東南亞及東亞雖仍有若干潛在危機，惟一般來說情勢仍相對穩定。因此，東南亞區域隻經濟整合（東協自由貿易區 AFTA）、及東南亞與東北亞之整合（ASEAN+1、ASEAN+3）將相對順利。在此趨勢下，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區對外界投資者而言，可視為好的機會，其中包括台灣在此區域經商買賣。

4. 中國在過去幾年及十六大提出發展戰略後之經濟持續快速成長，對來越投資之台商及對越南與台灣之貿易關係將帶來順利機會。值得注意者有二，其一、中國加入 WTO 並給予越南最惠國待遇：據台北駐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代表南輝表示，中國加入 WTO 的意義，勢對來越投資之各國廠商開啓了一扇進入鄰近廣大市場之大門。其二、中國積極展開「開發大西部」戰略、以及海防—老街—昆明經濟走廊之可能成行，均有助廠商接近中國西南部三億五千萬人口、購買力日漸提高之市場。

5. 總而言之，上述內部及外在要素，不慣接受與否，均將積極或消極地、短暫地或深遠地影響越南與台灣之關係，需要雙方學界及企業界加強接觸並交換意見，尋求有效可行之解決辦法，爭取機會，減低衝擊，將雙方關係之發展提升至新的境界。

四、進一步加強越南與台灣關係之建議

（一）經貿方面：雙方經貿關係在過去有不錯進展，越南與台灣經貿總額甚至與越南及中國之經貿總額相當。⁴

目前越南與台灣雙邊貿易仍未平衡，越南以日益增長之速度呈現逆差現象。當然，向越南正在發展中之經濟體與台灣已開發之經濟體互動，這種情形很難避免。雙方經濟互補性還很高，合作空間及潛能仍相當巨大。因此，雙方經貿專家應建立頻繁接觸之機制，對越南有優勢之領域與貨品、以及台灣消費者之喜好等，進行交流與瞭解，使越南產品能儘速進入台灣市場，逐漸縮小越南與台灣進出口之差距。

（二）投資方面：台灣連續幾年均高居越南外資首位。惟雙方自身之變化、及國際與區域局勢之新變化，刻正且將對台灣來越投資帶來新的機會與挑戰。

吾人認為，將來台灣企業來越南投資時，須更加注意開拓中國大陸市場，尤其是龐大的西南部市場，然後是越南傳統市場如俄羅斯與東歐；再來是東協、美、日及西歐市場等。

以台灣的資金與工業優勢，結合越南的勞動力與地理優勢，深信我們可以再滲入大陸市場及上述傳統市場獲得比較利益。此需要雙方企業加強合作，共同深入研究上述相關市場，選擇投資業別、領域及地點，以求符合並獲得高度經濟效果。

此外，由於台海兩岸關係仍渾沌不清，存在若干不確定因素，當台商前往大陸投資遭遇困難時，越南將可扮演「進可攻、退可守」之角色。

越南緊連中國及東協兩大市場，同時亦為台商前往大陸投資之「避風港」，故越南將繼續

⁴ 2002 年越南與中國大陸貿易總額達卅二億美元，2003 年 4 月 7 日人民報。

成為吸引台商前往投資之據點。越南將持續改善投資環境，台灣企業亦須選擇投資類別及領域，以符合此一最新趨勢。

（三）勞務與教育方面：

1. 勞務方面：台灣經濟發展，勞工成本高，加上其他因素，目前台灣極為缺乏勞工，需大量引進外勞。越南為發展中國家，剩餘勞動力甚多，且正推行「出口勞工」政策。又越南與台灣文化相同，故勞務合作空間仍極龐大。問題在於，雙方應對過去已做到以及未能做到者進行科學與客觀的總結評價，同時提出解決辦法，以加強日後勞務方面之合作。吾人認為，目前越南勞工前往台灣主要係進行普通工作，從事高科技領域之勞工仍較少。

故將來雙方人力仲介公司應更積極合作，增加普通勞工及具手工及技術程度高之工人。欲達此目標，雙方應互相配合，在越南或台灣培訓技術勞工人才。

2. 教育方面：此亦具有極大發展潛力。台灣具有極為發達之教育體系，諸多大學在區域及國際間均獲國際組織高度評價。越南正加速推動國家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教育培訓及科學工業被視為越南首要國策，近年來，因經濟發展不錯，人民生活獲得改善與提高，故政府及社會對教育之投資亦日漸增加。諸多越南青年已透過雙邊協定、政府公費或自費等不同管道前往國外留學。然而，越南在台灣之留學生並不多，故台灣各大學院校應直接與越南各大學、或透過越南介紹教育之組織、或透過在越南設有代表機構之國際組織等來越南宣傳。此外，雙方可舉辦教育研討會或教育論壇等，介紹台灣教育經驗，包括普通教育、職業教育與大學教育等。

3. 除教育外，文化、藝術表演團體之交流、科學工業、醫療、體育等方面之合作仍存有極大發展潛力。因此，將來雙方代表處應加強接觸與瞭解，形成推動上述各領域合作之有效橋樑，使該等領域如同雙方經貿投資關係班獲得同樣密切之發展。

五、結論

越南與台灣雖有地理上之距離，但卻在歷史與文化上有很多共同點。十年來雙方在各個領域之合作獲得快速進展，為日後進一步之發展創造順利條件與基礎。此外，雙方及國際情勢之發展對雙方之合作已經且刻正帶來機會與挑戰。然而，吾人認為，在可見的未來，雙邊合作基礎甚為穩固，合作潛力與空間仍極為巨大，此為，世界實踐經驗顯示，南北合作，即經濟發展之台灣與經濟發展中之越南，其相互合作之互補性較高，競爭性較少，且對雙方均有利。故在可預見的未來，越南與台灣在各個領域之合作關係，前途相當樂觀且無量。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Difference of a Decade

Catharin Dalpino^{*} and Juo-yu Lin^{**}

Over a span of several years,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n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have shifted in quiet increments. The accumulated effect, however, has been profound. A concerted diplomatic effort to woo countrie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which now includes all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excepting East Timor, has reaped multiple benefits for Beijing. It is beginning to alter the political balance in the region as alignments with extra-regional powers are shifting, however subtly. In some aspects, the change is more dramatic. Economic relations have expanded rapidly; for exampl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s seventeen times larger today than it was twenty-five years ago.

The drama, however, is in trends rather than absolutes. Only 4% of ASEAN's exports go to China, while 20% go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13% to Japan. In 2001 US exports to Southeast Asia totaled \$44 billion, more than double the value of American exports to China. ASEAN presently receives \$53 billion in US direct investment, five times as much as from China. Nevertheless, trade with China is Southeast Asia's fastest-growing economic relationship.

This expansion and the sea change in relations it brings has not dissolved longstanding concerns about China's ambi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oreover, new environmental worries arise as the impact of China's efforts to supply its southern provinces with much-needed power – often through dam construction on the Mekong River – are felt downstream.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in ASEAN affects US interests in both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 With Southeast Asia host to some of the busiest sea lanes in the world, it would not be an overstatement to say that the course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nd the US response, will have an impact on global strategic and economic stability.

Overcoming History

This multi-dimensional change cannot be fully appreciated without considering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n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in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the cold war, as well as in later years, when regional hostilities replaced superpower competition as a central concern.

In the 1950's and 1960's, most of the cold war anti-communist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Thailand, Malaysia, Singapore, Indonesia, the Philippines, Burma and Brunei) fought internal wars of counter-insurgency against communist groups that receiv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upport from Beijing. The most significant of these was Indonesia, which experienced a year of internal violence in the mid-1960's after a coup attempt by the Chinese-supported Indonesian communist party.

^{*} Fellow, Foreign Policy Studie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Associate Professor, Tamkang University and Visiting Fellow, 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n Policy Studies (CNAP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Discrimination against Indonesian ethnic Chinese, including a ban on all publications containing Chinese characters, continued for decades. The virulence of the riots against ethnic Chinese in Malaysia in 1969 was due in part to revelations that Malaysian communists were supported by the PRC. Thailand and Burma both struggled with communist insurgency movements backed by Beijing.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both Vietnam and Cambodia in the cold war years were more complicated. Beijing supported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and North Vietnam's struggle against both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By 1970, it had invested more than \$1 billion in support. However, after reunification of Vietnam under communist control, the two nations embarked upon era of rivalry, spiked by a brief border war in the late 1970's. When Vietnam invaded Cambodia in 1978, China championed the cause of the Khmer Rouge regime that Hanoi had driven from power, solidifying enmity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for the decade that followed, as well as with the Vietnamese-backed government in Phnom Penh. Within this rupture, however, were the seeds of reconciliation with one non-communist Southeast Asian nation. In 1979, Beijing struck a deal with Bangkok, to withdraw support t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ailand in exchange for Thai consent to funnel supplies overland to the Khmer Rouge on the Thai-Cambodian border.

This bargain effectively made Thailand Beijing's diplomatic agent in Southeast Asia for much of the 1980's. Since then, China was waged a low-level, systematic campaign to restore ties and improve relations with the ASEAN nations on a case-by-case, bilateral basis. By the close of the 1990's,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ere competing with one another for China ties.

Opportunity was a cornerstone of many of Beijing's diplomatic initiatives in Southeast Asia. For example, when the Cambodian ruling coalition had a violent rupture in 1997, Beijing supported the Cambodian Peoples Party's Hun Sen, who was under fire from the West for his actions in the incident. In response, Hun Sen adopted a one-China policy and expelled the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s office. Over a longer period, as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in Burma incurred sanctions from the West for not yiel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1990 election, China was able not only to improve relations with Rangoon but also to acquire long-term leases on naval bases there. (In the mid-1990's, ASEAN was so concerned over the Chinese military build-up in Burma that it expedited Rangoon's entry into ASEAN, in the face of strong opposi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every ASEAN country, Beijing has forged agreement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over a broad range of areas, including trade, defense, culture and tourism.

Beyond opportunities to improve ties with Southeast Asian particular to individual countries, China was able to capitalize on two broad events. The 1991 Paris agreement to end the Cambodian civil war, to which Beijing was a signatory, led China to cut its ties to the Khmer Rouge, automatically improving relations with Vietnam and Cambodia. A second major opening for China came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decade, during the 1997-98 economic crisis. In the initial months of the crisis, the United States was resolute in following a multi-lateral path and alli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o the detri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some of the countries hardest hit. Beijing made unprecedented bilateral loans to Indonesia and Malaysia. It was able to do so without causing undue alarm in the West. On the contrary, China was viewed favorably for not devaluing its currency during the crisis, and for refusing to endorse Japan's proposal for an Asian monetary fund (although Beijing would support a similar initiative four years later when it was

propos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he economic crisis also strengthened an episodic attempt to form a regional group which brought together ASEAN and the major powers of Northeast Asia. China's support for the ASEAN-Plus-Three group (the three being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was critical to its formation. The West has manifested ambivalence toward the ASEAN-Plus-Three framework, since it implicitly shuns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 similar theme is sounded with Beijing's recent declaration of support for the Southeast Asia Nuclear Weapons Free Zone (SEANFWZ), a regional initiative of the 1970's which was viewed as anti-Western when it was proposed.

In this expansion, however, Beijing pays some attention to balance. For example,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an agreement with ASEAN to cooperate on counter-terrorism last year, Beijing followed suit with an ASEAN-China anti-terror declaration which paralleled and supported the US initiative. And while Beijing clearly realizes the potential of ASEAN-Plus-Three – it was in that forum where China first proposed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 it also makes use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where its dialogue partners inclu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Talking in Code: The Spratlys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While China has devoted much of the past decade to encouraging comity and cooperation with Southeast Asia, its growing defense capabilities and uncertain military intentions have worried many ASEAN nations, however well relations are progressing in other areas. ASEAN feels this concern very close to home. In addition to posing an implicit threat to the sea lanes in Southeast Asia, China's increased military power enabled it to make advanc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90's. Conflicting claims, particularly to the oil-rich Spratly Islands, comprise the main security concern in ASE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Spratlys are in fact the only conflict in Southeast Asia which involves an extra-regional power. They are positioned near the vital sea lanes, which host a quarter of the world's shipping.

Of the disputed Spratlys, only China and Vietnam claim all of the islands. Malaysia, Brunei, and the Philippines claim some portion of the Spratlys. China's position is based in part on its claim of sovereignty over all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1990's, Chinese projection into the South China Sea demonstrated that bold moves would be protested but not challenged militarily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Philippines, which has offered low-level resistance to Chinese incursions). In 1995, for example, Beijing built facilities on Mischief Reef and effectively seized it with no significant military opposition.

ASEAN's response has been to pursue a diplomatic path to slow down China's expansion into the South China Sea, if it could not halt it altogether. In late 2002, three years of ASEAN-le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bore fruit, when China and the ASEAN states signed the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is code of conduct, as ASEAN views it, calls for restraint and cooperation among the parties, but it essentially preserves the status quo. It does not attempt to settle territorial claims, but calls for a series of measures – dialogue, and cooperative efforts in such areas as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search and rescue missions – which are intended to encourage a better climate for negotiation.

There were clear disappointments for some of the ASEAN states in the code. Vietnam had

hoped to raise the issue of return of the Paracel Islands, which China had seized from it in 1974, in the lead-up to the Declaration, but the document is silent on those and the other disputed islands. Neither, however, did China achieve all of its objectives in the Declaration. Beijing had hoped to insert a prohibition on foreign naval exercises into the code, but ASEAN resisted. As a compromise, the Southeast Asian states agreed to a pledge that the signatories would inform one another of planned exercises in advance.

In the new decade, it was almost inevitable that China and ASEAN would also formalize its intent to cooperate on a wider range of security threats. Thus, the South China Sea code was followed by the Joint Declaration o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The countries promised to cooperation on counter-narcotics, human trafficking, piracy, counter-terrorism, arms trafficking, economic crimes and cyber-crimes.

Although there is a common underlying fear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the ASEAN states lack a common perception of the Chinese security threat. These disparities, based in both history and present circumstances, have an impact not only on ASE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but also on the Association's ability to formulate regional defense strategies. Unless China becomes measurably more menacing in the region, this variation is likely to continue. Burma is the most tolerant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spectrum is the Philippines, whos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as encouraged mutual Philippine-Chinese suspicions, and which has been the only ASEAN state to offer military opposition to China over the Spratlys. Moreover, the "ASEAN way" – the group's consensus-based procedures which give weight to 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 mitigate formulating a common ASEAN defense, against China or any other potential encroaching power.

Free Trade Fever

China's rise as an economic power is seen as both a lure and a threat to Southeast Asia. In 2002, trade between ASEAN and the PRC totaled \$55 billion, a 31% increase over the previous year, making China the sixth and ASEAN the fifth biggest trading partners for each other. China is a growing focus for ASEAN investment, much of which is conducted through overseas Chinese. At present, investment is in significant imbalance, with Southeast Asian investment in China much greater than the reverse. In addition, as China's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trengthens, it is becoming a source of loans, economic assistance and other concessions to Southeast Asia. Although Japan is still Southeast Asia's largest donor, any assistance from China hints of sizeable amounts farther down the road.

At the same time, China is a formidable, even alarming, economic competitor, all the more so since its entry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 decade ago, conventional thinking held that, in "flying geese" formation, some key economies of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Malaysia, Thailand, Indonesia) would reach high levels of development before China. However, the intervening years have shown that this economic chevron path, however satisfying in the abstract, was inaccurate. The fact that China encompasses several different economic levels makes any such comparison difficult. Yet the most advanced area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have overtaken and surpassed the would-be tigers of South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compete for market share in light manufactured products, such as

textiles, electronics, shoes and toys. At this juncture, however, Southeast Asians are more worried about significant shifts in foreign capital, heading north.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Southeast Asia took 61% of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flows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of Asia, while China received 18%. At the end of the decade, the proportions were almost exactly reversed. China claimed 61% of FDI, with ASEAN taking only 17%. Three factors account for this: the impact of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 of 1997-98 in Southeast Asia;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and the international perception of Southeast Asia's vulnerability to terrorism, compared to Northeast Asia, after September 11, 2001. This downward trend is illustrated in the declining FDI figures for ASEAN in recent years. These figures were \$27 billion and \$19 billion in 1997 and 1998, respectively, the two worst year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0, however, FDI to ASEAN totaled only \$10 billion, a 37% decline from the year just prior.

For many Southeast Asians, the balm (if not the solution) for these problems is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 China. Toward this end, 2002 was a banner year with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SEAN Nation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gned in November at the ASEAN Summit in Phnom Penh. The agreement calls for several early liberalization measures and the negotiation of the world's largest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to create the world's largest market. That entity would have 1.7 billion people with a tot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roughly \$2 trillion.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envisions an ambitious schedule. Negotiations on a free trade agreement are to begin this year, with the goal of completing it in 2004. The plan call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FTA for trade in goods with the original six ASEAN countries, the most developed, and incorporation of the less-developed four ASEAN members in 2015. Some short-term incentives are built into the agreement. Tariffs on agricultural imports and food items will be reduced in 2004, and ASEAN is anticipating a boost in agricultural exports to China beginning that very year.

Undeniabl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lan will be difficult, involving painful structural adjustments on ASEAN's part. Some work in that regard is in progress. The original six members brought the long-anticipated 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into existen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Like the FTA with China, the four less-developed economies will be phased in at a later time. Until significant reforms are made, lowering tariffs with China could just mirror, and even speed up, the existing inequities.

The other regional powers have followed suit with similar arrangements, although none of them promise the scope of the China-ASEAN FTA. The US Enterprise for ASEAN Initiative seeks eventually to forge a constellation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the ASEAN nations, but on a bilateral basis. As earnest money, the US concluded a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Singapore shortly after President Bush unveiled the Enterprise Initiative. Thailand, the Philippines and Malaysia have indicated interest in FTAs with the US, although those will take years of negotiation.

Japan has offered 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for Southeast Asia. It is less a free trade agreement than a rebottling of Japanese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ASEAN, albeit with a greater emphasis on liberalization. India, seeking a greater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presence in Southeast Asia, has also proposed a regional arrangement in principle. In the short run, the benefits of these plans for all parties will be more political than economic.

The Question of Culture

The dramatic expansion of China's relations with ASEAN have had a corresponding effect on social dynamics in Southeast Asia. Just as goods have moved freely south from the mainland, so have people. Visiting mainlanders now make up ten percent of all visitors to som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ose with relatively relaxed immigration laws are also host to increasing waves of economic immigrants from China. Greater economic flows have brought with them a criminal underside, and Southeast Asians have complained that syndicates from the mainland, Hong Kong and Macao have increased the region's gangster population exponentially. In a different sphere, Beijing is pursuing a strategy of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in some countries, through grants for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and textbooks, as well as support for Chinese arts.

The impact of these shifts is particularly notable in the region's poorest countries, particularly Burma and Cambodia, which have received special attention from Beijing. China has matched its growing security presence in Burma with resettlements from Yunnan province, altering the architectural skylines of some cities in northern Burma and making Mandarin almost as frequently heard as Burmese. In Cambodia, Beijing's support for education in Mandarin has brought a revival of Chinese culture to a country in which the ethnic Chinese population had been all but eliminated by the Khmer Rouge. If there is an irony to this, in view of Beijing's support for the KR, neither side remarks upon it.

The poorer countries are also more closely entwined with China in drug flows. The patterns of narcotics trafficking have been altered in the past decade in line with the general path of Chinese-ASEAN relations. Two trends in particular have emerged. First, the flow of heroin no longer favors a route down from the Golden Triangle through Thai ports, but more frequently goes up through Yunnan to international destinations. Second, methamphetamine production in Yunnan is inflic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in the countries closest to it, notably Thailand, Vietnam, Laos and Cambodia.

The social trend which has had the broadest impact on Southeast Asia is doubtless the deluge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to the region. These run the gamut from the poorest seeking a chance for survival to the relatively well-off, hoping to build economic empires in these smaller countries. The scale of immigration has created a backlash. Surprising, the strongest nativist sentiment comes from long-established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Immigration from China has been a given in Southeast Asia for the past four centuries, beginning with traders and (in the case of Vietnam) conquerors. Nineteenth century famines and major wars were marked in the region by new waves of Chinese refugees and settlers. Each immigrant generation attempted to assimilate into the host system and culture,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success. However, in the 1950's and 1960's stricter Chinese internal controls made emigration difficult. The resulting hiatus in immigrant waves gave ethnic Chinese an opportunity to better establish themselves in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It was also a dangerous period for them, since communist movements and insurgencies sponsored by Beijing raised levels of suspicion and violence against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The anti-Chinese pogrom in Indonesia in the wake of the coup attempt against Suharto in 1965-66, and anti-Chinese riots in Malaysia and Burma were extreme examples, but the trend was widespread. Entrenched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 are fearful of another anti-Chinese wave and point to troubling signals. In the Philippines, 70% of foreigners arrested for illegal drug activitie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have been Chinese nationals. In Indonesia, the government has stepped up arrests and deportations of street merchants selling Chinese-made goods, in an effort to stem the growing tide of illegal merchandise.

Managing the Mekong

Much of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s cloaked in ambiguity. In the area of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however, a broad pattern is rapidly becoming clear. China's activitie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Mekong River – arguably the most tangible and most far-reaching example of the impact of Chinese policy on its southern neighbors – are changing the everyday lives of millions of Southeast Asians. The largest river in Southeast Asia, the Mekong is the lifeline of 65 million people living in its basin, and its natural fisheries supply 80% of the dietary protein consumed by them.

In the past decade, several countries have built new hyroelectric dams on the main stream and tributaries of the Mekong, including China, Thailand, Vietnam and Laos. However, China's plans to harness the Mekong overwhelm those of the downstream nations. In Yunnan province, the Manwan And Dachaoshan dams serve as the pillars of provincial development and also contribute to China's national electrical grid. Part of the electricity generated in Yunnan is consumed in urban industrial centers on the eastern seaboard. Construction on a third dam began in 2001. Blueprints have been drawn up for fifteen new dams, at both mainstream and tributary sites, to be constructed in the next decade.

Beyond building dams, China is also blasting rapids and shoals of the Mekong River to widen the navigational channel. Initiated in 1992, the project aims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trade links by enabling passage of larger cargo ships. Thailand, Laos and Burma signed an agreement with China in 2002 to widen those stretches of the Mekong which pass through their territories. However, Thai politicians have since begun to worry that the channel project, combined with Beijing's plans for dam construction, could give China absolute control over the direction of the Mekong. Laos has asked for a halt to the project, pending an environmental study.

These alterations of the river should be placed in the context of a boom in cooperative projects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comprised of China, Thailand, Cambodia, Laos, Vietnam and Burma. Besides dam construction, plans are in train to develop new economic corridors, highways and regional power grids, and to enlarge tourism and eco-agriculture. Most of these efforts are midwived by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which serves as a *de facto* secretariat for the Mekong sub-region. The ADB will oversee eleven Mekong programs in the next three years which will total \$1 billion. The sub-region anticipates annual economic growth of 6% for the rest of the decade.

But it is the dams which have become a point of conten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four countries in the Mekong basin: Thailand, Cambodia, Laos and Vietnam. As China unfolds its plans, these four countries are increasingly aware that decisions on their own environments are being made in Beijing. Chinese researchers maintain that the dams will reduce flooding and drought for the downstream countries. However, most outside analysts argue the exact opposite, that the new dams will exacerbate the Mekong's natural rhythm of monsoons, floods and droughts. The most vulnerable areas are thought to be Vietnam's lower delta and a major portion of Cambodia. Beyond damage to the country's widespread fishing industry, Cambodia fears that most intense floods and

droughts will ruin tourism in the country, particularly since the Mekong is the path to Angkor War. In this context, Beijing's charm offensive on Phnom Penh looks all too instrumental to many Cambodians.

Beijing is not completely unsympathetic to the plight of those who suffer from such problems. In October 2002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ratified the country's first-ever law requiring that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plans and decision-making of all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Beijing issued specific instructions to Yunnan to enforce the new law in implementing the Mekong dam projects.

Beyond this internal directive, however, Beijing has demonstrated reluctance to confront this issue with the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concerned. Although China participated in an informal summit of Mekong countries at the November ASEAN meeting in Phnom Penh, it refuses to join the Mekong River Commission (MRC). A would-be regulatory agency for the Mekong, the MRC was established in 1957 with support from the US, which hoped that larg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ould strengthen unity among the non-communist governments in Southeast Asia. The Commission was revived in the early 1990's, when the lower basin countries re-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one another. But unless and until the Mekong's largest and most ambitious country joins, the Mekong River Commission will have little or no real mandate at a time when the shape of the Mekong is under revision.

The US Response

At this juncture, it is difficult to discern a clear bottom line on China's intentions and the extent of its influence in Southeast Asia. Beijing's diplomatic initiatives and its economic overtures have reassured ASEAN and fortified relations. Its 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Code of Conduct notwithstanding, and some of its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particularly those on the Mekong River, sound a warning bell, however distant. Formulating an American response to such developments is no less difficult.

A policy which requires Southeast Asia to make an overt choi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ould be unwise and, most likely, unsuccessful. It would also be unnecessary.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Chinese-ASEAN relations are self-limiting on both sides. Undeniably, the ASEAN nations are seeking greater access to China's market and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 in general with China. They also wish to manage the growth of China as a regional power and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f that on Southeast Asia. For example, a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China might mitigate some of ASEAN's losses as foreign capital migrates north.

ASEAN governments continue to express nervousness about Chinese military intentions, particularl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y also fear spillover from conflict in Northeast Asia,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r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Some ASEAN leaders are frank in admitting that closer relations with China are an insurance policy, in case the US withdraws its military and economic support from the Southeast Asia. Expressions of concern from the US about Chinese military powe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e generally welcomed by the ASEAN states. However, ASEAN has little basis for belief that the US would intervene in disputes over the Spratlys or similar regional issues.

It is in China's best interests to ensure a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Asia, and constructive

support for Southeast Asia is by definition a part of that process. For the most part, China has been careful to stay below the radar of US concern in expand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At the same time, its growing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is reflected in reactions from ASEAN governments to Beijing's political sensitivities. Recently, Thailand ceded to Chinese pressure to cancel a labor agreement with Taiwan. In the past year, Indonesia, Thailand and Cambodia have refused to allow Falungong protests or meetings on their territories.

There is also a case to be mad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to profit from some Chinese initiatives in Southeast Asia, particularly in the economic realm. Many of these are self-evident. A Chin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can help force Southeast Asian governments to implement, and even expedite, reforms that would benefit all of ASEAN'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A more prosperous ASEAN will expand opportunities for American business.

As major powers in the Asia reg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might be expected to develop complementary roles in Southeast Asia under the best of circumstances. However, Beijing has demonstrated a clear ability and intent to capitalize on the blind spots in US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where possible. At various intervals in the 1990's, U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might have been described as a loose arrangement of irritations. The "Asian values" debate; sanctions on Burma; and over-identification with the IMF during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 all provided China with entry points to expand relations with individual countries and strengthen its overall role in the region.

The US should examine its present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in this context. For example, the intense focus on countries which are perceived to be vulnerable to terrorism leaves out several others (Vietnam, Cambodia, Laos, Burma) that are likely candidates for greater attention from Beijing. In this regard, Southeast Asia offers the United States two cautions. First, whatever the organizing principles in global US policy, ongoing security and economic issues with Asia need to be addressed in their own right. Second, the lines between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re increasingly blurred. Just as the two sub-regions are becoming more integrated, so should policymakers look for and strengthen connections in US policy.

馬華文學中的歷史想像初探：以張貴興的《猴杯》為例

陳琮淵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前言

在歷史背景與政治現實的雙重影響下，馬華文學¹的創作與發展在馬來西亞當地受到相當大的限制，此一客觀條件造成許多馬國華人作家皆有出國求學的經驗，甚至從此定居國外；台灣、香港、中國大陸等以華文為主要語言的地區，便成了他們居住與創作的主要基地，由其台灣特殊的人文條件和社會資源，也使部分的馬來西亞華裔作家逐漸成熟（黃錦樹，2003），憑藉其優越的文字駕馭技術，在台灣文壇占有一席之地，這些文學好愛者所不陌生的名字，包括早期以《拉子婦》成名的李永平；以文學評論著稱的張錦忠、黃錦樹、林建國，乃至於本文所要討論的張貴興等人都使馬華文學的創作在台灣能持續茁壯、自成一格。

曾有評論者認為馬華文學是一種離散（disapora）文學，²反映的是馬國華文作家離鄉後對該國土地的深刻的記憶與情感，這點其實可以從部分在台的馬國華文作家身上得到印證，以《群象》、《猴杯》等作品聞名的作者家張貴興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他早期的作品如《伏虎》、《柯姍的女兒》、《薛理陽大夫》等多以中國傳統小說為寫作的題材，但近年來，他的寫作開始轉向以雨林為主體並迭有佳作（如《賽蓮之歌》、《群象》、《猴杯》、《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³這些作品中的對於東馬⁴歷史（特別是華人的開發墾殖史）、群族關係（華人與達雅克人）、熱帶雨林乃至於華人家族間恩怨的生動描寫，強烈的反映出東馬這片土地對於張貴興情感上的影響，但其中最令我感到好奇的是這些作品中所呈現的歷史想像與族群關係。

在薩伊德（Edward W. Said）的經典研究中（Said，1978、1993），許多文學作品中所描寫、再現（representation）的歷史事實陳述，都是透過一種主觀想像乃至於貶抑其他的族群的角度來觀察與寫作，也就是經由建構他者（the other）的方式，確認雙方的對應關係，例如殖民者文學作品中所書寫的契約華工、當地土著等，這類書寫除了表達符合其政經利益觀點之外，也相當程度的反映了殖民母國的心態與霸權邏輯。但如果我們把關注的角度轉向被殖民

¹ 馬華文學一詞的用法頗有爭議，但非本文的所欲討論的重點，故在此略去其中的來由，詳細的討論可見張錦忠，2003，〈書寫的離心與隱匿〉收錄於《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一書。頁 61-77。

² 見張錦忠，2003，〈跨越半島，遠離群島：論林玉玲及其文學書寫的漂泊與回返〉收錄於前引書。頁 191-207。

³ 其中《賽蓮之歌》、《群象》、《猴杯》三本著作更被學者黃錦樹稱為「雨林三部曲」，黃氏對此三本著作中有關漂流華人自我意識有相關的探討，詳見黃錦樹，〈從個人體驗到黑暗之心：論張貴興的雨林三部曲及大馬華人的自我理解〉，《中外文學》，第三十卷第四期（2001），頁 236-248。

⁴ 東馬一詞包含婆羅洲北部的砂拉越與沙巴兩地，在戰略與利益的考量下，由英國主導東馬於 1963 年 9 月 16 號與西馬十一州、新加坡合併，正成為「馬來西亞聯邦」，兩年後新加坡獨立，東馬雖在共產黨與砂拉越人聯黨（SUPP）的反對下，砂拉越與沙巴仍成為馬來西亞之一部分。張貴興出生地羅東市便位於砂拉越境內（見圖 3）。詳見黃建淳，1999，《砂拉越華人史研究》，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者的本身，來觀察各個被殖民族群的互動關係時，一個有趣的問題產生：這些被殖民者如何看待其他被殖民的族群；一個他者如何去重寫、再現另一個他者。

爲了解此一問題，我以東馬爲例，除了參照真實歷史事實，也希望從張的著作《猴杯》中勾稽出部分歷史想像成份，並對其南洋論述與我群／他者的區分作一初步的分析，進而討論後殖民時期馬華文學創作中所反映的自我意識與族群關係。

一、戰後馬華小說發展與特色

在一步討論之前，我們有必要簡單的回顧一下戰後馬華小說寫作發展的梗概與寫作特色，以方便我們對主題有更明確的掌握。馬華文學史的分期問題，一直以來受到學者們的重視，方修在《戰後馬華文學史初稿》中以政治事件作爲分期依據的見解，⁵受到一定程度的接受，但後進學者亦以各種不同角度提出許多新的看法，⁶其間或有異同，爲了便於了解，以下我採行方修的分期爲基本架構，並輔以其他學者的見解，將戰後馬華小說的發展簡單加以敘述：

（一）戰後初期（1945-1948）：

日軍雖僅占領東南亞短短的三年八個月，但其殖民過程所帶來不愉快經驗卻深深留在當地人民心中，對殖民主義的揚棄與自由的渴望成爲當時社會發展的主流。這時期的新馬作家寫作便以反對殖民統治、爭取自由獨立爲基本主題；部分作品描寫東南亞的民族主義運動，有些則是歌頌了反抗日軍統治保衛家園的英雄人物；此外也有一小部分的作家以社會寫實的角度來創作，展現戰後仍處於殖民統治下的人民生活樣貌。

此時期的題材與寫作的特色上，主要可以分爲三大類：

1. 回憶日軍統治：

主要是因爲日本戰敗後作家們才得放下心中的顧忌，以追憶的方式來發抒受日本統治時期的見聞與故事，例如林參天的《余哀》便描寫了聯軍戰俘在日軍吉隆坡集中營的生活，揭發了日軍虐待戰俘的行爲；丘天的《復仇》則敘述了日軍在當地的暴行與人民的痛苦與反抗。

2. 民主與民族運動英雄人物的塑造：

這類人物的產生反映著時代的需求與人心的渴望。作家們對於民族的重振與民主嚮往的情感投射在小說的創作上，變造一種對於英雄人物的熱切期待，這類英雄人物形象出現在夏霖的《沖》裡的馬來水手、苗秀的《紅霧》中的黑三等。

3. 以原鄉社會爲題材：

此時期的華文作家多半來自中國，在創作主體上仍以中國爲主，描寫中國社會生活的情況與人情風俗，此類非本地題材作品在華文創作上的比率與數量頗爲可觀。

⁵ 方修的分期爲一、戰後初期；二、緊急狀態時期；三、反黃運動時期；四、獨立前後；詳見方修，1987，《戰後馬華文學史初稿》，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⁶ 如馬華文學的先驅者方北方便以文學的生態史觀將馬華文學分爲一、前期：1919-1942，爲新馬文學的萌芽期；二、中期：1945-1965，轉向以當地爲寫作對象；三、1965-1983，馬華文學進入發展期；四、1980年代以後。而楊松年在〈本地意識與新馬華文文學〉則劃分爲六期。而在晚近的研究中黃錦樹則將馬華文學的發展分爲一、以外來文學爲主體的階段；二、以本土意識主導的階段；三、文學主體性建立的階段；四、獨特文學風貌的階段。詳見劉小新，〈近期馬華的馬華文學研究管窺〉一文，收錄於《華僑大學學報》，一九九七年第四期，頁 53-54。

（二）緊急狀態時期（1948-1953）

雖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一小段時間內，馬華文學得到了喘息的空間，但在國際情勢仍是不明朗狀況下，英國殖民政府頒佈緊急法令，⁷使新馬地區的言論自由與寫作空間受到很大的約束，不少的雜誌、刊物遭到停刊的命運，華文創作開始進入一段低潮時期，由於時局的嚴峻，許多作家不敢碰觸敏感的政治與現實社會問題，轉而以側面而間接的手法來表達對民主與民族獨立的思想，取材的方向以兼取當地與中國兩者為主的「華僑」、「僑民」文學與描寫當地下階層人民生活情況的作品為主。這時期的華文作家對當地（新馬地區）的認同感逐漸產生，僑居的意識轉淡，加上戰後的文學論戰，使得馬華文藝創作的特殊性受到重視，馬華作家更重視以當地為題材的創作。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長篇小說的創作在此時起步，第一本長篇小說《火浪》的出現後，引發後續許多同類創作，此外，作家們也開始將注意力放在小說集的出版上，《為兒女求婚》便收錄了許多當時作家的小說創作。

（三）反黃運動時期（1953-1957）

在緊急法令之下，文學創作的風氣日漸衰微，色情小說乘勢而入竟成為書藉市場上的主流，社會風氣也為之腐化。1953 年底由新加坡青年學生的發起下，展開了一場反對黃色文化的社會運動，稱為「反黃運動」。在同一時期，新馬反抗英國殖民的運動也到達一段高潮，在這兩股政治與社會動力的帶動下，文藝創作也出現了蓬勃發展的盛況。這段期間內馬華文藝創造的獨特性（在地性）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漸漸成為主流，許多新生代的作家也都出生於斯，並汲取當地豐富的人文與社會題材，創作出情感豐富且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四）獨立前後時期（1957-1965）

新加坡獨立為此時期畫分斷限。這段時間內馬華文學發展呈現一種高低起伏的態勢，文學的創作主要受到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早期馬華現代主義的創作開始萌芽，突破了以往寫實主義的框架與敘述手法，不再追求客觀的反映真實世界，而是著重在人類的心理與感覺世界的傳達，即一種意識流式的寫作風格，不論在內容與形式上，現代主義對馬華文學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另一方面，此時期文學發展的成果有一部分要歸功於南洋大學的努力，南大不但創辦《大學青年》雜誌，並常舉辦文藝座談會與文學創作比賽，使青年作家有發表的空間，許多質量俱精的作品由此產生。

（五）馬華文學覺醒期（1976-1985）

時期是馬華文學走出困境的轉折時期，在文學理論、創作水準與新血輪的入替上都有長足的進步，一些文學組織與基金會也於此時成立，（如馬來西亞寫作人協會、砂拉越州寫作人協會的成立），皆對文學活動的推展有很大幫助，在此同時，著名的文學雜誌《蕉風》於 1978 年的復刊與各類報紙的文學副刊也使得馬華作者們更大的發揮空間。

（六）馬華文學的振興期（1986-）

由於經濟發展與族群關係相對穩定，馬華文學的創作、出版的發展在近年可說是十分蓬勃，不僅有長篇小說的佳作產生（如方北方的《樹大根深》、《枝榮葉茂》、《花飄果墜》三部曲），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也大有進展，北方北、吳岸等人結合馬華文學的發展與自身寫作的

⁷ 由於「馬來亞共產黨」在 1948 年 6 月全面叛亂，英國殖民政府於該年 6 月 12 號宣佈全國戒嚴，使整個馬來半島進入「緊急時期」。詳見顧長永，《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頁 80。

經驗，對當代的馬華文學作品提出比較客觀的見解，旅居台灣的張錦忠更是引用國外的文學批評理論來重新詮釋馬華文學的發展，開創出一片新的局面，⁸基本上，馬華文學開始走向多元化、國際化的路途。馬華文學的發展雖然其先天上的限制與些不確定的因素，⁹但其前景仍然值得我們期待。

在大致說明馬華文學發展過程之後，我將焦點轉向《猴杯》情節所發生的場域——砂拉越¹⁰，藉由歷史發展與社會背景來重現張貴興筆下這個危險而神秘的熱帶雨林。

二、殖民與後殖民場域：砂拉越近代的發展歷程

航海大發現以降，東南亞地區便開始受到帝國主義國家各種形式的侵略與剝削，位於婆羅洲汶萊王國亦不能倖免於難，英荷等國憑藉優勢武力為後盾，17世紀末起於東南亞廣設商館作為貿易與武力投射的基地，¹¹首先在荷蘭有計劃的擴張下，19世紀時，原領有整個加里曼丹的汶萊，領土僅剩下北婆羅洲（現今汶萊本土、與現為馬來西亞所屬的砂拉越、砂巴兩州），1841年，英國冒險家詹姆士·布魯克（James Brooke）（參見照片1）藉著為汶萊蘇丹平定國內諸侯內亂功勞，受封為砂拉越的總督，¹²並在五年後宣佈脫離汶萊成為獨立國王，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之後，經由一連串的征服與墾殖策略運用下，布氏領有除了現今汶萊之外的整個砂拉越，並靠華工（中國苦力勞工）的引入，大力開展當地的種植與採礦事業，在種種條件配合下，布氏於砂拉越的政權日益穩固，安定的社會逐漸成型。

1942-45年間日軍的占領造成東南亞地的反抗風潮，但此一努力始終未能有重大的進展，戰爭結束後，布魯克家族無力經營砂拉越，只能讓砂拉越由英國政府購回殖民權力，結束前後三代的家族統治事業。

1961年，馬來西亞首相東姑拉曼提出以馬來西亞、新加坡、沙巴、砂拉越、汶萊組成聯邦國家的方案，使當地人士相當不滿，反大馬、反合併的聲浪四起，但在英國政府有主導與策應之下，砂拉越最後仍併入馬來西亞成為其所屬中之一州，另一方面，不滿合併¹³的砂拉越地下共黨在印尼蘇卡諾政權的支持下，仍有組織的從事反馬來西亞活動，但自1970年代起，國際政治情勢改變，砂拉越的社會也日益穩定，砂共迫於主客觀情勢，才放棄抗爭，回歸社會。

在上述歷史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近代砂拉越其實受到外國勢力相當大的支配，從早期的荷蘭到後來成為馬來西亞之一州，都可部分印證這樣的情形，進一步考察當地社會發

⁸ 詳見張錦忠，《文學影響與文學複系統之興起》博士論文，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研究所。

⁹ 馬華文學寫作的困境主要包括官方不認同與不重視、華文教育傳承、資源的缺乏等，詳見張錦忠，前引書頁61-76。

¹⁰ 有關砂拉越的名稱，從古至今有許多種說法，例如「砂勞越」、「沙勞越」、「砂勞越」，由於「勞」的具有不好的意思，故自1990年起，砂州的名稱由「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定名為「砂拉越」，轉引自黃偉雯，《「砂拉越留台同學會」之研究（1964—1996）》碩士論文，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¹¹ 英國人於1612年抵達婆羅洲，1698於萬悅辰（Bandjarmasin）設立商館，後為荷蘭人所逐而轉向北婆羅洲，由於英人曾協助蘇祿蘇丹一世（Alimuddin I）復位，在他的許可下，英國人開始於北婆羅洲廣設商館，其中山打根一地的商館更成不列顛北婆羅洲公司（或稱渣打公司）的前身。詳見王雲五，1989，《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十二冊，歷史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頁232。

¹² 蘇丹（sultan）為官職名稱，為國王之意，1839年北婆羅洲的達雅克人因不滿馬來蘇丹的統治群起反叛，為感謝布魯克協助平亂，蘇丹授予他拉者（Raja）的封號與部分土地的稅收權。參見照片1，拉者布魯克像。轉引自黃建淳，1999，前引書，頁154。

¹³ 不滿馬來西亞合併計劃尚包括前述所及之砂拉越人民聯合黨，當時該政黨對於砂拉越前途的看法可見於該黨機關報『團結報』中所發展的一篇名為〈獨立運動中的若干問題〉的論文，轉引自南洋文摘，1961，合訂本第二卷第九期，頁1-4。

展的情況與族群互動的關係，則更能幫助我們理解張貴興在《猴杯》等小說的歷史想像，我主要想說明的是在《猴杯》中所提到有關種植園的華工生活相關的背景。

由於墾殖所需與成本利益的考量，殖民主義國家往往在採行分而治之（divide rule）的間接統治手段，來統治殖民地的各種族群，此一統治手法對當地社會發展與族群關係造成很大的影響。在治理華人移民時許多殖民主義者常採行以下三種制度分別為：¹⁴

（一）甲必丹制（Capitao）¹⁵

此制度最早是英國與西班牙在殖民地所採行的統治手段，後來荷蘭跟進實施，通常是用來管理華人，因為華人之中有許多不同之語言與族群，提拔華人領袖為其所用以管理華工與替政府執行政令，對殖民政府而言不失為一種低成本而高效率的統治方式。甲必丹一職通常由殖民政府遴選當地各種族之首領充任，負責處理該轄區內各種事務之管理，也是各族居民與殖民政府之中介者。事實上，甲必丹係一榮譽職銜，政府並不支付任何薪水，雖然如此，甲必丹實際上仍需要為當局履行若干行政事務。彼等無一不是財力雄厚之富商巨賈，因其在商業網路具有強大之人際關係與支配能力，才能影響地方事務之決行。它同時也是國家法律之代表，不僅維護當地（其轄區）之正義和秩序，更要排解紛難，反映民瘼為殖民政府施政之參考。另一方面，甲必丹也會藉著與政府之關係爭取更多利便與優惠，以擴大本身經濟實業或商貿發展之機會。如砂拉越古晉之王長水，藉此奠定王氏在福建華人之地位與以此增加財富與勢力。一般而言，甲必丹制度在此之國家與時代，尤其是間接管理之制度之下，與華人之社會結構形成密不可分之關係。

（二）餉碼制度（Farm System）

餉碼制度是另一個在當地有錢華商可以謀取暴利之機會與方法。由殖民政府將民生必需品（煙、酒、賭、當為主，通常以鴉片煙為主，與當地之民情有關）公開招標，而將其治下分為許多區域，由得標者（又稱為碼官，有兩年到三年之該項貨物壟斷權）也就是大盤商，向政府繳固定的承餉金額。如鴉片煙還要向政府以固定價格購進生鴉片，由自己的工廠加工、包裝而出售。因為是壟斷事業，龐大的利益可想而知，例如潮籍劉建發之義順公司，承包餉碼二十年，成為砂拉越古晉一帶無人可敵之富商。雖然時至民初清末，孫中山與康有為在新加坡提倡禁煙運動，加上民族意識抬頭之影響，使砂國後來廢除了此制度，並將吸鴉片者編冊管理、也將鴉片改為國有專賣。

（三）港主制度（kangchu System）

發源於馬來亞之柔佛，脫胎於廖內群島早期之耕作制度。簡言之便是將河邊的土地授與專人開發墾殖之制度。港主制直到 19 世紀才產生，係囊括前二者之性質而形成，召以雄財而有能者，去開發處女地，由殖民政府給予其地位，港口以其名名之，即為港主。而其必備條件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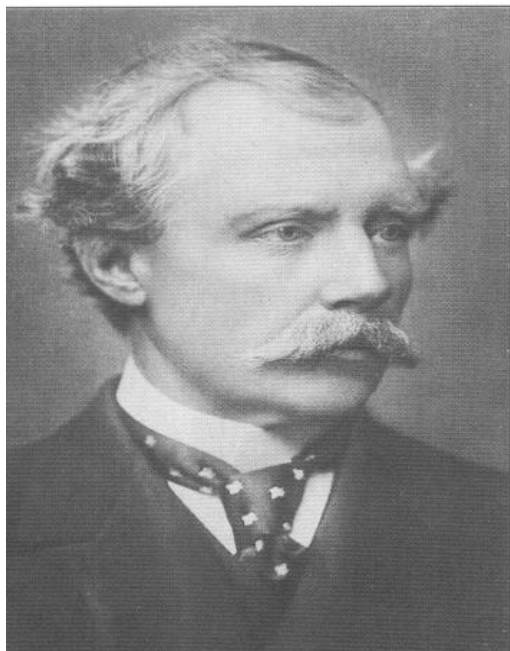
1. 港主須自行招募足夠之人手（通常是招募同鄉，語言能通，方便管理）。
2. 港主可以規劃港口之生產方向（經濟作物之種植或進出口貨物）。
3. 港為外銷港且政府不可抽稅；但港主仍需要繳一定之資金給政府。

¹⁴ 詳見黃建淳，1993，《晚清新馬華人對國家認同研究——以投資、賑捐、封爵為例》，台北：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頁 97-127。

¹⁵ 關於華人甲必丹制的可參閱王雲五，1989，前引書頁 223-224。



照片 1 拉者布魯克像 (James Brooke, 布魯克王朝開國者)。資料來源：黃建淳，1999，《砂拉越華人史研究》，台北：東大圖書公司，頁 154。



照片 2、3 布魯克王朝第二、三代領導人由左至右分別為 Charles Brooke、Vyner Brooke。資料來源：黃建淳，1999，《砂拉越華人史研究》，台北：東大圖書公司，頁 1167、460。

當然，港內之餉碼制度由港主負責，例如錢幣之發行等皆是港主藉以謀取暴利的良方。另一方面，殖民政府也會強制對受港區之土地要求按期開發；對港主之保安權也限在政府法庭所賦予之規定範圍內；¹⁶並以法令規定勞資雙方之權利義務，以保障雙方之互動關係。今日各地之華社發展多奠定於此制度之下華人墾殖之生聚與努力。

由港主制中，我們不難理解《猴杯》中描述的（華人）種植園主余石秀何以有如此大的權力來支配種植園，另一方面，他控制華工的手段也反映了餉碼制的實行的影響，在人與制度互動的過程中，（華人）種植園主人除了契約與暴力之外，更藉由煙、酒、賭、妓等手段來管制華工生活，使其終其一生難以離開種植園，以遂其私利，這些情境在《猴杯》中得到生動的還原。

三、國族論述與他者建構：《猴杯》中的歷史想像

再現他者的過程除了反映出自身／他者的對應關係外，通常也包含著一套對國族建構、文化認同的完整論述。「南洋」在馬華作者眼中意味究盡著什麼？他們又是如何建構的所謂的「南洋論述」呢？在文化研究的範疇中，研究者可以用從文本（text）中去發現這種顯見或隱含的論述，以此角度來觀察馬華作家的作品，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被殖民時期同樣被西方人視為他的華人與其他土著族群，是怎樣看待彼此。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我除了討論殖民時期的歷史因素外，也思考了戰後馬來西亞的發展，希望能對應出影響作者寫作的歷史與現實政治背景。

二次戰後，當馬來人高舉民族主義旗幟爭取國家獨立並組建新國族時，華人並沒有被視為該國族組成的一份子，許多馬來人，仍將他們視為外來者或殖民主義者的附庸及幫兇，¹⁷1957年，馬國更以法律¹⁸形式，有效的排除貶抑華人的政治經濟地位，建立起馬來人的特殊優勢與利益，¹⁹馬來西亞統治菁英的論述中，所謂的馬來人，指的是信仰伊斯蘭教的、說馬來話、遵行馬來習俗（adat）²⁰人的一群人，只有這批所謂的「土著」（bumiputra）有資格享有這片土地上的所有資源與特權，在本土意識高漲時情況下，華人只有被邊緣化的份，²¹不僅在政治屬於從屬地位、教育管道與資源也嚴重的缺乏，在馬來語正式成為馬國語之後，華語被貶低為一種方言，華語教育的推行更行艱難，由於馬國教育政策使然，²²華人子弟想在國內接受高等

¹⁶ 雖然殖民政府對港主權力有所限縮，但在其負責的區域中，港主除了一般的行政權之外，仍具有對住民拘留查問與十二藤鞭的保安權，詳見黃建淳，1993，前引書，頁 111。

¹⁷ 如馬國總理馬哈迪早期的作品中便反映出此種意識，認為華人「懂得當地語言，並且擁有各種聯繫和組織。使得歐洲商人能夠對馬來蘇丹王朝進行敲骨吸髓的壓榨。」詳見馬哈迪，1981，《馬來人的困境》，頁 34-37。

¹⁸ 此處所指法律為馬國憲法，馬來西亞於 1957 年 8 月 31 日脫離英國殖民統治正式獨立，在此之前，根據李特制憲調查團的建議，英馬兩國簽定「1957 年馬來聯邦協定」，此定在該年 8 月 27 日為馬國聯合邦立法會接受後正式頒佈。

¹⁹ 馬國於 1957 年所實施的憲法第一五三條規定了馬來人在公職、獎學金、專業執照等方面的特殊保障，一方面形成馬來人的獨大，但同時也埋下了族群衝突的不穩定因素。詳見林若雲，2001，《馬哈迪主政下的馬來西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1981-2001）》，頁 18-19。

²⁰ 在伊斯蘭教影響當馬國生活習慣之前，各地方早已存在所謂的（adat）習俗或習慣法，對當地居生的日常生活、價值觀、宇宙觀等產生重大影響，詳見，《星馬通鑑》，頁 436-437。

²¹ 當時如泛馬伊斯蘭黨及馬來西亞國民黨等政黨多以宗教與狹隘種族主義為號召，提倡大馬來人主義，高唱一種民族、一種語言的論調。詳見陳玉水，1960，〈進展中的馬來亞民主政治〉，南洋文摘，合訂本第一卷第三期，頁 18。

²² 馬國不准以華文或英文為主要教學媒介的大學成立，同時，為了保障馬來人的土著權利，馬國大學中以所謂固打制（quota）的方法來限定馬來人與其他族群的比率。參閱張錦忠，2003，前引書，頁 69。

教育的機會很小，一般人通常只能前往外國留學（如張貴興、張錦忠等人就是很好的例子），東馬的情況更是特殊，前述所及，二次戰後東馬原本有機會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但卻在國際情勢下被迫與馬來西亞合併，²³本可擺脫他者命運的東馬華人與當地土著，²⁴在政治現實使然下，只能默默接受馬來西亞（西馬）官方的意識型態，從中心逆轉爲邊陲，再度被邊緣化爲他者，這個政治決定所對東馬（特別是砂拉越）華人而言，所帶來心理層面上的影響，化成了一種不安全感，在張貴興《猴杯》裡，我們也不難發現這樣的例子：

婆羅洲島又濕又滑像一隻眠息中的樹蛙。樹蛙頭部朝著東北，左和半個左腹是砂勞越，蛙頭和蛙脖子是砂巴和汶萊，其餘則是加里曼丹...朝頭上的菲律賓蝶群、台灣蛹和日本蜻蜓吐出舌頭。雨蛙的背後是像大蟒從亞洲大陸出擊的馬來半島，正張口吞吃新加坡蠱斯和虎視眈眈雨蛙。（張貴興，2000：24）

這段敘述中，作者對於東南亞地理空間（圖1、2、3）的擬物化描述體現出一種文化的焦慮感，身爲砂拉越人對於西馬顧忌，認爲「馬來半島正張口吞吃新加坡蠱斯和虎視眈眈雨蛙（婆羅洲）」，這點除了西馬政治意識型態的強壓之外，似乎可在從前述的砂拉越近代史中找到歷史性的根源，或許在張貴興的心中，熱帶森林中的雨蛙總是不免受到大蟒的覬覦。自我認同與身份的憂慮似乎不會隨著時空的換置而有所改變，這大概可以從張貴興來台前期的寫作中看出端倪，相對於《猴杯》華麗濃稠的敘事風格，他早期的著作如《薛理陽大夫》等中，他並沒有把雨林當作書寫的主體，而是以比較平實的手法來處理一些中國傳統的題材，多少也反映出他的初到異地的不安，直到後期的《賽蓮之歌》《頑皮家族》、《群象》、《猴杯》等一連串的作品才開始書寫以故鄉砂拉越爲主題，也流露出較多有關其自身認同與當地族群關係的記憶。這種不安我們可以在小說主人翁於飛機上與一位小女孩母親的對話中隱隱發現：

小女孩母親：「台灣出生嗎？」

雉（主角）：「不。婆羅洲。」

小女孩母親：「國籍是.....」

雉（主角）：「也不清楚。十九歲來台唸大學，畢業後用雙重國籍入了台灣籍，隨後棄了馬國國籍。台灣把我當作來自東南亞的野人.....」

小女孩母親：「是啊。就像紅毛猩猩，放生時，還是要回到婆羅洲.....」（張貴興，2000：30）

作爲一個出生東馬的華文作家，張貴興對自我身份認同的不安與緊張在《猴杯》中時常經意或不經意的流露出來，他以個人生命經驗與馬國華裔的身份作爲思考寫作的觀察點，其作品中（《猴杯》）所解讀、重現的華人拓殖過程與當地其他族群互動，多少也反映了認同仍是馬國華人發展中相當重要的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在族群關係上《猴杯》中有一段文字隱喻了殖民時期各個種族的特性：

代表達雅克語的小貓擅撒嬌，常惹得亞妮妮嘎嘎笑；代表英語的小貓較粗暴，在亞妮妮胸前張牙舞爪挑釁另外兩隻小貓咪；代表華語的小貓咪孤僻沉默，似乎也較獲

²³ 戰後共產勢力抬頭，北婆羅洲的共產勢力在印尼等國的扶植下漸成氣候，在考量共產勢力可能突破國際反共防線與危及統治基礎的情況下，英國政府乃積極促成馬來西亞的聯邦的產生。

²⁴ 北婆羅洲土著民族十分複雜，其中包括達雅克人（Dayaks）、伊班人（Iban）也就是海達雅克人、加央人（Kayan）、馬羅人（Maloh）與馬來人（Melayu）等，《猴杯》中提及的達雅克人多居住於極可能居住在成邦江一帶或砂拉越古晉山區，詳見黃建淳，1999，前引書，頁85，及林開忠，1998，〈砂勞越的一般概況〉，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第四期，頁31-37。

得亞妮妮的寵惜。(張貴興, 2000: 308)

在殖民歷史上, 相對於外來殖民統治者粗暴蠻橫的掠奪當地資源, 華人的確是比較務實的, 在前述三種間接統治的制度下, 他們一方面專著在種植園與其他謀生事務, 一面方沈溺於物慾(鴉片、賭博、娼妓等)與個人與家族的權力野心, 不願將心力放在反抗殖民統治, 而達雅克人基本上仍維持原始的生活,²⁵只是在以物易物的體系下, 被納進殖民生產體系的一環。



圖 1 砂拉越與婆羅洲地理形勢圖。資料來源：佚名, 1965, 《砂勞越與其人民》第二冊, 香港：友聯出版社, 頁底。轉引自黃建淳, 1999, 《砂拉越華人史研究》, 台中：東大圖書公司, 頁 80。

²⁵ 達雅克人的日常生活狀態, 可參見圖 4 到 6。



圖 2 英殖民時代砂汶形勢圖。資料來源：黃建淳，1999，《砂拉越華人史研究》，台北：東大圖書公司，頁 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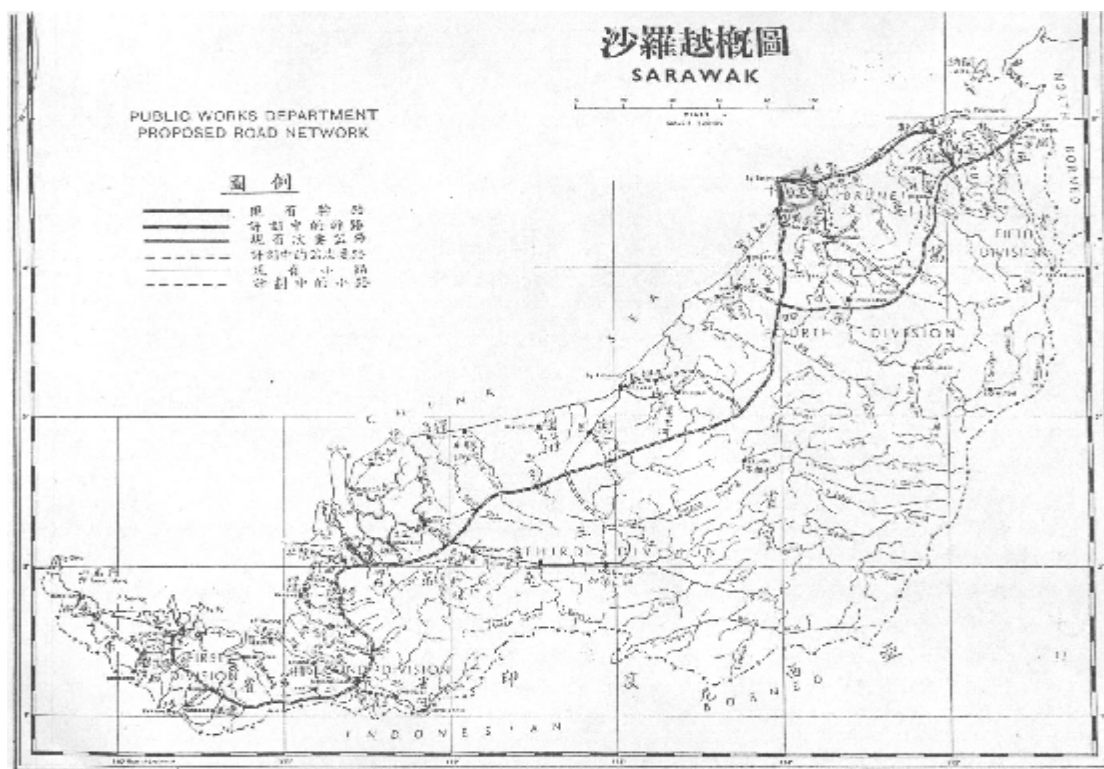


圖 3 沙羅越概圖。資料來源：黃耀明，1961，《沙羅越風土誌》，詩巫：出版者不明，頁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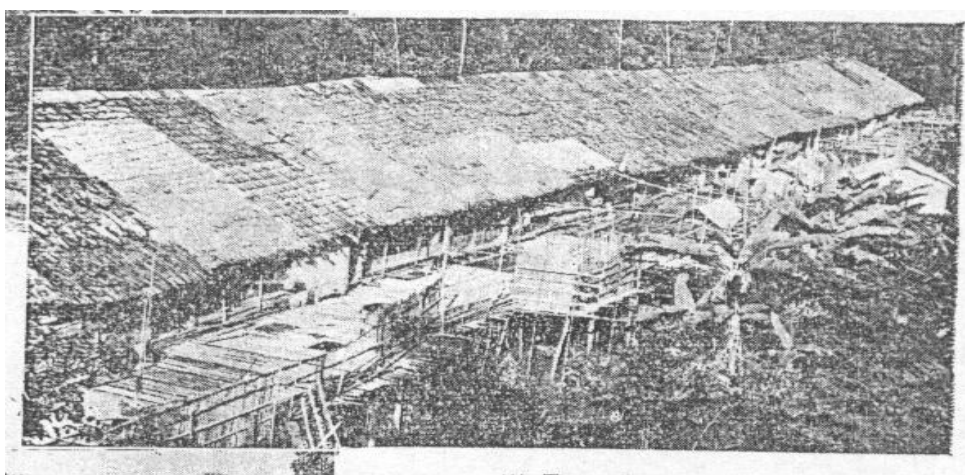


圖 4 達雅克人所居住的長屋。資料來源：黃耀明，1961，《沙羅越風土誌》，詩巫：出版者不明，頁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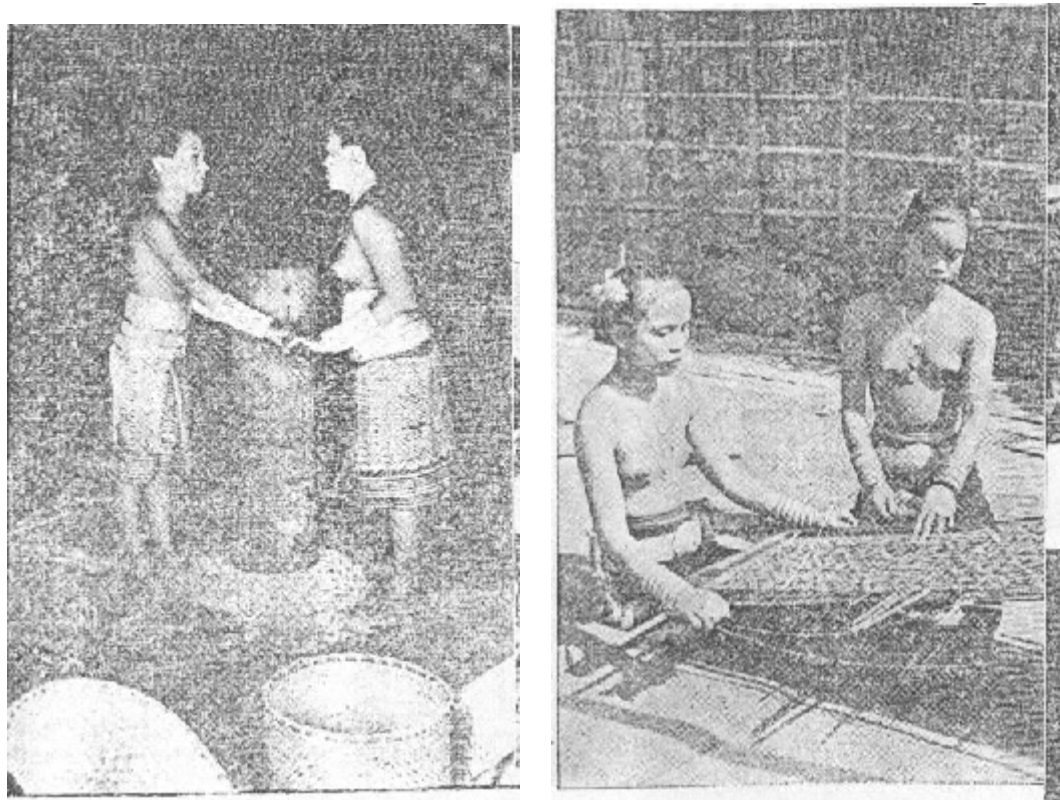


圖 5、6 達雅克人的生活面貌。資料來源：黃耀明，1961，《沙羅越風土誌》，詩巫：出版者不明，頁 21、27。

在這種族群分際與雨林惡劣的生存環勢下，華人不免產生一種適者存的觀念，認為只有透過與叢莽野人的抗爭，才能確保自己的生存。正如書中作者描述：

...曾祖逐漸發現園區和土族之間的關係，猶如蜜熊之於蜂巢，紅毛猩猩之於野榴槤，蟒蛇之於食蟹猴，是一種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複雜進化課題和食物鏈之爭，關鍵在於誰是掠食者和被掠食者。曾祖在逃躲十多次土族刺客的暗殺和圍捕後，終於決定向殖民政府購買軍火組織巡邏隊，和土族及毒蛇猛獸展開一場超過一甲子的攻防戰。
(張貴興，2000：181)

主角的曾祖父在訓斥其子時也說：

...你以為我那一點比白種人強？有誰願意和毒蛇猛獸為鄰一輩子？有誰願意在這塊煉獄一生... (張貴興，2000：191)

基本上，殖民時期的華人仍以殖民者的眼光來看世界，在描述當地生活景況時，體現出自身存在的憂患意識，認為只有透與無情環境的不斷鬥爭、取得勝利（比白種人強），才算具備在當地生活的條件，這種不安也使得當地華人產生一種以經濟事業發展作為填補心靈危機的自我安慰方式，也讓他們不知不覺重蹈複製了其他區洲殖民者的統治心態與觀察視野。

由以上的述敘中，我們不難理解何以華人如何建構出他們的心目中的他者－達雅克人，

他們是一群必須「被」克服的障礙、生存的挑戰與資源的可能競爭者。在缺乏相互了解與資源的衝突的情況下，對華人而言，這個「他者」也就成為雨林中最神秘與危險一群。

四、互為主體的視野：代結語

《猴杯》以熱帶雨林中的華人墾拓過程為主軸，敘述熱帶雨林中三個家族間的糾葛，也生動的描繪了婆羅洲博物誌（豬籠草、大蜥蜴、紅毛猩猩）與風土記（達雅克族、長屋、獵人頭），作者詞藻華麗、引喻生動，書中多重交織的情節安排也使人目不暇給，²⁶若從後殖民述敘的角度來看，書中對於政治（西馬、東馬）、種族關係（華人、達雅克人）的描寫，反應出作者出他者的、邊緣的書寫身份的關照，他以此種身份來書寫、回顧華人移民與當地族群的互動關係，反映出其中華人移殖過程中黑暗的一面，雖然當地華人在歷來受殖民主義者、國家機器剝削，成為壓迫者眼中生財利器與政治上馴服的伙伴，在殖民主義與馬來土著沙文主義下成為被邊緣化的他者，但當他們成為種植園的統治者時，也毫不猶豫的將土著（達雅克）民族貶抑為他者，目之為獵頭的野人與逞慾的對象，張貴興在《猴杯》所描寫的華人完全複製的殖民思想的觀察方式，缺乏於當地土著一種反身性的理解與思考，僅僅用征服者與開拓者的眼光去看，但諷刺的是，以這種挪用他者的視野並不能讓當地華人擺脫自身的他者地位，找到自我的認同與歸屬。

族群互動與自我認同的過程中，德國學者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互為主體觀念（哈伯瑪斯，1994：108—112），提供我們一個嶄新的視野，他認為惟有主體與主體間的互動才能算的上是交往，只有雙方放棄邊緣化、拒斥的態度，將對方視為主體的一部分，才能達成彼此間的溝通與和諧，從《猴杯》的歷史想像中所反應的族群關係看來，華人在當地除了自身認同的疑慮外（到底是中國人或馬來西亞人的中國人），也面臨著與其他種族的互動與彼此認同的緊張關係，離開小說，在現實生活中，當今馬來西亞的華人也面臨相似的問題與挫折，或許《猴杯》中敘述的既是歷史的想像，也是部分華文作家心中的焦慮與不安吧！閱讀《猴杯》的過程中也不禁令我再一次反思主體／他者關係，也期待各民族間真的能以互為主體的方式來看待對方，而不是一再的型塑「另一個他者」。

²⁶ 詳見張錦忠，〈婆羅洲雨林的後殖民敘事〉，《聯合報・讀書人》，2001年1月15日。

參考書目

- 王雲五名譽總編，方豪主編，1989（1978），《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十二冊，歷史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艾立克·沃爾夫（Eric Wolf），2003，《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賈士蘅譯，台北：麥田出版社。
- 林水檮、駱靜山，1984，《馬來西亞華人史》，檳榔嶼：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
- 林若雲，2001，《馬哈迪主政下的馬來西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1981-2001）》，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
- 南洋文摘編輯部，1960，《南洋文摘合訂本第一卷》，新加坡：南洋文摘出版社。
- 南洋文摘編輯部，1961，《南洋文摘合訂本第二卷》，新加坡：南洋文摘出版社。
- 星加坡世界書局，不詳，《星馬通鑑》，新加坡，星加坡世界書局。
- 吳鳳斌，1988，《契約華工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周丹尼，1990，《砂拉越鄉鎮華人先驅》（Chinese Pioneers on the Sarawak Frontier 1841-1941），黃順柳譯，砂拉越：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
- 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1994，《交往行動理論，第一卷，行動的合理性和社會的合理化》（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lins.band I: Handlungsrationaltat und gesellschaftliche rationalisierung），洪佩郁、蘭青譯，重慶：重慶出版社。
- 馬哈迪（Mohammed, Seri），1981，《馬來人的困境》（The Malay Dilemma），劉鑑銓譯，馬來西亞：世界書局。
- 陳翰笙，1980，《華工出國史料匯編》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
- ，1981，《華工出國史料匯編》第四輯，北京：中華書局。
- ，1984，《華工出國史料匯編》第五輯，北京：中華書局。
- 張錦忠，2001，〈婆羅洲雨林的後殖民敘事〉，《聯合報·讀書人》，2001年1月15日。
- ，2003，《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台北：麥田出版。
- 張貴興，1992，《賽蓮之歌》，台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
- ，1996，《頑皮家族》，台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
- ，1998，《群象》，台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
- ，2000，《猴杯》，台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
- 張錫鎮，1995，《當代東南亞政治》，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 黃建淳，1993，《晚清新馬華人對國家認同研究—以投資、賑捐、封爵為例》，台北：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
- ，1999，《砂拉越華人史研究》，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黃錦樹，1998，《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台北，麥田出版社。
- ，2001，〈從個人體驗到黑暗之心：論張貴興的雨林三部曲及大馬華人的自我理解〉，《中外文學》，第三十卷第四期。
- ，2003，《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元尊文化。
- 黃耀明，1961，《沙羅越風土誌》，詩巫：出版者不明。
- 顏清湟，1991，《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
- ，1992，《海外華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1991，《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李金梅譯，台北：麥田出版社。
- 薩伊德（Edward W. Said），2002（1978），《東方主義》（Orientalism），王志弘、王淑燕等譯，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2（1993）《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蔡源林譯，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顧長永，2000，《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東南亞政經大事記（1900-2000）

馬來西亞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00年	* 古晉（Kuching）開設電話。 * 吉蘭丹（Kelantan）發生蘇丹繼承問題，泰國軍事介入，扶殖塞尼克（Tengku Long Senik）為穆罕默德四世（Muhammad IV）蘇丹。 * 沙巴（Sabah）最早的鐵路開通，由韋斯頓（Weston）至保佛（Beaufort）。
1.31	東沙巴領導人馬沙雷（Mat Salleh）在經過 5 年游擊戰後，於與英軍作戰中被殺。
1901年	* 伯區（Arnest Birch）就任北婆羅洲（沙巴）長官。 * 沙撈越（Sarawak）首次進行組織性華人移民，入殖地為詩巫（Sibu）。 * 史威頓罕（Frank Swettenham）爵士擔任馬來各邦高等參事官（High Commissioner）。
1902年	* 英暹共同宣言成立，承認吉蘭丹為泰國的保護領。
3	馬來半島的北大年（Pattani）土王卡瑪汝丁（Abdul Kadir Kamaroodin）率回教徒起事，但迅為泰國收平。
1903年	* 吉蘭丹地區接受英人顧問指導政治。 * 沙巴停止課徵稻米進口稅。 * 英人導入羅馬字表記法取代原有爪夷（Jawi）文字，並於中學加入宗教教育。 * 第二次馬來各邦領袖聯合會議（Conference of Rulers of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在吉隆坡舉行。 * 沙撈越設立最早的高等學校。
1904年	* 吉打（Kedah）接受英人顧問指導政治。
1905年	* 馬來亞設立愛德華七世醫科學校。 * 沙巴發生希昆頓（Si Guntung）之亂。 * 亞庇（Jesselton，即 Kota Kinabalu）至保佛的鐵路開通。 * 錫林波旁（Silimpon）煤礦開始採掘。 * 設立維多利亞師範學校。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2 英國為培養中級行政人材，在瓜拉岡莎創辦「馬來行政學院」(The Malay Administrative College)，以訓練馬來皇族與貴族子弟，由此形成對抗華人、印度人的「馬來人意識」。
1906年	* 加里曼丹 (Kalimantan) 北部的納敏 (Labuan) 島編入英國海峽殖民地。 5. 最早的印度人協會在怡保 (Ipoh) 成立。 7. 「艾爾·伊曼」雜誌創刊。
1907年	* 英國殖民政府在馬沼 (Madras) 設置印度勞工事務所，監督印度橡膠工人的勞動條件。
1908年	* 英國政府委員會調查華人鴉片吸食狀況。 12. 「艾爾·伊曼」雜誌停刊。
1909年	* 沙巴的蘭頓 (Rundum) 發生動亂，同年北婆羅洲公司在此設立教育局。 * 鐵道延伸至新山 (Johore Bahu)，直抵馬來半島南端。 * 廢止以工代稅或以工代佃租的制度。 * 有鑑於先前組織過度鬆散，英國設置馬來各邦聯合評議會，由海峽殖民地總督出任主席。 2. 柔佛 (Johore) 接受英人顧問指導政治。 3.12 英泰簽署第一次英暹協定，泰國割讓南部各邦，以借得建設泰南鐵路款項。 7.9 第二次英暹協定成立，泰國割讓吉蘭丹、吉打、丁加奴 (Terengganu) 與玻璃市 (Perlis) 給英國，以交換治外法權。 8. 英國將新取得的4州加上柔佛組成「馬來屬邦」，實施間接統治。 11.11 英國設置聯合參事會議，強化海峽殖民地總督的權限。
1910年	* 實施馬來人擔任行政官吏制度。 * 北婆羅洲 (沙巴) 所產橡膠首次輸出。 * 英國鄧洛普 (Dunlop) 公司至馬來西亞投資橡膠農園。 * 禁止製糖業以定期契約雇用印度外勞的「年季工作契約制度」。
1911年	* 馬來屬邦進行人口調查，結果共有住民 267 萬人。 * 布拉 (Haji Bula) 率馬來回教徒在北大年反抗泰國政府，但遭斃平。
1912年	* 北婆羅洲 (沙巴) 設置立法評議會。 * 錫礦山導入浚渫機，歐洲資本大量進入。 * 在中國國民黨新加坡支部資金援助下，華人開設中文學校。
1913年	* 沙勞越設置首座醫院。 * 沙巴設立森林局。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 公佈「馬來人保留地法」，禁止馬來人以外住民購買稻作土地，實施「保留地制度」。 * 12萬以上的印度勞工在本年內抵達，於橡膠農園工作。
1914年	* 禁止以苦力契約引入中國勞工移民。 * 爪哇人開始移民沙巴。
	5. 柔佛英人顧問被賦與類似理事官的權限。 10. 德艦恩典（Emden）號襲擊檳城（Penang）。
1915年	* 柯維（W. C. Cowie）辭去北婆羅洲公司總裁，由李奇威（Sir West Ridgeway）繼任。 * 沙巴發生安達嫩之亂（Antanum Rebellion）。 * 吉蘭丹發生叛亂，江固（To Janggut）攻佔巴希普第（Pasir Puteh），不久因其戰死而平息。 2. 沙巴的穆魯（Murut）族在蘭頓起事抗英，但於8周後投降。
1916年	* 因稻作地大量轉為橡膠園而爆發糧食危機，馬來屬邦的稻米自給率降至三分之一。 * 橡膠出口總值首次超越錫，成為最大宗輸出物資。 * 沙勞越國王查爾斯（Charles A. Brooke）將政權轉交給兒子維納（Vyner Brooke），退休返英。
1917年	* 強化實施1886年制定的「稻作地法」，禁止轉種其他作物。 * 沙巴撤廢橡膠免稅措施。 * 沙勞越布魯克王國皇太子維納正式登基。 * 在馬德拉薩設立近代伊斯蘭學校，教授英語、阿拉伯語、馬來語。 * 法人在雪蘭莪（Selangor）開辦首座商用油田。
1918年	* 稻田大量轉為橡膠園，造成嚴重食米不足。
1919年	* 丁加奴接受英人顧問。 * 北婆羅洲（沙巴）發生嚴重蝗災。 * 馬來屬邦的馬來人對進入英語學校意願不高，僅占9%。 * 丁加奴州廢除奴隸制度。
1920年	* 愛德華七世醫事學校升格為醫學院。 * 馬來行政學院入學基準從家世審查改為以成績判斷。
1921年	* 食米嚴重缺乏，三分之二以上依賴緬甸、泰國輸入。 * 沙巴開始政府支援的移民計畫。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 沙巴設立最早的公立小學。
1922年	* 英國在霹靂（Perak）州設立蘇丹・伊垂利師範學院（Sultan Idris Training College），以培養馬來人教員，其後對政府、社會貢獻極大。
	11. 為控制橡膠產量，成立橡膠栽植者協會（the Rubber Growers Association），由史蒂文生委員會（the Stevenson Committee）執行生產計劃。
1923年	* 吉打接受英人顧問。
1924年	* 蘇丹・伊垂利師範學校設置翻譯學院。
1925年	* 英國禁止中國國民黨在馬來亞活動。
1926年	* 李奇威辭任北婆羅洲公司總裁，由馬爾寇（N. Malcolm）接任。
	* 丁加奴州北部發生大洪水。
	* 星馬聯盟黨（The Singapore Malay Union Party）成立。
1927年	4.24 馬來屬邦聯合參事會議開始分權化。
1928年	* 馬來屬邦立法評議會首度設置印度人代表。
	* 丁加奴的卓曼（Haji Drahman）領導農民攻佔瓜拉布蘭（Kuala Brang），其後遭英國放逐。
1929年	* 因經濟大恐慌，錫礦華工轉入橡膠園工作。
	* 因經營不善和蟲害，沙巴撤廢煙葉農園。
1930年	* 限制華工移住。
	* 玻璃市接受英人顧問。
	4. 「馬來亞共產黨」（Malayan Communist Party, MCP）正式成立。
	7. 有26家歐洲錫礦公司倒閉。
1931年	* 設立「蘇丹農業專門學校」。
	* 開始逮捕馬來亞共產黨員。
	* 馬來亞華人因九一八事變而抵制日貨。
1932年	* 印度人鐵道勞工達 1 萬人，占馬來亞全體勞工的 78%。
	* 沙巴廢止契約移民制度。
	* 海峽殖民地的醫藥服務（The Straits Settlements Medical Service）開始適用亞裔勞工。
1933年	* 限制男性華工流入。
	* 北大年土王卡瑪汝丁去世，由其子繼位。
1934年	4.7 桑達拉在檳榔嶼組織「筆友同盟」。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 沙巴加入國際橡膠價格調整協定會。
	* 賈汀 (Douglas Jardine) 就任北婆羅洲長官。
	* 英宣布在兩年內建立 20 個軍用飛行基地。
1935年	* 共產國際派遣賴德 (Lai Teck) 前來指導馬來亞共產黨。
	* 賈汀進行行政改革，分沙巴為四縣，設立行政官會議。
1936年	* 在馬來亞共產黨指導下，雪蘭莪的巴都阿蘭 (Batu Arang) 煤礦華工發起罷工，要求成立蘇維埃共同體，但為軍警強制鎮壓。
	* 馬來人進入英語學校的比例增為15%。
1937年	* 馬印中央協會成立。
	* 麻六甲和檳榔嶼成立海峽馬來人聯盟。
	* 史密斯 (Charles Smith) 就任北婆羅洲長官。
	* 歐洲資本擁有礦山比例達三分之二。
	* 反英民族主義者雅柯博 (Ibrahim Haji Yaakob) 和伊薩克 (Ishak Haji Mohammad) 組成「馬來青年聯盟 (the Union of Malay Youth, KMM)」。
	* 華人因礦山機械化而轉業農工或移住都市，據政府統計有 70% 離開礦區。
	* 伊薩克反殖民小說「塔漢山王子 (Prince of Mt. Tahan)」出版。
1938年	* 印度政府禁止印度勞工移居馬來亞。
1939年	* 筆友同盟在柔佛召開「語言會議」。
	* 沙勞越維納國王冊立安東尼 (Anthony Brooke) 為皇太子，但不久遭罷黜。
	8. 第一屆泛馬來會議在吉隆坡召開，以團結對抗華人勢力。
1940年	* 馬來亞全境人口統計共有 550 萬人，華人口超過馬來人，達 236 萬人。
	12. 第二屆泛馬來會議在新加坡召開，沙勞越、汶萊代表亦出席。
1941年	9.24 維納國王公佈憲法，沙勞越成為立憲君主國。
	11.10 日本空軍在檳城外海擊沈英軍戰艦威爾斯王子號，發動東南亞戰爭。
	11.19 英國撤出檳城。
	11.25 日軍佔領沙勞越首府古晉。
	12.1 英國宣布馬來全境進入非常狀態。
	12.8 日軍在偷襲珍珠港前一個小時進攻馬來半島，登陸亞庇。
	12.25 英殖民政府要求華人組織義勇軍。
	12.31 英殖民政府組織馬來亞印度國民軍。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42 年	* 日本釋放因反英被捕的 KMM 馬來人幹部，將其組成義勇軍（PETA），以懷柔政策製造馬人、印人與華人的對立。 1.1 日軍佔領納敏島。 1.11 日軍佔領吉隆坡，英軍司令華維爾（Wavell）將軍投降。 1.15 日軍攻佔麻六甲（Malacca）。 1.31 日軍完全佔領馬來半島並實施軍政，重編行政區域，英、澳、印聯軍退至新加坡。 2.15 駐新加坡英軍宣布投降。 5. 日軍在馬來半島各地實施「敵性華僑嚴重處分」，恣意殺害數萬人。 6. 日軍解散KMM，並處罰未協助日軍者。 6. 馬來人、印度人與華人共組「馬來亞人民反日軍（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 MPAJA）」。 6. 日軍佔領沙巴、沙勞越和汶萊。 6.25 日軍向華人要求5,000萬美元獻金（占馬來亞流通貨幣的23%），但結果只籌集2,800萬美元，其餘則以向橫濱正金銀行借款（年息6%）方式奉納。 9.1 馬來亞共產黨和馬來亞人民反日軍的主要領導人在吉隆坡附近被日軍殺害。
1943 年	* 日軍於馬來亞設置「興亞研究所」。 2. 英政府開始檢討戰後馬來亞政策，並於年末提出馬來聯邦構想，分離華人與馬來人，以新加坡為英國遠東戰略基地。 5. 戴維斯上校潛入霹靂，號召當地華人組織反日游擊隊「一三六部隊」。 7. 日本軍政部於各州、各市開設參事會議。 8. 日本政府將玻璃市、吉打、吉蘭丹和丁加奴四邦割讓泰國。 10. 郭盆南（Albert Kwok）等襲擊亞庇，並一度加以佔領。 10.9 北婆羅洲發生華人反日暴動，至 12.19 方被鎮壓。
1944年	* 日本軍政鼓舞馬來民族主義，選擇以伊斯蘭復興運動取代以蘇丹為中心的舊秩序。 * 日軍將華人、歐亞混血及天主教徒入殖馬來亞，並建立開拓村以增加糧食生產，但他們後來多加入馬來亞人民反日軍（MPAJA）。 1.21 日軍處死 176 名參加北婆羅洲暴動者。 5. 李奉先因賴德密告而為日軍捕獲，6.29 死於獄中。
1945年	* 沙勞越王國重新策立安東尼為皇太子，就任沙勞越臨時政府代表。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6. 澳軍登陸婆羅洲納敏島，並於 7 月奪回汶萊沙巴和沙勞越。 7. KMM 領導人雅柯博結合馬來人組成半島印尼人民協會（KRIS），8.17 於吉隆坡召開大會，呼籲統一馬來亞與印尼，建立「大印度尼西亞」國家。 8.15 日軍宣布無條件投降，泰國歸還四邦領土。 8.21 馬來亞原住民發生排華暴動。 8.25 馬共呼籲成立民主政府。但英軍於9.5重返馬來亞，實施軍政。 10.10 英政府將馬麥克（Harold MacMichael）提案之「馬來聯盟」（Malay Union）計劃提交議會，要求9個馬來蘇丹交出主權，使馬來諸邦人民均能取得公民權，但引起馬來人反彈。 10.17 「馬來亞國民黨」（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 PKMM）成立，主要創黨人為波耶斯塔曼（Inche Ahmad Boestaman）。 11. 伊薩克·阿赫米（Burhanuddin Al-Hemy）成立馬來民族黨（Malay Nationalist Party, MNP）。 12. 1 英國要求 MPAJA 繳械但並不成功，數千名成員其後於 1948 年展開反英武裝鬥爭。 12.16 阿巴丁（Ismail bin Ezinal Abadin）在英國支援下，取代日本任命的丁加奴蘇丹。 12.23 馬來亞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 MDU，簡稱民盟）於新加坡成立，以英語教育背景之知識份子為主要成員。
1946年	* 森美蘭（Negri Sembilan）成立最初的橡膠農園工會。 1. 馬來亞共產黨（MCP）帶領勞工總同盟（General Labour Unions），要求訂 2.5 為抗日運動開始紀念日。 1.3 拿督翁（Datuk Onn Jafar）等人召開泛馬來會議，以推行半島馬來運動，思謀對抗英國的「馬來聯邦」計劃。 1.26 英國開始審判日本戰犯和協助日軍者。 3. 拿督翁等成立「全國巫人統一機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簡稱巫統），反對「馬來聯邦」成立。 4.1 英國將馬來各邦及新加坡由軍政改為民政。 7.1 維納國王因無力從事戰後復興，與英國簽訂協定，沙勞越再度成為英王直轄領土，布魯克白人王國結束。 7.15 英國政府收購北婆羅洲公司，將沙巴編入王領殖民地，並將首府由山打根（Sandakan）遷至亞庇。 8. 麻六甲華人公會成立。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8. 馬來亞印度國大黨（Malayan Indian Congress, MIC, 簡稱國大黨）成立，獨立後改稱「馬來西亞印度國大黨」，代表印度南部出身的下層勞動者移民利益。
1947年	10. 馬麥克爵士奉命與各邦蘇丹交涉締約與制定新憲法事宜。 2. 吉打州發生橡膠園罷工運動，英國其後採取嚴厲措施。 3. 擔憂因協助英日而受審，馬共總書記賴德捲款潛逃，其後由陳平（Chen Peng）繼任總書記。 7.24 英政府通過「馬來聯邦憲法」。
	10.20 中共控制之工會組織領導罷工，華人團體亦發起全國大罷市，以威脅馬來聯邦的成立。
1948年	* 錫礦引進歐洲機械，生產恢復戰前水平，但礦工因而失業。 2.1 英國修正馬來聯邦計劃，強化馬來人的政治權利，將馬來屬邦及麻六甲、檳榔嶼合併成立「馬來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a）。 2.5 英國以麥克唐納（Malcolm McDonald）為首任馬來亞聯邦高級參事官，並公佈非馬來人不易取得公民權的「聯邦協定」。 2.24 馬來亞聯邦立法會議正式在吉隆坡成立，全體共75名議員。 3.14 泛馬最高宗教理事會（Majlis Agama Tertinggi Sa-Malaya）宣布成立清真黨（Hizbul Muslimin），以建立回教國為宗旨。 5.31 馬來亞聯邦立法會議決議廢除「泛馬來貿易同盟」。 6.16 陳平領導的馬共開始進行武裝反政府鬥爭，殖民地政府宣布馬來亞全境進入非常狀態。 6.17 因馬國宣布緊急狀態，清真黨重要領導人（含黨魁阿巴吉 Abu Bakar Al-Baqir）紛紛被捕。 6.23 民盟（MDU）因緊急命令宣告解散，部分成員轉入地下參與馬共活動。 9.3 葛尼（Henry Gurney）接任馬來亞聯邦高級參事官。 12.7 檳城與威勒斯雷（Wellesley）省成立委員會準備退出馬來亞聯邦，重新成為王領殖民地。
1949年	1.13 英軍在吉打北部遇襲，傷亡頗重。 2.10 檳城與威勒斯雷脫離聯邦的計劃遭否決。 2.27 陳禎祿（Tan Cheng Lok）成立「馬來亞華人公會」（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 簡稱馬華），獨立後改名「馬來西亞華人公會」。 12.3 沙勞越州長官史都華（Duncan Stewart）被獨立派暗殺。 12.12 馬共在森美蘭襲殺英軍和馬來人巡警。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50年	* 廢止印度與馬來亞間歷來免護照（No Visa）的自由往來方式。 * 英國准許各州地方議會實施直接選舉。 4. 殖民政府實施「布里格計劃」（Briggs Plan），強制將約50萬散居郊外之華人遷居「新村」，以期斷絕馬共糧食來源。 4.19 馬來亞聯邦立法議會通過新國旗決議。 10. 馬來亞共產黨與殖民政府的對立達到高峰，其組織與工會運動被視為非法，許多幹部被捕或遣返中國。
1951年	6. 為參加年底檳城喬治市選舉而成立「急進黨」（Radical Party），林蒼佑（Lin Chong Eu）為主要領導人。 8. 拿督翁退出巫統，由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成為巫統領導人。 9.16 拿督翁組織「馬來亞獨立黨」（Independence of Malaya Party, IMP，簡稱獨立黨）。 10.6 英國馬來西亞高級參事官葛尼被馬共於吉隆坡郊外襲殺。 11.24 泛馬回教徒協會（Persatuan Ulama Sa-Malaya）改組為泛馬回教黨（Persatuan Islam Sa-Malaya/Sa-Tanah Melayu, PAS，簡稱回教黨），以建立回教國為目標。 12.1 檳城喬治市舉行市議員選舉，為馬來亞地區最早的選舉。
1952年	* 修改憲法，賦與華人更多公民權。 1.8 巫統與馬華公會首次宣布合作，在2月的吉隆坡市議會選舉中，獲得輝煌勝利。 2.7 英國高級參事官兼馬來亞聯邦軍總司令鄧普勒（Gerald Templer）到任，他結合軍事與社會經濟計畫，使馬共至1954年已不成威脅。 6.10 廓爾喀（Gurkha）軍團在北霹靂殺死6名馬共高級將領。 8.9 因沙勞越—印尼人民解放軍攻擊警署，沙勞越首府古晉宣布戒嚴。
1953年	1.16 沙勞越解除緊急狀態。 3.1 MCA、UMNO、MIC召開馬來亞聯邦政黨會議，主張循和平、合法與立憲方式，要求成立自治政府。 3.5 東姑阿都拉曼要求英國於翌年選舉馬來國會，以取代非民選的聯邦立法會議。 3.19 9個邦的州務大臣聯合提案召開國民會議，但東姑阿都拉曼反對。 10.4 甘旦（Datuk Panglima Bukit Gantang）成立「霹靂國民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erak）」
1954年	* 以印度人勞工為中心的「全國農園工會」成立，橡膠農工待遇改善。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2. 「國家黨」(Party Negara) 創立，主導人物為拿督翁。
	6.5 「馬來亞勞工黨」(Labour Party of Malaya, 簡稱勞工黨) 成立，後於1957年與人民黨合組馬來亞人民社會主義陣線 (Malayan People's Socialist Front, 簡稱社陣)。
	10. 為參與大選，UMNO、MCA與MIC合組「聯盟黨」(the Alliance Party)，由東姑阿都拉曼擔任主席，確立主要三大民族的協調體制。
	11.21 李光耀與杜進才等成立人民行動黨 (People's Action Party)，新馬分家後留在馬來西亞的組織易名為「民主行動黨」。
1955年	* 馬共的武力威脅幾乎絕蹤，但餘黨仍在泰馬邊境殘存至八0年代後期。
	* 回教勢力較強的吉蘭丹政團宣布脫離UMNO，成立「馬來亞伊斯蘭黨」(PAS)。
	6.24 政府宣布放棄與馬共進行和平對話。
	7.27 馬來亞立法議會舉行大選，「聯盟黨」得票率81%大勝，取得全部52席中的51席，並準備制定獨立憲法，東姑阿都拉曼就任首席長官。
	8. 拉曼首席長官率各州領袖與英國樞密院討論獨立後的英馬關係。
	11.11 波耶斯塔曼、伊薩克、阿赫米成立「馬來亞人民黨」(Parti Rakyat Malaya, 簡稱人民黨)
	12.28 馬共總書記陳平與拉曼首席長官、新加坡首席長官馬歇爾 (Darid Marshall) 舉行「華玲 (Baling) 會議」，但因拉曼堅持解散馬共，使得和談未果。
1956年	* 為解決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創造國民國家兩大課題，進行首次五年經濟計畫。
	1.18 英馬在倫敦舉行會談，拉曼堅持於1957.8獨立，英國最後勉強接受。
	3.15 「人民進步黨」(People's Progressive Party, PPP) 成立，創黨人為淡米爾裔的西尼瓦沙甘兄弟 (S. P.和D. R. Seenivasagam)。
	5.8 拉曼赴倫敦交涉獨立事宜，英國允可於1957. 8.31授予獨立地位。
	5.16 殖民政府任命以瑞德 (Lord Reid) 為首，組織憲法委員會。
	10.24 陳期嶽成立「馬來亞黨」(Malayan Party)。
1957年	* 禁止華人移民，但同時實施「公民權利法」
	8.5 英馬簽署協定，結束英國83年間接統治。
	8.31 馬來亞聯邦完全獨立，制定憲法，成為大英國協中的獨立國。
	8.31 勞工黨與人民黨合組「社陣」。
	8.31 憲法規定10年後以馬來語為唯一官用語。
	9.2 森美蘭蘇丹阿都拉曼 (Abdul Rahman) 被推舉為聯邦國王。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58年	9.17 馬來亞聯邦成為聯合國第82個會員國。 3.10 馬來亞聯邦成為IMF和世界銀行的第65個會員國。 4. MCP主要領導人之一的霍龍（Hor Lung）向馬政府投降。 5.7 被承認為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第73個會員國。 8.26 馬國政府與澳洲簽訂貿易協定，是為獨立以來第一個條約。
1959年	* 設立中央銀行（Bank Negara Malaysia）。 1. 拉曼首相訪菲，與賈西亞總統討論東南亞友好經濟條約事宜。 2.9 拉曼為專心巫統黨務而辭去首相，由拉薩克（Tun Haji Abdul Razak）於4.16繼任。 5.8 柔佛蘇丹伊布拉希姆（Isbrahim）逝世，其子艾斯梅（Tuanku Ismail Nasiruddin Shah）繼位。 6.1 以華裔為主要成員的「沙勞越人民聯合黨」（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 SUPP）成立。 8.19 舉行獨立後第一次大選，聯盟黨贏得104席中的73席，獨立黨13席，社陣8席，人民進步黨4席。8.22東姑阿都拉曼組成內閣。
1960年	4.4 雪蘭莪州的希沙穆汀（Hisamuddin Alam Shah）蘇丹被選為馬來亞聯邦國王。 4.30 達圖（Datu Bandar Abang Mustapha）組織沙勞越國家黨（Party Negara Sarawak, PANAS）。 7.31 馬共游擊隊大部投降，解除針對共產主義活動的非常緊急狀態。
1961年	* 英國宣布第二個「馬來亞計劃」。 1.4 因舊王逝世，霹靂州的普它（Putra Almarhum Syed Hassam Jamalullal）蘇丹被選為馬來亞聯邦國王。 3.31 甯亢（Stephen Kalong Ningkan）組織「沙勞越國民黨」（Sarawak National Party, SNAP）。 5.27 拉曼首相宣布結合新加坡、沙勞越、沙巴和汶萊的馬來西亞聯邦構想。 6.1 馬共領導人雅哥（Al Khor）在霹靂州北部遭政府軍擊斃。 8.3 馬、菲與泰三國在曼谷宣布組織「東南亞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SA）。 8.5 沙巴的史蒂文斯（Donald Stephens）成立全國卡達山聯合組織（United National Kadazan Organization, UNKO）。 11. 英馬成立調查委員會，確認沙勞越與沙巴加入馬來西亞聯邦意願。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2.20 雅庫（R. Yakub）與馬穆（T. Mahmud）領導成立沙勞越土著陣線（Barisan Rakyat Jati Sarawak, BARJASA）。
	12.23 穆斯達發（Mustapha bin Datu Harun）成立「沙巴國民統一組織」（United Sabah National Organization, USNO）。
1962年	1. 沙巴成立「巴索黨」（Parti Pasok Momogun, PPM）成立。
	3.12 英文「馬來亞時報Malayan Times」創刊。
	4.21 「民主聯合黨」（United Democratic Party）成立，創黨人爲林蒼佑。
	6. 菲律賓主張對北婆羅洲（沙巴）的主權。
	7. 以詩巫福州人及古晉潮州人爲主要成員組成沙勞越華人公會（Sarawak Chinese Association, SCA）。
	7.31 英國同意建立大馬來亞聯邦，準備放棄沙勞越和北婆羅洲（沙巴）主權。
	8. 柔加（Temenggong Jugah）主導成立「沙勞越保守黨」（Party Pesaka Anak Sarawak）。
	9.12 北婆羅洲（沙巴）議會決議加入馬來西亞聯邦。
	11.29 沙勞越的聯盟黨成立。
	12. 印尼蘇卡諾總統表示馬來西亞聯邦構想爲英國的新殖民地主義陰謀，主張粉碎馬來西亞和打倒英國帝國主義。
1963年	* 北婆羅洲（沙巴）、沙勞越規定10年後（1973年）以馬來語爲唯一官用語。
	1. 印尼宣布支援汶萊進行獨立鬥爭。
	2.13 因違反「國家內部安全法」，人民黨黨魁波耶斯塔曼被捕。
	4.20 沙勞越政府公佈，中國在沙勞越協助發動武裝叛變，並建立若干叢林訓練營。
	5.31 印尼蘇卡諾總統、菲國麥嘉柏皐總統與拉曼首相在東京舉行高峰會談，因菲國主張對北婆羅洲（沙巴）的主權，未達成任何協議。
	6 沙勞越舉行立法議會選舉，親聯邦政黨獲勝。
	6.10 各方於吉隆坡舉行會談，討論有關汶萊加入聯邦問題。
	7.9 英國、馬來亞、新加坡、沙勞越和北婆羅洲（沙巴）締結倫敦協定，決定8.31組成聯邦。
	7.14 伊薩克組織「國民議會黨」（Parti Perhimpunan Kebangsaan）。
	7.30 印尼、菲律賓和馬來亞聯邦召開三國協議，於8.5發表馬來亞宣言與馬來亞協定。
	8.1 沙勞越、北婆羅洲大選中，親「聯盟黨」派大獲全勝，決定加入馬來西亞聯邦，北婆羅洲正式改稱「沙巴」。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8.16 聯合國調查團抵達古晉，準備調查沙勞越、沙巴住民加入馬來西亞聯邦的意願。 8.14 英國國會投票表決贊成倫敦協定。 9.4 沙勞越立法議會投票表決贊成倫敦協定。 9.16 沙勞越州長由歐賓（Datu Abang Openg）出任，州務大臣為甯亢；沙巴州長為穆斯達發，史蒂文斯任州務大臣。 9.16 不顧印尼、菲律賓的反對，馬來亞聯邦與新加坡、沙勞越和沙巴公佈馬來西亞憲法，成立馬來西亞聯邦。 9.17 馬來西亞宣布與菲律賓、印尼斷交。 11.3 馬來西亞聯邦國會首次召開，選舉拉曼擔任首相。 12.18 英國飛機在沙勞越邊境遭印尼軍擊落。 12.29 印尼軍襲擊沙巴的塔灣（Tawan）軍營，殺害8名馬國士兵。
1964年	1.6 英國及馬來西亞發表聯合聲明，共同抵抗印尼入侵。 2. 「馬真達黨」（Parti Machinda）成立。 4.25 西馬舉行國會選舉，「聯盟黨」獲得大勝，贏得104席中的89席。 6. 沙巴的史蒂文斯將PPM和UNKO兩黨合併組成「巴索－卡達山聯合組織」（United Pasok-Momogun Kadazan Organization，UPKO）。 7.22 美國答應支援馬來西亞聯邦。 8.17 印尼軍隊登陸柔佛，9.3大馬政府宣布全境進入非常狀態，並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控訴。 11. 沙勞越爆發反馬來西亞運動。
1965年	1.2 英國派兵至沙勞越、沙巴，穩定情勢。 1.7 馬來西亞獲選聯合國安理會理事國。 4. 史蒂文斯辭任沙巴州務大臣，轉任聯邦大臣，由羅彼得（Peter Lo）任沙巴州務大臣。 4.17 拉曼將馬來亞、新加坡、沙巴和沙勞越四個分離的聯盟黨合併，組成「馬來西亞聯盟黨」（Malaysian Alliance Party）。 5.30 印尼軍登陸馬來半島，展開兩周的激戰，終被擊退。 8.1 馬來西亞參眾兩院通過新加坡分離獨立決議 8.7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簽署獨立協定，於8.9正式宣布脫離馬來西亞獨立。 9.21 納希魯汀（Ismail Nasiruddin Shah）蘇丹成為聯邦新國王。 10. 沙巴史蒂文斯辭任聯邦大臣，由州長穆斯達發繼任該職。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66年	* 制訂第一期五年計畫，推動進口替代工業。 3.11 華人因MCA不再保障自己利益，另組「民主行動黨」（Democratic Action Party，DAP）。 6.1 馬來西亞與印尼在曼谷協商兩國關係正常化，6.5印尼宣布結束兩國武裝衝突。 6.3 馬來西亞與菲律賓恢復中斷3年的外交關係。 6.12 沙勞越州長歐賓解任州務大臣甯亢，於6.17改命史利（Penghulu Tawi Sli）繼任。7.8甯亢向高院主張其解職違憲。 8.3 英國自沙勞越、沙巴撤兵。 8.11 印馬兩國於雅加達簽訂和平條約，正式結束戰爭狀態。 9.7 沙勞越高院判決甯亢勝訴，翌日甯亢復職，但歐賓一派不服。 9.14 因州政府及憲法危機，沙勞越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州軍全歸聯邦政府統轄。 9.23 沙勞越議會投票正式解除甯亢州務大臣職務，翌日由史利接任。 10.30 詹森總統來訪，吉隆坡發生反美遊行示威。
1967年	* USNO與SCA組織沙巴聯合政權，穆斯達發任州務大臣。 * 國營通訊社成立。 1.11 英軍完全撤出東馬。 3.4 大馬國會通過國語法案，並規定於8.1生效，馬來語成為唯一的官用語，但英語至1969.5暴動為止仍廣被使用。 4.3 與蘇聯建立外交關係，並簽訂貿易協定。 8.8 與印、泰、新、菲共同創設東協（ASEAN）。 8.10 副首相拉薩克訪問印尼，8.11簽署和平協定。 8.30 與印尼全面恢復邦交，互換大使。 9.21 日本與新加坡、馬來西亞兩國簽訂「血債協定」，以解決戰後賠償問題之糾紛。
1968年	* 英國宣布將於1971年關閉所有蘇伊士運河以東的軍事基地。 1. 內政部長伊斯梅爾（Tun Ismail）提出東南亞區域中立化構想。 3.4 馬來西亞拉曼首相訪問印尼。 3. 林蒼佑、陳志勤（Tan Chee Khoo）、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和王齋伍等成立「馬來西亞人民運動黨」（Gerakan Rakyat Malaysia，GRM）。 5. 橡膠價格暴跌，實施「獎勵投資法」，謀求引進外資。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6.17 泰馬邊境共黨游擊隊攻擊警備隊，殺害16人 7.16 菲律賓與馬來西亞之沙巴歸屬問題談判破裂，9.18菲律賓馬可仕總統簽署沙巴合併法案，9.20馬國宣布與菲律賓斷交。 8. 為解決沙巴問題，史蒂文斯奉派出任駐澳洲大使。 11.19 馬來西亞開始大舉逮捕境內共產黨員。 12.3 工黨議員集體辭職，轉為院外鬥爭。 12.7 政府宣布成立馬來亞國際船運公司。
1969年	* 橡膠與錫礦的輸出比例降至59%，椰油輸出大幅增加。 1. 副首相拉薩克發佈促進馬來人參與經濟活動的「新經濟政策」及以馬來語授課的「新教育政策」。 2.10 英國軍隊開始自西馬撤離。 5.22 英語正式被廢除其官用語地位。 5.10 馬來半島舉行大選，聯盟黨減少23席（僅得66席，UMNO51席、MCA13席、MIC2席），民主行動黨（13席）、民政黨及人民進步黨等華人政黨共獲26席，因而引發馬來人的民族情緒。 5.12 因聯盟黨在大選中失利，吉隆坡發生種族暴動，170人被殺，拉曼首相翌日宣布進入緊急狀態，5.15暴動擴大至全國各地。 5.17 拉曼首相停止國會開議，改設國家行動理事會（National Operation Council，NOC），以副總理拉薩克為主席。 5.21 拉曼首相重組內閣，並任命瑪姬（Haji Abdal Majid）出任社會福利部長，是為第一位女性閣員。 5.29 設置全國親善委員會（NGC），東姑阿都拉曼首相自任主席。 7.12 為保住UMNO領導權，拉曼宣布停止激進派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黨權。 7.17 約千名馬來亞大學學生（以馬來人為中心）進行示威，要求拉曼下臺。 8.4 在泰馬邊境設置華人居住的「新村」。 12.16 馬來西亞拒絕菲律賓所提將沙巴問題訴諸國際法院的主張。
1970年	* 馬哈迪著「馬來人的困境」一書（The Malay Dilemma），反對拉曼首相的民族融和政策，被政府查禁（1981年解禁）。 1.27 國家行動理事會（NOC）成立國家顧問委員會，以商討國家統合問題，但民主行動黨和社會黨加以抵制。 1.6 首座由馬來人經營的錫礦山設立。 2. 馬國宣布解除吉隆坡地區之非常緊急狀態。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3.7 泰馬兩國於曼谷簽訂軍事合作協定，共同圍剿轉入泰馬邊境山區進行武裝鬥爭的馬共，使其因遭兩國軍隊合剿而弱化。 6.6 沙巴和沙勞越重新舉行因1969年國家緊急狀態而延期的聯邦議會大選，聯盟黨贏得40席中的23席。 6.27 沙巴州議會選舉，聯盟黨獨佔全部議席。 8. NOC發佈稱為「敏感問題法」的緊急命令，禁止公開討論馬來人及蘇丹特殊地位問題。 8. 拉曼首相頒佈「國家意識」五原則，包括信奉上蒼、忠於君國、維護憲法、遵從法治、培養德行。 8.30 拉曼宣布辭職，拉薩克於9.23繼任組閣，任命伊斯梅爾為副首相，胡先翁為教育部長。 9.21 吉打蘇丹哈里姆（Abdul Halim）被選為聯邦國王。 12. 沙勞越人民聯合黨（SUPP）與「聯盟黨」合作，雅可夫任沙勞越州務大臣。
1971年	1. 大雨造成數州出現大洪水。 2. 國會通過憲法修正案和「煽動法」，禁止公眾討論有關種族的議題。 2.9 馬來西亞政府為縮小所得差距，採用優惠馬裔國民政策的第二期五年計畫。 2.10 落實「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採取出口導向工業化政策；制訂「自由貿易區法」（Free Trade Zone）。 2.20 政府宣布解散「國家行動理事會」（NOC），恢復議會政治。 4.15 與新加坡、汶萊、澳、紐、英於倫敦開會，討論區域安全問題。 6. 安全部隊與馬共在霹靂州怡保發生武裝衝突。 8. 1500名政府軍在沙勞越圍剿叛軍，將其殲滅。 8.26 與中國簽訂直接貿易協定。 10.21 對中國製品改採輸入許可制。 11.1 英澳紐新馬成立五國共同防衛體制。 11.16 馬來西亞與印尼共同宣布麻六甲海峽為領海而非國際水路。 11.27 拉薩克首相在東協會議提出東南亞和平、自由中立區（Zone of Peace, Free and Neutral, ZOPFAN）構想。
1972年	2. 聯盟黨和馬來西亞人民運動黨（GRM）合作。 3. 政府軍於霹靂、吉打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 3.22 新加坡李光耀於獨立後首次訪問馬來西亞。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4.6 馬來西亞和印尼簽訂安全協定，設立永久性部長級邊界委員會，7.24召開首次會議。 5.1 聯盟黨宣布與人民進步黨（PPP）合作。 8.6 拉薩克首相宣布展開「革新運動」。 9.2 馬華公會宣布展開「華人精神革命運動」。 9.5 拉薩克宣布聯盟黨與泛馬來伊斯蘭黨（PAS）合作，並於翌年初成立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NF，簡稱國陣），在野黨只「民主行動黨」（DAP）。 10.1 新馬航空正式分裂成新航與馬航。
1973年	* 改信回教的史蒂文斯（更名Mohammad Fuad）自澳洲返國任沙巴州長。 1.4 聯盟黨和伊斯蘭黨（PI，其前身為PMIP）在吉蘭丹和丁加奴合組聯合政府。 1.24 五個州級反對黨（DAP、Pekemas、社會正義黨、Parti Marhaen、沙勞越國民黨SNP和聯合沙巴行動黨VSAP）合組在野聯盟，由林吉祥（Lim Kit Siang）擔任主席。 3. 馬國政府宣布限制對叛軍地區進行食品、服裝、藥品等貿易和流動。 3.12 馬來西亞宣布退出亞太理事會。 3.30 馬國成為第一個承認北越的東南亞國家，雙方並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4. 參眾兩院通過法案，將吉隆坡升格為聯邦直轄領土。 5.10 馬來西亞宣布停止馬幣與新幣的等價兌換，股市交易亦分別進行；設立開發銀行。 6. 「開發黨」（Parti Bumiputera）合併「和平黨」（Parti Pesaka）成為「和平開發黨」（Parti Pesaka-Bumiputera Bersatu）。 6.3 馬來西亞宣布採用浮動匯率制度。 6.28 連任18年的沙班薩（T. V. Sambanthan）從MIC主席退職，由斯瑞（Sri Manickavasagam）繼任 8.13 胡先翁（Hussein Onn）被任命為副首相。 9. 李三春（Lee San Choon）再次當選為MCA主席。 9.25 沙巴議會通過州憲法修正案，指定馬來語為唯一國語。 10.21 沙勞越叛軍與政府協議，放棄武裝叛亂。
1974年	* 沙勞越立法規定英語的官用語地位至1980年為止。 1. 日本田中角榮首相訪馬，引發反日示威。 2.1 吉隆坡正式成為聯邦成員，並擁有5個國會議席。 5.31 拉薩克訪問中國，並宣布與中國建交。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7.25 公佈「石油開發法」，並依此法成立馬來亞國營石油公司（PETRONAS）。
	8.24 國會大選，國陣獲得壓倒性勝利，取得154席中的135席，並控制所有13個邦的地方議會
	12.3 因橡膠價格暴跌，農民上街訴求救濟，吉隆坡學生發動大規模示威加以支援。
1975年	* 制定「工業調整法」，嚴格規定企業內的民族雇用比例，引發華人不滿。 4. 修改「大學教育法」，禁止學生參與政治運動。 6. 拉薩克與胡先翁被分別選為UMNO主席、副主席。 7. 變更通貨名稱，馬元改稱零吉（Ringitt）。 7.15 沙巴人民團結黨（Bersatu Rakyat Jelata Sabah Party，BPJSP）成立，創黨主席為USNO的沙雷（Datuk Harris Salleh）。 8.4 日本赤軍攻佔吉隆坡美國大使館，劫持50名人質。 9.21 吉打蘇丹貝特拉（Tuanku Yahya Petra）獲選為新國王。 10.20 泰國與馬來西亞就邊界共黨游擊隊問題達成協議，雙方決定加強剿共。 10.31 史蒂文斯辭任沙巴州長，由柏加雅（Berjaya）黨魁繼任，州務大臣穆斯達發亦辭任。
1976年	1.15 拉薩克於倫敦逝世，胡先翁就任首相。 2.1 胡先翁首相以拉沙雷（Hamzah Razaleigh）為財相，制訂第三期五年計畫，採行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雙軌型工業化策略。 2.23 第一屆東協高峰會議召開，會後締結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 3. 沙巴州議會大選，與巫統合作的人民團結黨擊敗企圖獨立的穆斯達發派，史蒂文斯任沙巴州務大臣。。 3.4 泰國與馬來西亞於曼谷簽訂新國界協定，調整對邊境游擊隊聯合作戰方針。 3.5 內閣改組，馬哈迪升任教育部長兼副總理。 3.18 雪蘭莪州務大臣伊垂斯（Harun Idris），被逐出巫統，他原先擔任巫統青年部部長。 4. 沙勞越州議會大選，與國陣合作的沙勞越國民黨（SNAP）取得全部議席，與PBB、SUPP合組沙勞越執政聯盟。 5.18 伊垂斯以貪汙罪嫌被判刑2年。 6.6 史蒂文斯飛機失事，由沙雷繼任州務大臣。 10.19 伊垂斯重新加入巫統。 11.3 6位國會議員（包括兩位次長）因違反「國家安全法」被捕。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77年	1. 伊垂斯因偽證罪被判刑6個月，在12月的公聽會後，刑期更延長為4年。 3.4 馬泰修訂邊境協定，允許雙方警察及軍隊對共產黨有越境追擊權。 3.26 為解決摩洛民族解放戰線問題，菲律賓馬可仕宣布放棄沙巴主權，兩國領有權紛爭結束。 10.15 吉蘭丹州議會通過對奈錫爾（Mohamed Nasir）州務大臣的不信任案，引發衝突。 10.19 PAS因在吉蘭丹問題與巫統對立，正式脫離「國陣」而成為在野黨。 11.18 吉蘭丹州宣布戒嚴（1978.2.12解除）。 12. 「泛馬來回教黨」（Pan-Malayan Islamic Party，PMIP）亦脫離「國陣」。 12.4 日本赤軍劫持馬航客機，造成百名乘客死亡。
1978年	* 成立原住民投資基金，資本額為2億馬元。 3.11 吉蘭丹大選，伊斯蘭黨（PI）僅得兩席。 5. 因華人要求設立私立中文大學引發爭議，馬來西亞宣布提前舉行大選。 6. 中國鄧小平副總理訪問馬來西亞。 7.8 馬來西亞大選，執政之「國陣」獲得壓倒性勝利。民主行動黨（DAP）雖獲16席，但PAS僅得5席，其餘皆由「國陣」取得。 8. 為阻止馬華公會慶祝成立30周年活動，政府下令禁止一切公共集會。 9. 胡先翁再次當選巫統主席，馬哈迪為代理主席，拉沙雷、巴巴（Abdul Ghafar Baba）和穆薩希坦（Musa Hitam）三名為副主席。
1979年	* 「伊斯蘭青年運動」批判新經濟政策，主張自組自給自足的共同體。 2. 英國提高外國學生費用，且減少獎學金，使英馬關係惡化。 3.29 貝特拉國王急逝，檳榔嶼蘇丹阿瑪德（Ahmad Shah）代理，並於4.26被選為第七任國王。 4. 胡先翁訪問中國。 6. 馬國政府宣布已收容75,000名越南難民。 7. 受伊朗革命影響，回教展開布教活動。 8.29 因國家安全法規定可不經審判即逮捕異議人士，國際特赦組織（AI）要求馬國廢除該法，但政府禁止此消息流入國內。 11. 李三春再次擊敗陳麥克（Michael Chen），連任MCA主席，陳麥克被解除所有職務。
1980年	1. 吉打省會庫達特（Kudat）農民要求調升米價，於示威時與警察發生衝突。 3. 丁加奴附近發現大型天然氣油田。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3.26 胡先翁首相與印尼蘇哈托總統發表「關丹宣言」，表示尊重越南在柬埔寨的安全利益。
	5.12 胡先翁與新加坡李光耀總理發表聯合聲明，同意設立政府間委員會，以解決雙邊問題。
	10.16 回教狂熱支持者在柔佛州的巴杜帕哈（Batu Pahat）襲擊警署。
1981年	* 馬哈迪推動「新經濟政策」，制定第四期五年計劃。
	1. 馬共主席穆沙（Ahmad Musa）退黨，從中國返回馬來西亞。
	2.7 胡先翁在英國接受冠狀動脈手術成功。
	3. 雅可夫以健康理由辭任沙勞越州務大臣，其外甥泰普（Taipu Mohamad）繼任。
	4. 中國趙紫陽總理來訪，試圖緩解兩國因馬共造成的緊張關係。
	5.15 胡先翁宣布停職養病。
	6.26 馬哈迪成為巫統（UMNO）領導人，穆沙希坦為代理主席，服刑中的伊垂斯當選副主席。
	7.15 胡先翁正式宣布辭職，翌日馬哈迪升任首相，以穆沙希坦為副首相。
	7.30 馬政府釋放21名政治犯，包括1976年逮捕的國會議員，並將馬哈迪著書解禁。
	8. 伊垂斯在宣誓忠誠後獲釋。
	8.21 馬來西亞政府給予「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駐吉隆坡代表大使級地位。
	9.3 馬哈迪首相拒絕出席大英國協高峰會議。
	10.2 馬哈迪首次發表「向東學習」（Look East）政策，並提出「最後才買英國貨」運動。
	10.8 馬哈迪首相就柬埔寨問題訪問新加坡。
1982年	* 政府禁止戶外公共集會，僅限受邀者參加的戶內集會亦須向警察報准。
	2.25 馬國與印尼共同簽署「海事條約」（Maritime Treaty），馬國政府宣布承認印尼的「群島水域主權原則」與專屬經濟區。
	4. 森美蘭州議會議長塔里布（Abdul Talib）遭暗殺，文化、青年、體育部長哈辛姆（Mokhtar Hashim）被指控涉案，於1983.4執行死刑。
	4.22 馬來西亞舉行大選，國陣獲勝，馬哈迪政權基盤築固。
	5.28 馬哈迪指示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節減經費。
1983年	* 沙巴州的納敏島移交聯邦自治區管轄，1984.4.16正式生效。
	1.23 馬哈迪首相訪問日本，討論「向東學習」政策及加強雙邊關係。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2.24 穆達 (Mohamed Muda) 辭去PMIP主席職位，其後成立穆斯林陣線 (Muslimin Front)。 2.25 馬哈迪首相發表「馬來西亞公司」構想。 3.12 馬哈迪非正式訪問英國，雙方關係改善。 3.23 「哈民黨」(Hizbul Muslimin, HAMIN) 成立，創黨人為阿斯利 (Mohamad Asri)。 5.9 日本中曾根首相訪問馬國，與馬哈迪討論雙邊貿易、文化合作及國際形勢等問題。 7. 政府提案修憲排除國王及蘇丹的政治特權，引起各州蘇丹反彈。 8.1 馬哈迪首相不顧各州蘇丹反對，向議會提出「1983年憲法修正案」。8.30 獲兩院通過。 8.9 馬來西亞與泰國協議設立「聯合發展局」，以開採暹羅灣重疊海域海床的石油資源。 11.14 馬印邊境委員會在吉隆坡集會，雙方同意進一步加強在軍事與安保之合作關係。 12.15 政府就憲法修正案與各州蘇丹達成協定。
1984年	2.9 柔佛州蘇丹伊斯坎達 (Mahmood Iskandar) 選為第八任國王。 2.25 國陣將反對納敏島移管的USNO除名，拜林 (Datuk Joseph Pairin Kitingan) 宣布脫黨。 2.27 中國吳學謙外交部長訪問馬來西亞，表示中國不再以物資協助馬共。 4.6 為使人口增至7000萬，馬哈迪修改勞工法令，將女性雇員有薪產假增加到五次。 4.16 納敏島正式從沙巴分離，成為聯邦直轄領土。 7.24 巴解領袖阿拉法特訪問馬來西亞。 8.28 馬哈迪激烈批判日幣低估，導致東南亞發展不易。 11.8 國王要求停止巫統與伊斯蘭黨的電視討論會。 12.3 馬國與印尼簽訂相互保障協定。 12.27 「大馬回教青年運動」向蘇聯大使館遞交抗議書，要求蘇聯立刻從阿富汗撤軍。
1985年	* 馬國宣布斥資1,800萬美元，沿馬泰邊境修築16呎高的水泥牆，以防馬共滲透。 3.5 「沙巴團結黨」(Parti Bersatu Sabah, PBS) 成立，創黨主席為拜林。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4. 英國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訪問馬國，但未能緩和馬哈迪的反英態度。 4. 沙巴州議會大選，拜林的沙巴團結黨獲勝，自任州務大臣，但拒絕加入國陣。 7.20 自製國民車開始商業生產。 10.25 吉隆坡錫交易所停止交易（1986.2.3恢復）。 11.19 吉打州發生伊斯蘭教師被捕事件，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與警察發生衝突，造成18人死亡。 11.20 馬哈迪首相訪問中國，雙方簽署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11.24 陳崑山（Tan Koon Suan）當選MCA主席。
1986年	2. 完成中長期工業基本計畫。 2.27 因批判馬哈迪獨裁作風，副首相穆沙希坦辭職。5.7巴巴被選為副首相。 5. 制訂「促進投資法」，放寬對外資的管制。 5.3 沙巴首府亞庇、山打根（Sandakan）等地發生爆炸案，PBS拒與馬哈迪合作，拜林仍任州務大臣，柏加雅脫離國陣。 6.5 沙巴州議會重選，PBS再獲大勝。PBS和沙統（USNO）再加入國陣。 7.1 國民車開始販賣。修正第五期五年計劃，發展重工業路線，放寬管制。 7.6 馬來西亞處死二名澳洲毒販，為該國實行毒品禁止法後第一次被吊死的非亞洲人。 8.3 國會大選，執政黨國陣獲得177席中的148席，在野黨DAP獲得24個議席。 9. 林良實（Ling Liong Sik）成為MCA主席。 11.18 新加坡邀請以色列總統來訪，引起馬來西亞政府不滿，馬國召回駐星專員表示抗議。 12.19 通過「國家機密法」修正案。
1987年	4. 沙勞越原住民族Vma Bawang成立保護雨林組織，抗議濫伐行為。 4.24 巫統主席選舉，馬哈迪以761對718票險勝拉沙雷。拉沙雷與外相雅汀（Rais Yatim）6天後被解除政府職務。 6. 沙勞越州議會要求泰普州務大臣辭職，泰普解散州議會重選，再任州務大臣。 7.20 馬哈迪首次正式訪問英國。 9.7 馬來西亞與中國在北京簽訂航空協商諒解備忘錄和船運協定。 10.1 教育部刻意任命不會中文的華裔主管華人教育，使華人和馬來人的緊張升高。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0.28 種族衝突白熱化，馬國警察依「內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逮捕106名在野黨人士，同時關閉三家表示異議的報社。
	10.29 軍警逮捕42位反對濫伐雨林的沙勞越原住民，拘禁兩週後釋放。
	11. 沙勞越州政府發佈禁令，阻止原住民抗拒濫伐，結果掀起反對砍伐森林運動。
	12.7 馬來西亞政府宣布修改「新聞出版廣播電視法」，以加強管理大眾媒體。
1988年	* 澳洲從馬來西亞撤出最後一支幻象戰鬥機隊。
	1.12 馬來西亞政府宣布撤銷中國貨物進口核准制。
	2.4 拉沙雷支持者向法院提訴巫統選舉無效，結果最高法院判決巫統非法，因其支部未依「社會團體法」登記，引發巫統內部分裂。
	2.15 馬哈迪宣布組織新巫統 (UMNO Baru)，正式登記為政黨。
	2.15 拉沙雷另組「馬來巫統」(UMNO Malaysia)，正式登記為政黨，其後成為「46精神黨」。
	2.22 馬哈迪首相前往泰國與緬甸進行訪問。
	4.1 中國與馬國達成協議，互給對方最惠國待遇。
	5.31 最高法院院長阿巴斯 (Mohamed Salleh Abas) 因寫信指控馬哈迪攻擊司法而被停職。7.6另外5名最高法院法官亦遭相同處置。
	6.13 馬哈迪首相與印尼蘇哈托總統就如何因應日元升值情勢進行協商。
	6.27 新加坡李光耀總理訪問馬來西亞，雙方宣布恢復正常邦交。
	8.26 巴巴副首相前往河內商談越南難民問題。
	10.26 馬國被選為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
	11.10 歐瑪 (Abdul Hamid Omar) 被任命為最高法院院長。
	11.21 馬來西亞宣布與中國簽訂投資保障協定。
1989年	* 泰國仲介下，馬共在與馬來西亞政府簽署協定，放棄武裝鬥爭。
	1. 馬哈迪接受心臟手術，過程順利。
	1. 穆沙希坦再加入巫統。
	3.2 穆沙布汀蘇丹 (Azlan Muhibuddin Shah) 被選為第九任國王。
	4.10 因英國出版魯西迪 (Salman Rushdie)「魔鬼詩篇」一書，回教徒炸毀吉隆坡英國語文中心。
	4.19 馬來西亞宣布釋放反對黨領袖林吉祥。
	5.5 新反對黨「46精神黨」(Semangat 46) 成立，翌年改名為「馬來人46精神黨」(Parti Melayu Semangat 46)。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9. 「馬來西亞獨立黨」(Parti Merdeka Malaysia) 成立。
	9.18 大英國協高峰會 (CHOGM) 在吉隆坡召開。
	10.27 馬來西亞財政部長要求在新加坡上市的馬國公司撤回股票。
	11.1 沙巴成立「人民覺醒黨」(Angkatan Keadilan Rakyat, AKAR)。
	11.10 馬來西亞宣布於納敏島成立境外金融中心。
1990年	1. 實施金融機構貸款利率自由化,「新經濟政策」結束。
	2.23 MIC總書記維查壯(D. P. Vijandran)因性醜聞辭職。
	4. 致力於沙勞越雨林保護運動的倪高(Harrison Ngau)獲頒地球環境獎。
	4. PBS分裂,新成立的AKAR加入國陣。
	5. 馬哈迪策反穆沙希坦,決定提前一年舉行大選,以因應首次出現的馬來人反對黨—「人民實力」(Gagasan Rakyat)。
	6. 馬哈迪首相於G15會議呼籲第三世界國家加強「南南合作」。
	9. 「泛馬印度人進步陣線」(All-Malaysia Indian Progressive Front) 成立。
	10.15 沙巴州務大臣拜林宣布PBS退出國陣,與拉沙雷合作。
	10.20 馬國舉行國會大選,國陣仍勉強維持三分之二(127/180)席次,在野聯盟(46精神黨、DAP、PAS)共獲53席。在州議會選舉中,「國陣」亦僅失吉蘭丹和沙巴兩州。
	12.6 馬來西亞第一任總理東姑阿都拉曼病逝。
	12.11 馬哈迪首相提出「東亞經濟會議(East-Asian Economic Caucus, EAEC)」,但未獲東協支援。
1991年	1. 馬國實施第六次五年經濟計劃。
	1.3 沙巴開發研究所副所長兼沙巴州務大臣顧問翁吉利(Dr. Maximus Ongkili)因觸犯「國內安全法」遭逮捕,至3.2才釋放。
	1.5 拜林以貪汙罪嫌遭逮捕。
	1.11 新加坡李光耀總理訪問馬來西亞,表示支援「成長三角」構想。
	1.26 沙勞越國民黨改選黨主席,現任黨主席黃金明再度當選。
	2.4 北韓延亨默總理訪問馬來西亞,表明全面支援EAEC構想。
	2.28 「馬來西亞商業理事會」(Malaysian Business Council, MBC) 成立,由產官學界共62人組成,馬哈迪任理事長,並在成立大會中提出「2020宏願」(Wawasan 2020)構想。
	3.8 馬哈迪首相控告「遠東經濟評論」雜誌妨礙名譽,事後該雜誌刊登更正啓事達成和解。
	3.9 巫統最高會議決議繼續維持君主立憲制。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7.28 MCA召開第30屆黨代表大會，會中通過支援「2020宏願」構想與設立華人文化中心。 7.29 國陣最高會議通過自由民主黨（LDP）加盟案。 7. 南海共同開發問題國際會議在萬隆召開，討論南沙群島主權問題。 10.7 第一屆馬來西亞與印尼聯合委員會召開，雙方就邊界問題等達成協議。 10.9 大英國協財政部長會議於吉隆坡召開。 11.8 巫統召開黨代表大會，會中決定設立特別委員會，以調查皇族所有財產。 12.31 馬國政府承認獨立國協等十一個共和國。
1992年	1. 第四屆東協高峰會議在吉隆坡召開，決定創設ASEAN自由貿易區（AFTA）。 6. 馬來西亞宣布放寬外籍勞工雇用限制。 6. 馬哈迪在里約的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表現傑出，譴責北方國家對生態的蹂躪。 7.4 修憲取消蘇丹免訴特權，並自翌年開始生效 8. 拜林主張馬來西亞獨立紀念日為1963.9.16，而非馬來亞聯邦成立的1957.8.30，引起沙巴與中央的對立問題。 9. 沙巴獨立運動首謀拜林之弟吉汀亢（Jeffrey Kitingan）因違反國內安全法遭逮捕。 10. 沙統（USNO）加入UMNO，穆斯達發加入後獲選州議員。 10.10 馬國國會一致通過史無前例的譴責案，非難前國王（柔佛蘇丹）對平民施暴。
1993年	* 巫統大會幹部改選，朝年輕化、歐美和華人文化發展。 2.11 取消蘇丹免訴特權的修憲案生效，各州蘇丹拒絕簽署權利讓渡書，最後同意成立特別法廷處理此類問題。 3.1 俄國副總統魯茲柯（Aleksandr Rutskoi）訪馬。 6.29 馬來西亞宣布購入俄製米格戰鬥機。 10.15 巫統副主席巴巴因與馬哈迪意見不合遭解職，11.3由安華（Anwar Ibrahim）取代其職位。 11. 在西雅圖召開第五次APEC會議，此為首次的APEC高峰會議，馬來西亞缺席。 12. 馬哈迪宣布政府允許大學院校的科技類課程用英語教學。 12.1 內閣改組，安華成為副首相。
1994年	1.24 馬來西亞政府宣布禁止外國人從事短期金融商品交易。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2. 沙巴進步黨（Sabah Progressive Party）成立。
	2.4 森美蘭拉曼蘇丹（Jaafar Abdul Rahman）被選為馬來西亞聯邦國王。9.22 登基。
	2.10 「46精神黨」改稱「46精神馬來人黨」。
	3.15 庫拉普（Joseph Kurup）宣布成立「沙巴人民團結黨」（Parti Bersatu Rakyat Sabah, PBRs）。
	3.21 沙巴民主黨（Parti Demokratik Sabah）成立，創黨領袖為冬帕（Bernard Dompok）。
	4.18 沙巴州議會舉行大選，拜林的沙巴團結團取得25席，UMNO為18席。
	5.10 眾議院通過修憲案，減低蘇丹特權和增設新法院體系。
	6.7 馬來西亞宣布與俄羅斯締結購買18架米格二十九戰鬥機的協定。
	6.11 「國陣」同意將沙巴民主黨和沙巴人民團結黨加入。
	7. 拜林提前解散州議會進行改選，使PBS議席大減，拜林辭任州務大臣，以UMNO為中心的國陣奪回沙巴政權。
	9.7 馬新總理會談，同意以法律途徑解決布蘭加（Pedra Branca）島領土紛爭。
	10. 馬國政府重申不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但允許個人因工作或宗教理由前往耶路撒冷。
	11 馬哈迪出席印尼茂物舉行的APEC高峰會，並表達對經濟自由化的憂慮。
	11.10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馬來西亞，宣布支援馬哈迪首相提出的EAEC構想。
	12.1 馬國政府修正「外匯管理辦法」。
1995年	* 沙勞越州議會大選，國陣大獲全勝。
	1.2 前沙巴政治家穆斯達發逝世，享年78歲。
	1.9 馬來西亞政府宣布：原住民Orang Asli學校的管轄權，由總理府轉移至教育部。
	1.10 馬哈迪宣布允許海外大學於大馬開設分校。
	2.9 DAP退出鬆散的在野聯盟。
	2.22 設立Malaysian Industry-Government Group for High Technology（簡稱MIGHT），作為首相在高科技開發方面的諮詢機關。
	3.19 印度裔組成的政團－「印度進步戰線（Indian Progressive Front）」，宣布脫離在野聯盟，支援國陣。
	3.25 國陣召開自1974年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4.25 馬國舉行第九屆國會大選，國陣獲得勝利，於192席中獲得162席。5.3馬哈迪成立新內閣，並新設企業開發部。 6. DAP總書記林吉祥被選為在野聯盟主席。 7.25 召開「第一屆馬來西亞商業理事會（Malaysian Business Council）」會議。 8.3 高等法院裁定民主行動黨眾議員黃朱強當選無效，其缺由NCA候選人遞補。 8.5 巫統主席馬哈迪指示下屬各支部禁止以黨名設立企業，並解散現存1,600家黨營企業。 9.7 馬國設立「輸出入銀行」。 9.10 檳榔嶼眾議院議員進行補選，民主行動黨候選人林副成擊退國陣候選人當選。 9.18 馬哈迪首相發表施政方針，將超過200家政府相關企業組織民營化。 11.22 將工業技術園區（Technology Park Malaysia）民營化。 12.1 中央銀行宣布禁止土地投機與外國人投資馬國不動產。 12.2 馬哈迪首相前往新加坡進行非正式訪問，雙方就柔佛供水問題進行會商。
1996年	* 實施第七期五年經濟計劃。 * 李用哲（華人）出任沙巴州務大臣。 1.3 農村開發部表示將承認聯邦土地統合再開發廳（FELCRA）及橡膠產業小農開發廳（RISDA）轄下土地開發計劃轉為商用。 2.15 設立納敏島境外金融中心（Labuan Off-shore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3.6 馬來西亞舉辦第一屆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成長三角」會議。 4.17 國家治安會議決定：關閉越南難民營及送返1,655名難民。 5.15 馬哈迪首相訪日，並發表「多媒體超級走廊」（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MSC）構想。 7.5 馬華公會（MCA）召開年度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林良實與林亞禮再度連任正、副委員長。 8.1 馬國政府召開亞洲資訊會議，並公佈對參加MSC構想之企業給予優惠措施。 8.18 存在46年的馬來人最高評議會於10.6解散，並正式決定加入UMNO。 9.17 馬國駐聯合國代表伊斯梅爾（Sri Razali bin Ismail），就任第五十一屆聯合國大會議長。 9.27 召開「第一屆國家高等教育會議」（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ouncil）。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0.5 馬來西亞人民運動黨召開中央黨大會，實施董監事選舉，並選出林敬益為總裁。
	10.6 46精神黨宣布正式解散，回歸巫統。
	10.10 UMNO召開黨中央大會，選舉中央最高評議委員，馬哈迪連任主席，安華連任副主席。
1997年	5.26 為反擊新加坡批評「大馬南部柔佛地區是犯罪孳繁地區」，馬來西亞決定凍結兩國關係。
	7. 金融危機發生，馬哈迪與安華因處理對策而對立。
	8. 馬哈迪將股市、匯市爆跌，歸咎外國投機客。
	8.31 馬來西亞舉行自英國獨立四十周年紀念大會。
1998年	1.7 零吉（馬元）跌至最低紀錄，但IMF 總裁於1.15表示目前尚不必支援馬國。
	4.1 安華擔任IMF、世銀開發委員會委員長。
	6.8 安華指出經濟危機的原因在國內體制，必須進行改革。
	6.30 吉隆坡新國際機場開始啓用。
	9.2 總理府宣布副首相兼財政部長安華被革職，翌日UMNO撤銷安華黨籍及職務，9.7馬哈迪自兼財政部長。
	9.21 前副首相安華被捕，吉隆坡爆發嚴重動亂，聲援群眾與警察發生衝突，百餘人被捕。
	11.14 APEC外長會議在吉隆坡召開，11.17召開非正式高峰會議。
1999年	1.8 馬哈迪改組內閣，去除安華勢力。
	2.5 巫統最高評議會選出阿布都拉為副總裁。
	2.27 雪蘭莪蘇丹沙萊布汀當選第11任馬來西亞國王，9.23正式就任王位。
	4.2 馬哈迪因肺感染入院。
	4.4 前副總理安華夫人阿濟莎成立「國民正義黨」（Parti Keadilan Nasional）。
	4.14 高等法院判決安華濫用職權，處刑6年，群眾示威抗議。
	9.3 馬哈迪宣布不參加APEC年會，由副總理阿布都拉代表出席。
	9.16 馬國派兵參加聯合國東帝汶和平維持部隊。
	11.30 國會大選，國陣當選148席，超過全部議席（193）的三分之二。PAS從4席擴增至27席。
	12.10 馬哈迪組織新內閣，12.23發表阿布都拉為巫統繼承人。
2000年	1.3 巫統最高評議會通過黨大會時提案無投票通過馬哈迪為總裁，阿布都拉為副總裁。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12	民主行動黨（DAP）和國民正義黨等在野黨幹部4人，以違反煽動法被逮捕。
2.27	法院對前副總理安華的濫用職權罪訴訟展開二審。4.29維持有罪判決。8.8更以其異常性行為判刑9年。8.11安華再上訴最高法院。
3.23	拉沙雷表明無意參選巫統總裁，3.26馬哈迪確定當選。
4.2	國家人權委員會成立，委員長為穆沙希坦。
5.18	泰馬締結新國境協定。
6.7	馬哈迪訪問日本。
9.18	馬國為有效因應EU認證基準，於倫敦設置標準工業研究所支部。
10.5	馬哈迪訪英，與布瑞爾會談。
11.14	馬哈迪前往汶萊參加APEC高峰會，11.23前往新加坡參加ASEAN高峰會。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辦公室報導

壹、最新出版品

一、東南亞研究論文系列

- No.59 蔡慧玉：日本軍政、地域組織與爪哇奉公會：戰爭動員之比較研究
No.60 劉宏：新加坡華人社團與教育：變遷中的互動關係（1945~1954）
No.61 林長寬：印尼 Muhammadiyah 早期「再伊斯蘭化」運動初探

二、東北亞研究論文系列

- No.19 韓三建：日本殖民地統治時期韓國地方都市土地所有變化的相關研究：以慶州和蔚山邑城為例

貳、午餐研討會

九十二年度午餐研討會系列（一）：
時間：92年3月3日（周一）
地點：社會所新館 2319 會議室
主講人：黃賢強博士（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主題：遺漏的移民史篇章：從美國天使島看新加坡聖約翰島上的華人

參、活動預告

今年 7~9 月將舉辦的活動如次：

一、7月23日，將舉行「台灣與南韓的社會運動與民主鞏固」國際研討會。

二、九十二年度午餐研討會系列（二）：
時間：92年7月25日（周五）
地點：社會所新館 2319 會議室
主講人：孔復禮教授（Prof. Philip A. Kuhn, 哈佛大學教授兼東亞語文暨文明系主任）

主題：華人的社會經驗中一些適應於移民活動的特點

三、九十二年度午餐研討會系列（三）：
時間：92年9月15日（周一）
地點：社會所新館 2319 會議室
主講人：Prof. Robert Barnes（Asian Studies Centr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
主題：The Communist Uprising in East Indonesia in 1950s and Its Consequences

四、九十二年度午餐研討會系列（四）：
時間：92年9月28日（周一）
地點：社會所新館 2319 會議室
主講人：石井米雄教授（Prof. Yoneo Ishii, 原日本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所長，現為日本神田外語大學校長）
主題：The Kyoto Experience in Establishing Southeast Asia Studies in Japan



4 月 25 日 • 2003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開幕儀式
照片左起：本院李遠哲院長、本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蕭新煌執行長、本院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王汎森主任。

亞太研究論壇 第二十期 2003.06

主 編 蕭新煌
編輯顧問 龔宜君 張翰璧
編 輯 簡心怡 林淑慧
發行單位 中央研究院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地 址 115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電 話 (02) 27822191, 27822195, 26516862
傳 真 (02) 27822199, 26516863
網 址 <http://www.sinica.edu.tw/~capas/>
電子郵件 capas@gate.sinica.edu.tw

ASIA-PACIFIC FORUM

20



**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ACADEMIA SINICA